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干国勋等著

藍衣社
復興社
力行社



中華書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于国勋等著

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干国勋等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7-101-10180-5

I. 蓝… II. 干… III. 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IV.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5261号

-
- 书 名 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
著 者 干国勋等
丛 书 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字数18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180-5
定 价 36.00元
-

出版说明

文献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民国史研究自不例外。为了给民国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史料利用上的便利，我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合作，推出“民国文献丛刊”。

“民国文献丛刊”首批图书中，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列入了原属“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的一些作品，包括《刘汝明回忆录》、《银河忆往》、《逝者如斯集》、《颜惠庆自传》等十九种。

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影响，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时代局限和政治色彩，一些个人视角的描述与评论，难免有不符合事实之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除了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基本保留了作品原貌。希望各

位读者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着眼于其文献价值，辨析真伪，而获得本真的历史事实。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七月

前 言

本书系为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二周年而编印，内容采自《传记文学》，执笔者均系亲与其役之士，本书目的旨在澄清蓝衣社、复兴社与力行社的历史事实。

所谓蓝衣社，事实上是指中国一个政治上的秘密组织。因为是秘密组织，局外人无法知其详，局内人又格于规定，不愿道其详。唯其如此，蓝衣社有如一个阴影，若有若无，忽隐忽现，再加以各方绘影绘声，虚构附会，就变成一个更神秘、更离奇、更具有无上权威的“特务机构”了，其影响持续达半个世纪以上。

幸有早年参加组织而愿意为历史作证的干国勋先生与宣介溪先生，揭开了蓝衣社之谜。所谓蓝衣社实即三民主义力行社，而一度声势煊赫的复兴社乃是力行社的次一级组织。但蓝衣社并非空穴来风，蓝衣社之说始于刘健群先生的一本小册子，其内容系刘先生与宣介溪先生共同孕思而成的。宣先生说：“过去只知蓝衣社不闻力行社，固属

未明底蕴；今日若只知力行社而不闻蓝衣社，亦属未明底蕴。”他写的《蓝衣社之来龙去脉》，就是说明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蓝衣社如何形成、又如何在胎死腹中。事实上，在力行社成立前这个组织即已存在，而力行社承袭了他的主要构想后，即告消失。

本书因系辑《传记文学》所刊各家之文，其内容重复处或说法各异之处在所难免，编者以免削足适履之嫌，一律保持原文完整，未作任何删节。

《传记文学》廿二年来，所刊与此类有关之文字绝不止此，或数倍于此。其未入选的原因，除篇幅关系外，因其多已收录在其他专著之中，如刘健群先生所写各文已收入其《银河忆往》一书，如邓元忠先生《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初稿》亦另编印成书，本社未再重复选辑。

传记文学出版社编者谨识

目 录

前言/1

释“蓝衣社”并怀刘健群 千国勋/1

蓝衣社之来龙去脉 宣介溪/16

复兴社 青白社 蓝衣社

——一个“复兴社”参加者的自述与观察 陈敦正/47

我所知道的复兴社

——即非蓝衣社更非特务组织 白瑜/89

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 千国勋/119

附录一：我所知道的“酆悌免职” 宣介溪/176

附录二：再谈酆悌免职 宣介溪/179

三民主义力行社 千国勋/183

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

蓝衣社》一书 千国勋/213

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 魏大铭/221

释“蓝衣社”并怀刘健群

于国勋

关于“蓝衣社”小册子

我知道健群兄，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蓝衣社”的小册子。

民国二十一年春，那时正值“九一八”变后，国内情势紧张，东三省已为日军侵占，其特务机关，遍布于我华北和内外蒙古。时两广反中央，提出若干要求，而坚要蒋先生辞职。赣南的共党，由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率领共军，分向吉安、赣州、福建长汀等地进攻，在大别山的张国焘、徐向前，并向湖北黄安、黄陂进据，东面出金家寨——立煌，威胁合肥，鄂中贺龙，也待机而动，最严重的是周恩来、张闻天两人，在上海主持统战，他们以请愿抗日为名，发动了五六万人，涌向南京，先至丁家桥，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继至外交部把部长王正廷的头打破了，再往珍珠桥捣毁了中央日报社，按此时为“训政时期”，亦即“以党治国”时

期，党的中央，系属国家的神经中枢，由上海涌向南京的民众，随共干领导其唱《马赛进行曲》，向国民党的总部，作摧毁性的一击。共党此举，是可以置国民党以死命的。那时在国民党治下的中国，除东南数省之军、政、税收，能由国民政府控制外，其余西南、西北、华北各省，仅是名义上统一于中央。如果国民党的神经中枢被破坏了，全国可能立即陷于混乱。要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是处于强邻俄、日两个帝国主义者之夹击中。

可是他们当时对国民党的估计，却忽视了一股新生的力量，即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中心之爱国青年，正跃跃欲试，极思一显身手。时校长蒋先生隐居奉化，南京中央呈现了空虚混乱状态，全国人心亦殊惶惶不安，这班黄埔毕业生国民党新起之秀，就在南京二郎庙康济医院，租了两间木屋，作为总部，筹组三民主义力行社，进行将全国的——军人、青年、农、工、商人等组织起来，毅然的肩负起安内攘外的责任，安内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消灭共产党，而攘外自不待言，是要从抵抗日本军阀开始。刘健群适于此时写了一本小册子，题曰《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约万余言，内容是主张国民党，应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发挥党的传统革命精神，深入农、工、商、学的群众中，发挥我国地大、物博、人众的潜力，以扭转当时劣势，力行三民主义，然后我们自有能力，以对付内奸之捣

乱，和外寇之入侵。健群这样的小册子，在那时出现，可说是在众议纷纭中，是一项极切实际富有建设性的火炬。

某日桂永清拿着这本小册子，兴冲冲的走进木屋，眉飞色舞的说：这本小书，对救党救国很有办法，是刘健群写的，并说刘是怎样的一个人。查健群在北伐前，就在广东任何敬之将军的秘书，我们之中有的已识其人，有的也闻其名，不过他能在这非常时期，以非常的胆识，对党国根本大计，有所主张，写出这本不同凡响的小册子，则非我们所能料想的。我于是找孙慕迦、沈遵晦两兄，请他们介绍健群兄见面，某日由遵晦兄作东，在他住所韩家巷十二号与慕迦、健群吃午饭，健群遵时而来，矮胖的身材，着蓝布中山服，马铃薯的面孔，言谈轻松入理，态度潇洒亦凝重，乌黑的眸子，深藏着机智，突出的肚皮，正表示经纶满腹，三十来岁的人，一切表示似已成熟，时为何敬之将军的秘书，任官同少将，贵州遵义人，贵阳法政专科毕业后，在本省新闻界待了一个时期，即前往广东参加何敬之将军戎幕，自那时起，凡东征、北伐、讨逆、“剿匪”诸役，无役不从。如所周知：何将军是辅佐蒋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故何将军在蒋校长领导之下，已是深悉革命历史，及其未来使命的重要人物，健群既间关东来参加革命，而又亲受何将军之影响，其对当时革命事业中途遭受挫折，于痛愤之余，毅然主张组织党的“蓝衣社”，一扫其时之军事北伐，政府南侵，党脱

离了群众的官僚作风。“蓝衣社”之名自此不胫而走，始终被国人认为是国民党最核心最神秘的组织。

健群其人

健群兄公祭之日，我为联挽之曰：

出身政法专门学校，达识博闻，时贤无在其右，信是钟灵毓秀。

致力民族复兴运动，安内攘外，名将难与争功，长留勋业照人寰。

大致说来，健群一生，并不得意。他虽在抗战前，做过中央军校及军委会政训处长，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军委会华北宣传总队长，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委员长广州行营政务厅长，以及抗战后之立法委员，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评议委员等较重要的职务，但对他的才能，却展布得有限。我们常有感于一些要人，才不称职，但在健群所任过的职务，确未能尽展其才。据我了解，他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那个重要职务时，掣肘的地方很多，殊难依照其理想与计划，畅所欲言，因此他曾一度遁入空门，实则他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佛家思想。他仅在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任华北宣传总队长及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时，颇能按其心意，有所作为，使日本人的华北五省特殊化运动，胎死腹

中，然其在职，也仅只短短的一年而已。

健群正式参加安内攘外工作

二十一年“一二八”沪战前夕，因日军进迫，如箭在弦，京沪情势紧急，汪精卫、孙科亲往杭州敦促蒋先生回京，旋被任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以应付“一二八”沪战危局。政府迁都洛阳，林森主席离京驻洛，以示对日抵抗之决心。沪战经过三十四日之激战，双方死伤极重，日军速战速决之目的无法达到，转而趋向停战，故自二十一年三月二日之后，中日双方仅有对峙，而无战事。蒋先生乃建议中央，在不损及我政治主权下，谋与日方达成正式停战，俾免徒牺牲生命财产，而得到备战的机会。那时蒋先生应付危局的方针是：安内攘外，重振党的威信和政治机能。他事先召贺衷寒、滕杰、康泽垂询，已知道我们这班人，对于组织全国人民，力行三民主义，消灭内奸，抵抗外敌，早已付诸行动，故他特约我们全体二十七人，在中山陵园举行座谈会，会场是一栋约四十坪的平房，白壁灰瓦，坐落于苍翠的松林之中，左上方是巍峨国父的陵寝，右后方是奋起民间光复中华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墓地。初春的天气，万物显露生机，这表示了国民党的新生气象。每一参加人，都是由滕杰先一日亲到其住处，

口头通知，就记忆所及，当时参加者为萧赞育、滕杰、贺衷寒、桂永清、葛武荣、邓文仪、潘佑强、杜心如、酆悌、胡宗南、孙常钧、康泽、李一民、曾扩情、娄绍铠、易德明、彭孟缉、刘诚之、黄仲翔、蔡劲军、骆德荣、戴笠、邱开基、周复、湖南常德籍六期某（记不起其姓名）、干国勋等（尚有一人记不起），他们都是军校一期至六期的毕业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占多数，次为留学俄国者，次为在国内办过黄埔同学会或孙文主义学会者，仅永清一人系留德出身，每人发表意见，不限时间，二十七人分三个晚上说完，每晚由七时至十一时左右为止。蒋先生坐着静静的听取每个人的报告，偶尔用蓝铅笔记其要点，邓文仪当记录，戴笠助文仪办杂务，盖渠两人，一为侍从秘书，一为侍从副官也。这时淞沪方面战事仍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全国各地更是浮动不安，而蒋先生在那三个晚上，却似若无事，全神贯注的听取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充分的表现了其处变如常，宁静致远的素养。桂永清是一期老大哥，原在第一晚就发了言，但第二晚康泽刚说完话，他又突然的站了起来说：他要当校长及诸同学面前推荐人才，其人为刘健群，他随何敬之先生任秘书，参加过东征、北伐、讨逆、“剿匪”诸役，都表现得极好，对政治与时局有高度的认识，不宜屈居幕僚云云。其态度之诚恳，至公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因此，我于钦佩桂永清之余，也就特别注意健群了。桂永清号率真，人极风

趣，凡有集会，只要有他在场，均显得生动有活力，他常赞马占山、俞大维等有才能，后来这些人都表现不凡，其实桂与他们，既非同乡亦不是同学，而皆诚意推许，其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可见一斑。古人说：惟荐贤者，得受上赏，盖得人者昌，所关至大也。桂推荐健群的话说完，全场无异议。蒋先生亦点头称是。次日上午健群即被召见，据他说：蒋先生拟命他做江宁实验县长，他当即婉辞，并表示愿追随蒋先生任记室。约一周后，健群被任命为中央军校同中将政训处长，这在当时是颇为重要的工作，一个月后，又被任命兼军委会政训处长，总理全国部队及各军事学校政训事宜。在国民党中央威信遭受共党的破坏，蒋先生身负安内攘外的重荷，除凭借分布全国的国军及军事学校，推行军民合作，以恢复人民对党的信心之外，殊无其他有效途径。健群以一个出身法专籍籍无闻的幕僚人员，而肩此重任，这是非常的知遇！健群那本“蓝衣社”小册子内容，既主张实干、苦干，实与蒋先生之“实干、硬干、快干、苦干”的救国旨意相合，故在我们大家默认之下，特破格重用，冀展其才能。当时笔者忝任力行社所属之“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兼组织主任，健群约在二十一年四月下旬，由桂永清、滕杰介绍，亲来香铺营总部，填表、宣誓加入组织，至此，他更正式成为致力民族复兴运动的成员了。

略述民族复兴运动内容及其成就

到现在为止，事隔四十年，关于自民国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止，蒋先生所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之实质及其绩效，就中外历史和报刊所记载，实皆未能详明其真相，其无中生有与误谬之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即以最近由美国人所办的《中国月刊》，关于此一运动之记载，亦复如是，笔者不文，亦不自知其何时就木，深恐此段有关中国革命之重要历史，犹是以讹传讹，其真情实况，永无以大白于天下后世，健群兄生前，曾看过我某次在《宪政论坛》，发表《追忆九一八事变时蒋总统所领导之民族复兴运动》一文，因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及二十五年，一再的担任过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故他即再三的敦促我写此一史实，卒因事隔久远，资料无存，白纸对青天，仅凭记忆，未必能详实无遗，蹉跎岁月，迄未完稿，兹为酬报亡友，用特略述其内容及成就一二于次。

推行民族复兴运动之组织，到现在止，一般都称为“复兴社”，实则推行这项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次级组织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都是在民国二十一年四月间，经过不同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复兴社”的名称，是二十三年七月以后才有的，那是为了扩大组织影响，广泛的吸收一般人

做社员，实则从中央以至各地区，皆以“力行社”及“革命青年同志会”之组织机构与干部人员，办理复兴社员之征收和训练事宜，换言之：复兴社从中央至地方，并无独立的机构及办事人员，且在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以前，民族复兴运动，正蓬勃展开其工作时，根本无复兴社名义。

至于由当时的日本军阀之特务机关等，如出一辙的恶意中伤诬蔑说：它是“法西斯组织”，是“蓝衣社”，是戴笠所主持的特务机构等，完全是捏造的。除了前述组织的名称之外，其内容与成就，约略如下：

（一）新生活运动，在促使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言行，能表现于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四维八德之中。由于这项运动之推行奏效，一时社会和政治风气，即为之丕变，举凡奢风、贪风、堕风、骄风、赌风、淫风、欺诈风等，几于绝迹，将中国自鸦片战败后，失去了的民族自信心，恢复了过来，中国人再不是——病夫、睡狮了，而已站立了起来，为扫除一切革命的障碍而怒吼了！故这个运动，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初步进行，亦即先求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再进而扶助世界被压迫民族之独立自由。

（二）国民军训运动，是针对数千年来，农业社会一盘散沙，作有效之矫正，分学校军训、社会军训、文武合一训练三方面进行，促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有合群、团结、自卫的能力，并习惯于科学群众时代之生活，他对原存在于中国

社会的——文弱、懒散、迟钝、凌乱、各人自扫门前雪等病态，作了划时代的根除，同时也为后来抗日持久战，储备了大量的补充兵员，故国民军训运动，既是民权初步训练，也是对日明耻教战，但其政治意义较军事意义为多。

（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成立时起步，一方面在帮助共区人民恢复生产，同时也着眼于推及全国，使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增加生产，改善农村经济，才能发达国家经济。为着不举外债，力谋自力更生，当时又倡导了国民义务劳动，强调“双手万能”，“废物利用”，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致了辉煌的成就：如建筑约两千公里的铁路，四万公里的碎石路，整顿了纺织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民国成立以来，生产量最多最进步者，建立——中、中、交、农国家四行，统一了币制发行，并分配其各有专业。故此项运动，亦即是民生主义之实行。

（四）安内攘外运动，是遂行前三项运动的前提，盖必须内部安定，外无强敌，才能进行前述各种工作。在安内方面：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克复江西瑞金，原在“九一八”至“一二八”四个多月期间，全国共军扩展到六十三万余，其中有枪弹者约半数强，民兵约半数弱，最后在大别山之张国焘、徐向前股，残余三万去川北，在赣南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股，亦仅残存三万西去。二十三年军委会参谋团入川，共内部分化，经各军协攻，去陕北者仅万

人，并将四川历来之防区割据局面，予以消除，其军、政和税，乃完全统一于中央，黔省亦如之。二十二年长城抗日战后，健群兄奉命筹组华北宣传总队，随军委会北平行辕之成立而北上，使日本华北五省特殊化胎死腹中（详另篇叙述），华北各省，亦在实质上统一于中央了。此外如救平闽变，绥定两广，安定西北，皆成效显著，故到民国二十五年底止，除东四省为日军侵占外，中国在实质上是统一了。不过此时力行社内部，已有分裂存在，蒋先生对组织也颇感失望，党、政、军大权非力行社干部所能影响，残存于陕北的共党，在苏俄支援下，政治上渐趋主动，西安事变之发生，更助其死灰复燃。要之：三民主义力行社，在蒋先生领导下，于安内以准备攘外的工作，收获如此丰硕，在于能以政治运动为主，军事为辅，换言之，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运动之成果也。在民族复兴运动进入高潮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均参加了以力行社为中心之四项救国运动，一切反动势力亦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而唯国民政府之命是从，凡此伟大成就，断非所谓“法西斯”运动，及某某所主持之特务运动，所能办得到的。

健群主持的政训研究班和华北宣传总队

健群任军委会政训处长时，筹办了一个“政训研究

班”，时在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该班招收大专毕业生，及若干军校各期毕业生，共约六百人，修业期限半年，是以养成推行民族复兴运动的干部为主旨，故其考选和训练，均极严格，在筹备期间，他曾飞汉口、庐山各一次向蒋先生请示。盖此班之设，原出自蒋先生之意旨，故其对学员素质，教职员人选，教材内容等，均极关切并亲自核定。如其时非必须离京，蒋先生必亲自主持一切。他曾为该班亲书“坚苦卓绝”四字为班训，又书“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十二字，为训育方针，又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十六字，以激励该班员生，后来这些词句，广泛的被机关引用迄今，但是多不知其最初来历。健群既为班主任，自然全神贯注，他常作精神讲话，及与学员个别谈话，教职员除何浩若、高信二人外，均为力行社干部，孙慕迦似系教务组长，梁干乔训育组长，萧赞育、滕杰、余洒度、李秉中、何德用、康泽、干国勋等为指导员，桂永清、杜心如、彭孟缉为军事教官，阮齐为总队长，宣介溪、匡正宇为秘书，半年结训期满时，适为二十二年春季，长城战役后，所有学员除约五分之一，派赴全国各地办理力行社组织外，余者组成华北宣传总队，健群任总队长率领北上，办理军民的组训工作。那时战事虽暂停，而《塘沽协定》尚未签订，日本特务机关于制造了冀东殷汝耕伪组织之后，又极力策动华北五省及内蒙特殊化运动，健群这

支五百人的政治作战部队，就与他们展开了遭遇战，中国人原有“严夏夷之防，明左衽之戒”的古训，华北军民，一经这五百政战健儿的宣抚，士气斗志大为提高。日本人恼羞成怒，竟向国民政府提出：撤销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市党部，迁河北省政府于保定，撤换其主席于学忠，又编印小册子，说“蓝衣社”首领刘健群率十三太保分子，到华北控制军队与民众云云，但这是丝毫没有效力的。殷汝耕冀东伪组织日趋萎缩，刘健群及其所属与华北军民领袖人物多成为莫逆之交，他不时发表演讲，其辩才无碍，渊博的知识，配以响亮的黔北口音，无不使听众为之动容！不久这支五百人的宣传总队，就配属各军成立政训处，其番号及主官姓名于下：宋哲元二十九军，政训处长宣介溪；庞炳勋的四十军，处长陈春霖；商震的三十二军，处长韩濬；于学忠五十一军，处长王德溥；万福麟五十三军，处长马愚忱；何柱国五十七军，处长刘广瑛；冯占海六十三军，处长余洒度；王以哲六十七军，处长干国勋；沈克一个独立师，政训处长姓名已记不起。这八个军，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实力最充实，辖有冯治安、冯钦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五个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若干，分驻察哈尔、冀北，隐然是中央在华北的主力，健群与宋及其所属高级人员，私交甚好。此时北平军分会主任是何敬之将军，分会政训处长即是健群，而中央防卫华北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亦即注

重团结军民，以抵敌人的分化策略。健群既领有五百政工人员，配属于八个军，一个师，分布冀、察等地，能使军民协同一致拥护中央，无异是国民政府捍卫北疆一道坚固的长城。假如那时没有这道政治长基，以阻遏住日本的特务攻势乘胜南侵，即蒋先生所说的——蚕食政策，那蒋先生又安能全神贯注于督攻赣、鄂、豫、皖的共军，并积极筹备长期抗日工作。健群在蒋先生深加委任下，努力于安内攘外工作，其贡献实非寻常，笔者挽以“名将难与争功”，良有以也。当然与健群在力行社同时，还有若干极重要的人员，因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故略而不述。

痛定思良将

我常痛定思痛，自民国十五年，起，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已四十六个年头了，其间军事斗争，十之八九是胜利的，而失败于政治斗争。就健群的个性才识而言，他真算得上是共产党的一个对手，是思想斗争上的良将。他最显著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不袭俗套，本色落实，其日常的衣食住行，并不讲究，一袭中山装，跑上中下三层社会，对他来说，并无不适，与工人、农人同住在堆满了什物的屋子里，他一样能写好文章，能思维对党国有益的大计，他虽贵为力行社书记长、“立法院长”、中央委员，却绝没有一般要人的

俗态。二十一年我住成贤街，他住中央大学右侧石桥，相距不远，间于晚上同往北门桥洗澡，一天紧张工作，至此才获轻松，随便漫谈，我颇觉得他深悉民间疾苦，也极了解官场积习，不过他因同情民间疾苦，也就自然流露痛恶官场积习了，我于是了解他写《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小册子，主张须先生活群众化，革除官僚作风，才能有效争取群众与政府合作，以完成救党救国的任务，诚非偶然。

（原载一九七二年九月《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三期）

蓝衣社之来龙去脉

宣介溪

前 言

远在七八年前，传记文学社创办人刘绍唐兄，即要我写一些有关蓝衣社的问题。

三年前，读到干国勋兄在《传记文学》二〇八至二一〇期发表的《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内有力行社组织经过）后，我曾表示，要写一篇《所谓蓝衣社的来龙去脉》（见《传记文学》二一二期四十九页）。

不意，一延再延，直到今天才动起懒笔，向绍唐兄交这份晚卷。

在削平闽乱，华北抗日，安定西南，西安事变，这一段时期前后，我国有一秘密团体，出没无踪，震撼中外，日本陆军，畏之如虎，知识青年，追求热望，某一青年，如一旦获得加入，则其心灵，其生命意义，顿即有划时代之感。

此一团体，是何团体？是蓝衣社吗？在若干年前，或许

有人会答，是蓝衣社，但现在一切已明朗化了，我们已能毫无迟疑的答道：是三民主义力行社，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以迄尔后，凡社会上、国际间所说蓝衣社，除特有专指外，事实上都是力行社，力行社有蓝衣社之名者，误传也。

但，本文不能不特别提出的：过去，大家只知蓝衣社，不闻力行社，固属未明底蕴，今日若只知力行社，不闻蓝衣社，也是未明底蕴，情形如何，请看下文。

一、百花湖上感党国之危

民国二十年春夏，遵义刘健群兄与我在何敬公所主持的南昌行营工作，行营位于南昌百花洲，房屋相当宽敞，同仁多住宿舍，或附近民房，独健群兄与我别住在一栋名叫“湖心亭”者之内，亭在湖中（旧名东湖，俗称百花），与行营相望，有一堤可通，相传，中山先生昔日到赣，曾住此亭，景物优美，空气清新，长住此间，不觉心胸开朗。

我二人每于黄昏、月下，散步堤上，漫谈天下事，有时勤务人员为我们准备一大盆刚削好皮，用冷开水洗过的南昌荸荠，并搬来藤椅两张，边吃边谈，清风徐来，明月斜天，荷漾波光，谈兴益浓矣。

我们所谈，先是上下古今，无所不包，后因身居“剿共”大营，话题不免渐渐涉及“剿共”军情，涉及国民党，进而到

军队政训，到国家处境等，可分为五项：

（一）谈“剿共”军情

何敬公此次奉命“剿共”，中央特昇予南昌行营主任，兼江西省党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省主席为副主委），党政军一元化，全权专责。

这时在赣南的毛泽东、朱德等部，所谓红军，连同裹胁的所谓农民赤卫军，大约尚有五万余人，但粮食、医药缺乏，装备羸劣，器材不足，而农民军甚至连普通的枪械也没有，所使用武器，多是古代的刀矛一类，较之“清剿”他们的数十万国军，装备精良，补给无虞，真不成比例，加以司令官何敬公，统带大军，指挥若定，百战百胜，是经得起考验的，而其参谋作业，在老成持重的贺元靖（国光）参谋长、军事奇才王伦副参谋长，及几位参谋高手，精心合作下，真是算无遗策，滴水不入，他们因应山地作战，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所采取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求速胜，逐渐缩小包围圈办法，是当时多少军事战略家，一致赞扬的。

当然，共军方面，也有若干有利条件，如组织严密，如困兽之斗，如威逼民众报告国军行踪，并反报国军假情报，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以东报西，或以西报东，使国军估计错误，以致为敌所逞。但大体说来，国军胜券在握，若无非军事因素，影响此间，再假何敬公继续负责以数月，全部

“清剿”任务的达成，敢说，是百分之一百没有疑问的。

（二）谈国民党

国民革命，能否圆满的达成；三民主义新中国，能否理想的实现？国民党的健全性如何，当为首要关键。我们谈到党的不够健全处，举出较显著事例，有下面八项：

①分裂：

党（指国民党，下同）某些领导人物，或逞意气，或执己见，甚或为一己之私，罔顾大体，破坏团结，常有两个以上中央党部出现，忠实党员，莫知所从。

②不开小组会议：

小组会议，看起来关系很小，其实，关系之大，大得有关党的存亡。党是集结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党员之众志成城而凝成的一个革命巨人，小组会议则是此项“集结”的枢纽，若无小组会议，党员千万，一盘散沙而已，当时各处的小组会议，多不按时召开，甚至有常年累月不开者。

③自称“本党”：

安徽某县有某商会会长，是标准的劣绅，一日，在商会公开演说，凡涉及国民党者，必曰，“本党”如何如何，俨然是老党员矣，据其子语人，其父绝未曾入党，是一冒牌分子与跨党分子，投机分子、潜伏卧底分子，都说是同志，真伪难分。

④滥收党员：

民国十七、八年，安徽省党部在筹委会（或指委会）时期，有某筹备委员（或指导委员）一口气吸收万余人入党，以便正式成立党部时选举之用。

⑤党员之心漠然：

若干党员，在入党前入党后，内心感觉，并无二样，入党前，既乏对党有何志愿，入党后，也不觉有任何新的责任，党员与党员之间亦漠漠然，反不如同乡同学之比较有情谊。

⑥与民众及党员疏离：

北伐初期，尤其北伐前数年，那种党爱民，民爱党的情形，已不复见，党与民众正渐疏离，党对党员，亦相当脱节，党员的行止活动，党无确切纪录，管理掌握，非常脆弱，除选举外，党似乎很少有事要找党员，党员也似乎没有什么事要找党。

⑦“多一个衙门”的考语：

行营有一视察室，视察辖区党政军事宜，其成员系自中央党部及军校高教班各调十人，共二十人组成。（来台后，在中央党部任总干事之谏忠干兄即系此二十人之一。）

我以行营参议兼视察主任，据视察员沈子屏（中央组织部干事）、周步光（训练部干事）联衔报告指出，某县党部，日与地方政府绅商酬应往还，不理党务，该党部在县城

中不过是多一个衙门而已。

⑧党员生命没有保障：

民国十七年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即后来之李副总统）密电其所指挥驻防湖南常德附近盘龙桥之独立第五师师长刘和鼎，文曰：“贵师政治部主任宣介溪确系赤化分子，仰即密拿解汉讯办。”

意外的，在此前数日，有一插曲，参谋长刘尚志（后曾任三十九军长、东北“剿总”办公厅主任），讥评中央党部某一通电中，有“各总指挥勋鉴，各军长各师长鉴”字样，认为革命的最高党部，也讲势利，也不平等。我严责其身为国家军官，对中央不敬，并为阐释国父的真平等假平等之义，及体制之不可不分。

这时，师长亦在旁，他们连连点首，说：一个党员，能坚守立场，维护党的尊严不遗余力，这正是我们军人平日所讲求的忠贞精神，钦佩！钦佩！

他二人均是保定军校前期毕业，师长是三期，参谋长是二期，这时，若有人说我别的，他们或不敢保证，说我对国民党有二心，他们实在无法相信，经过研究之后，他们将密电给我一阅，并劝即日离部回京，以便复电说，“已先离去”。

我感谢他们的爱护，但不赞成逃走，问题既未解决，又令他们受累，我乃一面电呈中央党部彻查，一面带一机警的秘书朱睡僧兄（有舒城才子之称，十九年夏殉职于福建军中），冒险前往长沙谒见第二路总指挥白健公（崇禧），终获澄清。

此事若非刘氏二公之道德勇气，则以那时军事机关办理共党案件情形，必至非刑枉死。党员有我的不二之心，未必能有我的意外机缘，或因涉嫌，或以恩怨，甚或是敌人有意诬陷，呼天不应，呼党不灵，负屈含冤而死者，真不知凡几！^①

（三）谈军队政训

我在民国二十年前，已做过三个部队政训工作：二次北伐，独任左翼的马祥斌部，三度平定闽乱的刘和鼎部，十九年中原大战，解武汉之危的韩杰部。^②

深知：政训工作，对军队掌握，及素质提高，有决定性的影响，军队无政训，若人之失魂少魄，冀其能为国家的军队，能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自属不易，往者如北洋军阀之拥兵自逞，近者如陈济棠之通电诋毁中央，如张发奎之离鄂逃湘回粤，最近更有某团长擅撤兴国，使包围圈功败垂成，

^① 此处论缺失，只是就某些地方着眼，实际上党的健全处，伟大处，轰轰烈烈处，亦是有目共睹的。

^② 马文伯（祥斌）军长于十六年十一月在济南成仁，是革命军高级将领最早为国捐躯者，国民政府曾明令褒扬，配祀忠烈祠。

某军长悍自主张，使行营全盘计划，受到困扰，凡此情形，如经过适当政训处理，当可改观。

惟良药效用，必须药本身保持在良好状态之下，我们检验彼时实际政训情形，发现问题重重，使政训功能，大打折扣。

①人才他流：

民国十八年，中央对政训政策，有大幅度改变，编制缩小，经费减少，阶级降低，职责下限，使有志有才者，多不愿为，政工品质，远不如先。

②歧视心理：

有许多人对政训业务，存一种歧视心理，认为政训人员无需有专业知能，不像秘书要文字好，参谋要军事学识好，没有专长的人，做做政训，总可凑付，设有军官二人，其较优者，长官常喜令他带兵，较次者，才让他做政训。

③影响施训：

部分政训人员，常犯一些小毛病，与军队大家庭生活，不相融和，影响政训施行。例如：

闻枪声而慌乱；

着军服，动作走步，不像军人；

或衣装不整而脏；

或头发散乱而长；

或常识缺乏，一问三瞪眼；

或格格不入，自成小圈圈；

或自以为了不起，装模作样；

或失去信心，到处勉强巴结人；

或言过其实，自毁信誉；

或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等等。

④绩效难彰：

政训，在中央部队里，已渐处于无足轻重地位，政训处在军、师司令部，反不如原有的所谓“八大处”受到重视，勉强排些训练课程，效力有限，可想而知。

⑤疑忌益深：

非央军的某些部队，对政训工作，原有疑忌之心，如所派非人，或人非其地，或各员言论不一，或行动幼稚轻率，更或凡事不满，动辄以小报告上闻，必致疑忌益深，而与中央关系愈远。

三十七年十一月，徐蚌会战中期，我在南京新街口，遇到老友杜之纲兄（安徽凤阳人，军校六期），问他在何处工作，他说，在任吴化文政治部主任，我说：“妈呀！那，吴化文不要叛变吗？”二人拊掌而笑，结果，不久，吴化文果然叛变，影响津浦北段战局。部队叛变，因素很多，但站在政训立场，总希望能有效控制，总须在制度上、人员上、分配对象选择上，尤其工作方法及态度上善加注意。（杜兄，后来在舟山〔或一江山〕任最高政训主任，成绩卓著，舟山撤

退，曾是风云人物。）

（四）谈国家处境

①日俄环伺：

日俄两帝国主义，对我虎视眈眈，伺机而发，中俄满洲里之战，甚至最大规模的战事，随时都会再度发生，主动在彼，所谓“随时”，也许就是旦夕之间。

②中原大战并未结束：

十九年中原大战，冯、阎集团，退败冀、晋，死灰正图复燃，李宗仁集团残余南退广西，勾结广东，形成所谓西南割据之局；川、滇、西北，甚至东北，亦多观望，大局难称稳定。

③共党全面叛乱：

共党除赣南较大一股外，并在湘、鄂、皖、闽边区，及大别山、幕阜山一带出没，同时，配合政治统战，利用矛盾，煽动工人、学生，诱骗所谓左派文人，造成气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亦未可等闲视之。

（五）谈三民主义

我们在前面谈到若干不愉快情事时，有时甚至感到沮丧，但当我们谈“如何挽救”时，不觉的想起传家镇国之宝三民主义来，我们兴奋了！

那年健群兄二十九岁，我二十六岁，虽所知均不多，但健群兄天赋思想深远，且有相当灼见真知，非泛泛可比，

在东路军时期(民国十五、六年,何敬公任北伐东路军总指挥),他就撰写宣言、电文、告民众书一类。我在北大读书时,曾任孙文主义学会北大分会会长(十五年),与陈启修、燕树棠、高一涵诸位教授,往还受教,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可称略知一二。

于是,我们大谈主义,你一句,我一句,谈得十分投机,十分高兴,尤其谈到三民主义的特性,令我们着迷。如:

①思想综合性:

三民主义,是中山先生集中国传统思想、欧美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及自然科学思想大成,复加以自己思想之既科学又哲学的综合思想。

②分合自如性:

三民主义可一分为三,一字形平行前进;也可,以一为主,另二为辅,成三个小品字形并肩推展,三者还一,仍为完整的三民主义。

③一劳永逸性:

如,不致劳资对立。

④免疲性:

如,可免阶级斗争。

⑤伟大性:

如,质诸万国而不变。

⑥永恒性:

如，待诸百世而无疑。

他如，平等性、救国性、平天下性，其神奇奥妙，能不令你着迷吗？

我们确信，三民主义，足可救国，足可兴国，今日之事，只是如何使推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坚强起来！

二、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要点

健群兄与漫谈的结果，乃有《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之草拟。原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及有关资料文献，健群兄密存多年，曾拟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交小女宣中文带美保存，嗣因小女计划先旅游欧洲，并在比利时研习法文一年，再去美国。健群兄虑其年幼往返，或有疏失，未敢托付。后闻该项资料在其公子处，未暇联系。其中若干部分，如蓝衣社组织纲要，如国家政经社教之建设等，多系参研国际政党、国际革命组织，及“文艺复兴”后欧洲各国初建往例，已不复有完整印象，惟属于我们自己构想的部分，记忆犹新。

现作重点式，写出以下五项，俾可窥见一般：

（一）创立蓝衣社

结合党内外革命青年，恭请蒋先生介公领导，在不影响中国国民党的传统及其威望下，别组秘密团体——蓝衣社，担当革命实际任务。

蓝衣，是我国读书人，及农人、工人爱穿之衣，朴实耐用。蓝衣社意义，是知识青年与大多数人民相结合，一个诚朴实干的革命团体。

（二）主旨

在复兴党，复兴政训，团结御侮，富强国家，使我中华民国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柱石。

（三）社员

（1）对象：

不分党内外、地区、男女，凡有牺牲报国之心，身体健康，且有才智、能力，或专长者，均得为吸取对象。

（2）年龄：

年龄以三十五岁以下为原则，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3）程序：

经同志一人推荐，小组会议调查，报上级复查，确定。

（4）宣誓：

由总社或分社高级干部，亲临监誓，务求隆重庄严。

（5）保密：

社员对其入社，及其他有关社的一切，须绝对保密，虽父母妻子，亦不泄漏一字。

（6）服从：

社员对团体命令，绝对服从。

(7) 保障：

社员工作，社员生活，团体保障之。

(8) 限制：

社员之生活水准，及财产，团体得予限制。

(四) 蓝衣社小组会议

小组会议，是最基层、最前线革命战斗单位，必强化有力始能克敌致果，贯彻整体功能。

甲、小组会议任务

- (1) 发掘优秀革命青年。
- (2) 注意有害国家之人及事。
- (3) 利用机会教育，导民万众一心。
- (4) 观察策划，或提供意见，报上级参研。
- (5) 执行上级的指示。

乙、小组会议议程

- (1) 小组长报告上级指示，及其他事项。
- (2) 组员报告交付任务办理情形。
- (3) 组员报告一周动态，或重要见闻。
- (4) 讨论及动议。
- (5) 分配工作。

丙、小组长、书记及小组会议时间

- (1) 小组长由组员推选，连选连任。
- (2) 小组书记，由小组长指派。

(3) 小组长及书记产生后,即报上级核备。

(4) 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

(5) 必要时,小组长可随时召开会议,以迅赴事机。

(五) 办一政训研究所

(1) 目的:

A、吸取同志。

B、革新政训。

(2) 研究科目:

思想、气质、政治、军事、特种技能、政训法则等。

(3) 教师:

精选革命爱国的一流人才聘为教师。

(4) 学员人数:

假定有二百个单位,需要政训,将来调换新人,多则三十人,少则五六人,平均每单位十五人,共需三千人,一次或分批研训完毕。

(5) 学员资格:

大学毕业,或高中以上有特优表现者,各原政训单位,亦可保送一至三人,参加考试。

(6) 研究时间:

以一年为宜,否则半年或八个月。

(7) 招考公告:

招考公告,须注意三点:

A、使应考者明了本所对国家及个人前途之重要性。

B、在各地方，各大报登载公告，并发布新闻。

C、多公告些时日俾应考者众，有利拔取精英。

(8) 考试重点：

招考革命人员，与一般性招生不同，后者多以总平均分数，为录取标准，前者着重革命需要，国文、史地、思想、语言，甚至爱国心、革命性、精神、气概，都在重视之列。

(9) 开办日期：

复兴革命开始，最迫切需要的是人手——同志。而争取同志，由少数发起人一个一个的推介，远不如由招考大批够水准的学员中选拔，在质在量，来得有效，故开办政研所，是复兴革命计划，第一优先。也就是说，本计划实施，最初期，即为政研所开办之期。

三、在京镇皖的筹备活动

(一) 拜会立夫先生

健群兄与我携《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于二十年冬赴京，首先往拜立夫先生，拟先透过立公，再谋革新计划之进一步安排，不意立夫先生适往杭州未返，二人怅怅回寓。

(二) 镇江会商

在等待立夫先生期间，我们乘暇赴镇江一游，同行

者，除健群兄与我外，尚有何敬公主秘谢伯元（钟元）兄、三十九军驻京代表朱镜匀兄，及正读政大外交系黄先进兄三人。

在镇市畅游半日，我们于次晨乘红船（救生船）前往焦山定慧寺素餐，餐后，举行一小规模会议，在那幽美的仙境，在那松竹声、波涛声、钟鼓与木鱼交响合奏的梵音下，我们获得四项结论。

（1）径见蒋先生：

黄先进兄首先提议说：“立夫先生既未见到，我看不必见他了，党的改革，兹事体大，中央辗转研商，既废时日，又不易保密，似不如直接晋见蒋先生。”大家一致赞同。

（2）准备书面：

健群兄提议，请书法甚佳的朱镜匀兄，准备书面节略，以便晋见之用，大家无异议。

（3）活动基金：

镜匀兄提议，在座各捐若干，作为活动基金，我说，那能捐多少，因请镜匀兄以我名义，电三十九军长刘和鼎，请拨五千元交彼，听命健群兄使用（此款数日即到）。

（4）分组进行：

决定，健、谢、镜回京，觅机晋见，黄、我返皖，结合同志。

（三）结合到的人

黄先进兄同我返皖后，即多方联络争取，至五月我离开时，共结合到十二人，都是豪气干云、品端学优之辈，他们是：唐盛铉、叶逸凡、解温涵、汪廷霖、万道同、樊渊、张克魁、邵行格、丁大沛、龚意农、邹同初、夏凌仙（女）等。

（四）发表小册子

约在二月间（二十一年）健群兄在南京写了一篇文章，名曰《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印成小册子，分赠同志、好友，大意是：

①日本军阀，对我已展开全面侵略，筹谋对策，刻不容待。

②领导我们的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与民众逐渐疏离，与党员逐渐脱节。

③主张别组一“中国国民党蓝衣社”，重整党纪，重建民心，庶几党国有力，而敌寇可御。（蓝衣社之名由此不胫而走。）

（五）连续召见

三月间，健群兄经桂永清推荐，在南京晋见蒋先生，并蒙连续召见十余次。事后获知，适在三民主义力行社酝酿成立之时。当时健群给我信说：“我们的复兴革命计划，蒋先生极表嘉纳，对训政部分，尤连连称许不置，此皆我兄之

功”云云。信中并说：蒋先生要他推举人才，他答：“有宣介溪者是天下第一奇才。”^①

四、在政训处及政训班的“一马当先”

我于二十一年五月，离皖赴京，旋即在健群兄主持的军委会政训处及政训班工作，颇有些不寻常的情形，分别记之如后：

（一）在政训处

（1）接收科员吴兆棠为主秘：

我国自有军队政训工作以来，据我记忆，其最高单位，总是设在最高军事指挥部或最高军事主管部门，如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国防部，但我这次代健群兄接收前任对象，却是训练总监部政训处，总监是何敬公，处长是张静愚先生。

我率领两位助理人员前往，对方负责人宣传科长张韶武先生，已准备妥当，移交清册，一目了然，我对文籍财物，均不甚注意，比较重视的是一批人。

我见人员名册上，有一名宣传科中校科员吴兆棠，被用墨笔，轻轻划去，我问何故？张答：“他要到考试院去。”我问：“职务已定否？”答：“尚未。”我说：“既尚未确定，即

^① 此时，健群兄对我评价过高，我只是一乡下人而已。（名作家张佛千兄，于二十二年青年节公开评我老实浑厚，可谓观察入微。）

先划去，万一两头落空怎么办？”

次日，吴君前来看我，说：素昧平生，承如此热心关注，殊深感动，如不见弃，愿随册至新处工作。

我见其谈吐不俗，神态沉稳，两眼炯炯有神，因与详谈，知系留日学生，英、德、日语，均有相当根基，对国事亦多有中肯之见，我暗想，我们所要寻求的革命伙伴，不正是此辈青年吗？

回报健群兄，任以上校秘书之职。

这时总政训处，有四位秘书，两上校、一中校、一少校，中校秘书王大中兄（军校四期，浙江人，曾任陆总政治部主任、中影总经理）、少校黄伯英兄，另一上校，系孙慕迦兄，论资历，论关系，当然慕迦兄为首，但我觉得慕迦兄是独当一面人才，若幕僚长，吴似更较合适，因推吴为主秘，并交与主管印信，代拆代行矣。

吴，后来与我成为莫逆之交，在二十二、三、四年，曾赴德国深造，来台后，曾任省教育厅长，负责主持政大教育研究所，及知识青年党部，深受蒋经国先生知遇，若非英年早逝，以其学识及语言能力，尤其对革命政党的体验，相信于三民主义统一大业，必能有所助益，其夫人现任“立法委员”，多年未晤，想近况佳胜。

（2）罗时实与总务科长：

健群兄之军委会政训处，虽也是掌理全国政训的总政

训处，但其编制，与汪精卫、吴稚晖及陈诚之政治部时代相差甚远，陈之政治部，下面一级单位称厅，阶级中将，现政训处一级单位则称科，阶级上校，此时宣传科长已定留俄学生傅胜蓝，指导科长，军校三期李秉中，均一时之选，只总务科长一职，尚在虚悬中。

有北大毕业，湖南人喻坚冉者，系罗时实兄介绍给我，工作原不问高低，我见其资历甚佳，精神充沛，先请试作数事，颇属干练多能，遂请健群兄任为总务科长。

时实兄，英国留学，号称所谓CC二等人物，因此，有人建议，对喻之引用，宜考虑避嫌，我以“外举不避仇”之义谢之，况所谓CC亦绝非“仇”也。

(3) 设计无功，代打有力：

二十一年，军委会政训处，曾签准增设两个委员会：奖惩委员会，及设计委员会。两会各有委员十人，五少将、五上校，奖惩委员会委员系萧赞育、贺衷寒诸位。设计委员会，五少将系曾扩情、俞大维、蒋坚忍、何浩若、宣介溪。

论理，设计委员会似应注意专案设计研究，但我们那时多只是在开会时，纷纷发表高见，平时好像都很清闲，于是，我个人无形中成为政训处的“机动兵”，哪里需要哪里去。

例如：某单位或某个人有急事找处长，处长不在，或在开会，或接待贵宾而主秘又不能作主时，他们就会找我，

只要弄清楚于处长本人前后处理，不致有矛盾时，我总是站在有利于事的立场，不失时效的，立刻代处长决定，有时也许至会场或接待室联络一下，有时连联络也免了，事后，健群兄亦从无异议。

又例如：有一次康兆民（泽）兄为某事与健群兄弄得很僵，都快要翻脸了，刚巧，我及时赶到，一语解纷，嗣后康兄有事，多径与我谈，或由其至友任觉五兄与我谈，无不圆满愉快（任兄来台，曾主持中央训练工作）。

就这样，我以“机动兵”的姿态，打支援战，打快速战，打遭遇战，甚至游击战，在健群兄与我二人，无分彼此，合作无间，在所谓“最亲密的战友”基础上，解决不少问题，结果，我获得一句似捧，又似讽刺的笑评：

设计无功，代打有力。

（二）在政训班

（1）中大体育馆的口试：

军委会政训研究班二十一年秋的招生考试，应考者有国内外大学毕业，中央军校一、二、三、四、五、六、七期，及高中毕业具有三年以上政训资历的，共约三千人，笔试五门，口试五项，口试之日（似举行两天或三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北极阁前之体育馆，设置五个口试席，及一个主试席。第一试席考学识，主试者：沈遵晦（现任中美文化经济协会总干事）、傅胜蓝，第二试席考能力，主试：梁干乔、李秉

中，第三试席考仪容，主试者：宣介溪、邵令江（所谓仪容，实际是察言观色），第四试席考言语，主试似为萧赞育及一位林某（林次年任福州伪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第五试席考思想，主试者贺衷寒、康泽（或系萧赞育、康泽）。

另在馆内讲台上，设一主试席，主试者，班主任刘健群，他以古诗一句：“前不见古人”五字，作为评判暗号，如判“前”字，并冠“十”号，即“前十”将特予录取。

在口试进行中，主试委员曾因事外出数次，健群兄则命我上台代主试，代判“前不见古人”及“前十”，我的第三试席，则由邵令江代，而由喻坚冉代令江。

（2）唐盛铉等九位全部入班

二十一年春夏，我在皖结合的朋友十二人，除龚意农年岁较大，邹同初有左倾可能，夏凌仙是女的，其余九人，年龄、学识、身体、志趣均宜受训，参加革命阵容，虽其中有任要职，不愿或不能离开者，亦均劝弃职求学，例如，现空军叶逸凡将军，当时正任第五十五师秘书，不克如期到京，即由我代为报名，他原名“显伦”，我嫌其保守，改为“逸凡”，后来，其对国家贡献，果如其人其文，超凡逸俗也（逸凡以青山笔名，著述甚丰）。

唐盛铉等九位录取后，适有在福建任闽北高中校长顾访白来京，顿足叹曰：“我若来得及参加考试，自信我也会被录取！”我见其意诚，请健群兄签奉委员长，特准入学。

(3) “刘健群小组织”与领袖对抗

政训班有学员五百人，带队军官及教职员百余人，计班本部有何浩若、余纪忠、匡正宇等二十余人，总队部有阮齐、曹金轮、李劲翔等二十余人，教官有高信、彭孟缉、布尔林等约三十人。指导员有萧赞育、滕杰、康泽、干国勋、周复等，亦约三十人，我也是指导员之一，任务是辅导政治思想。

我认真的参加分组指导，多次在全体集合中讲话，不断个别访问，星期假日，同学常有数十人至我家，于是，有不明就里的人误会了，说我与刘健群有小组织，说刘健群小组织与领袖对抗。

其实，我只是年龄、知识、兴趣与同学们相近，因此，很自然的声相应，气相投，这是感情方面，在理智上，在革命动机上，我希望与他们多多接近，互相砥励，发掘真才，增加整体革命战力。

我确有为组织之意，但我不是为小组织，而是为在领袖蒋先生领导下的大组织。

刘健群没有小组织。

以上是我于二十一年下半年至二十二年春（以后到华北去了），在军委会政训处及政训班的部分工作情形，可谓相当努力矣。这主要有一大力在支持鼓励，就是我以为我们的《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已被接受，正在施行，所以不觉的振奋，不觉的奋起兼人之勇。

若我知道组织内情，我相信我还是会一样的振奋，因：重要的是“革命复兴”，而成功不必在我。

五、蓝衣社芳踪何去

（一）梦中走失

差不多半个世纪，我一直在梦中，梦中以为蓝衣社就是力行社，力行社就是蓝衣社，力行社是蓝衣社修正名称。一直以为我们南昌的《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为领袖采纳，所以组织团体，所以创办政训研究班，所以任健群兄为书记长，为班主任。

及至一九七九年，看到干国勋兄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内有力行社成立经过的震撼性报导，才震醒了我的梦，才知道力行社筹组在先，健群兄晋见在后，才知道力行社不是蓝衣社。

我的梦，总算醒过来了，但我这一醒，却发觉蓝衣社从梦中走失，下落不明了！

（二）欲问无由

我们曾在京、镇、皖进行筹备，我们曾在政训处及政训班因振奋而勇往直前，我们从未决定停止，怎会一旦消失于无形？健群兄已仙逝十年，无从询问，同时，自近年力行社明朗化以后，一般人都认为没有蓝衣社了，认为蓝衣社之

名，过去所以不胫而走，只是力行社误传之故，因此，所谓“失踪”云云，他们已无兴趣闻问。其实，认为有了力行社，就没有蓝衣社，这种想法，不但与事实不符，在理论上亦不合逻辑的。三人以上志趣相同的结合，就可算是一个社。蓝衣社在二十一年一月前，不但已有具体革命计划，且已有坚定认同的基本同志六人，至四月，已有十八人，不能称作一个“社”吗？诚然，蓝衣社没有全国性大规模的组织，但这并不是有无一个社的必备条件，轻予认定没有蓝衣社，甚至连一加闻问的兴趣都完全失去，似也未免太鲁莽了些吧？况我们曾在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即对外挂起“蓝衣社”招牌，有健群兄公开发表的“小册子”为证，有京沪各报当时的新闻记载为证。

（三）曾有见者

三民主义力行社主要发起人，留日作家于国勋氏，在其所著《孙文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一书中，有关于蓝衣社记载，且对其历史意义，有肯定的评估，大意说，有黔人刘健群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小册子，认为国民党自北伐完成之后，逐渐懈怠走了样，组织松弛，党部衙门化，干部也有不少官僚化，已失去了与大多数人民相结合的国民革命性质，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主张党必须再改造，就其现有数百万党员中，遴选最有革命性者，组织蓝衣社，生活与一般人民打成一片，重建党的领导权威，干氏

结论说：“这与我们的主张，多有相合，这无畏的护党救国呼声，不啻为我们响起了安内攘外的号角，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后，蒋、刘二人皆先后正式加入了。”（按：蒋是蒋坚忍，他在沪办《人民月刊》，主张亦不谋而合；又：《孙文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是士林区华声街五十九号荣文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初版。）

（四）呼之欲出

本第五节，《蓝衣社芳踪何去》，旨在研究蓝衣社的下落，上文所引干氏书，只是报导蓝衣社早期动态，只是对那些认为没有蓝衣社的人，作有力的答复，对蓝衣社的下落，没有触及。

蓝衣社既不是虚无飘渺，只凭传误得名，则天下任何事物，总有个来龙去脉，最低限度，我们本人总应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过去一直混沌于梦中，现在梦醒了，我必须明白其最后行止何在，我要继续追踪！

甲、线索

（1）镇江会商时，决定由健群兄在京觅机晋见蒋先生，并准备书面节略。

（2）桂永清于二十一年三月五日，在力行社筹备成立会中，当众向领袖推荐健群，并说他已有具体计划，领袖囑于次晨八时往见（见《传记文学》二〇八期干国勋文）。

（3）健群兄在二十一年三月，曾先后给我信，谓蒙连续

召见十余次。

(4) 领袖于短期内，接续任命健群兄为军校政训主任、军委会政训处长、政训班班主任、力行社书记长等四要职。

(5) 七月间，我尚未加入“革命青年同志会”前，在汉口怡和村晋见领袖时，领袖要我“正是非，转风气”，“加强国民心理建设”（见《传记文学》一九六五年八月号第七卷第二期拙作《追念宋哲元将军》一文），我既非地方大员，又非中央主管，以如此大责相嘱，似隐然有团体使命。^①

乙、假设

根据以上线索，蓝衣社最后行止，或与力行社有关。现，假设：与力行社无关，试析：

(1) 领袖第一次召见时，健群兄无论如何，必不放弃蓝衣社革命计划，这是数月来唯一预定的日程，如第一次没有充足机会，则第二次，第三次，接连十余次，犹没有报告，是不可能的。

(2) 这时力行社，正谋成立，或方告成立，健群兄之适时报告，当值参考，如认为不予重视，不加考虑，也有问题，因为假若如此，何致连续召见？又何致那样被重用？

(3) 桂永清推荐时，说健群兄已有具体计划，领袖即命次晨召见，可见领袖亦欲早听听，早看看别人意见，参考研究。

^① 邓雪冰（文仪）与我深相知爱五十年，即是在这一次晋见时订交的。

(4) 领袖之重用健群兄，或只是重视其才，或同时也有“革命计划”因素，如只是前者，用之为政训主任、政训处长，犹有可说，用之为班主任，已难理解，更何况力行社何等神圣，书记长何等重要，岂可轻授他人？

有人说，领袖之重用健群兄，系由何敬公大力保荐，这一点也不太可能，第一，敬公未参与力行社秘密；第二，敬公用人唯谨，试举一例：三十三年，日军进犯黔南独山，贵阳岌岌可危，敬公奉命日夜兼程赶赴贵阳坐镇，随身仅偕负社会责任的谷正纲、党务张道藩、政治刘健群几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

一日，敬公向谷等问曰：“贵州的长衫朋友（指文人），哪一位可任主席？委员长要我推荐。”正纲答曰：“健群就很好嘛。”敬公未语，谷、张去后，健群未走，敬公说：“你来贵州任民政厅长如何？”健群兄婉辞而去。

可见，敬公大力推荐一说，也是无根据的。

可见，“与力行社无关”之假设，难以成立。

(五) 不谋而合

根据以上分析，及若干其他细节，深信，健群兄是带着我们的《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去晋见领袖的。领袖见其与力行社主张，多相吻合，极表嘉慰，将计划纳入力行社，并准健群兄为力行社社员。

健群兄加入力行社之日，也是“蓝衣社”有新归宿，不

再单独活动之时，只以团体保密，健群兄仅告我计划已蒙采纳，别有力行社之事，则不克相告，或亦曾有所暗示，我未能注意耳。

始而，我们在百花洲的忧党忧国之心，及以推戴蒋先生介公领导的复兴革命计划，与创建力行社之护党救国筹备处诸先进同志在日本、京沪所主张者，同时异地，不谋而合，终乃无形合流为一，亦革命佳话矣，使革命军人、革命青年，同为护党救国、兴党兴国而努力，诚复兴发展一盛事也。

此对力行社，所关尚微，除导致误传“蓝衣社”之名外，实际上不过获得少数同志，及一纸未见有何作用之所谓具体计划而已。

但对蓝衣社而言，则意义重大。镇江会商以来，同仁一直希求：晋见领袖，报告计划，并访取志同道合之人。今，一日之间领袖见到了，计划采纳了，复又能与数十位第一流的志同道合者汇为一体，如穆鲁乌苏、楚玛尔之与通天河；如黔江、长河（亦名水阳江，在芜湖入口）之注入扬子江，宏大川以“潜势”，附骥尾而“行”益“力”。

蓝衣社幸矣！荣矣！

或有以为，我在高攀力行社，求分享力行社光荣，会吗？力行社固光荣，但我已是力行社社员，且忝为中央干部之一，健群兄更曾数任书记长，复何高攀分享之有？

我只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揭开“蓝衣社之谜”而已。

（原载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五期）

复兴社 青白社 蓝衣社

——一个“复兴社”参加者的自述与观察

陈敦正

复兴社

九一八事变后，人心震荡，举国哗然。党政不能协调，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使人忧心忡忡，极为烦闷。廿二年（一九三三）一月，我开始发现政治上的新希望，暗中知道有中国革命复兴运动的活动，系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由蒋公直接领导，私衷倍感兴奋与喜悦！但我出身文学校，在工作上、人事上、政治上，与他们毫无半点渊源，我如何能够与他们发生精神上或实质上的联系呢？由于我是新闻记者，便在南京《中国日报》写文章，试探这个组织的反应，以便设法参加。

这个组织的活动，当时外传为“蓝衣社”，直到我参加以后，才证实它的正确名称，是“中华复兴社”，简称为“复兴社”。

我在《中国日报》写文章以前，并不知道该报就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只觉得他们的言论，与我当时的见解，若合符节，颇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我记得第一篇，是以“读者来论”的方式写了一篇《提倡体育与复兴民族》的文章，连续两天，刊在该报的教育版，畅论德国与日本之强，得力于提倡教育，而今强邻压境，尤应以效法他邦的精神，复兴民族，雪耻图强。这篇文章，居然获得了“复兴社”的重视，一再派人与我接触和谈话，终于在不久以后，我被吸收，加入了“复兴社”。

在吸收的过程中，首先与我接触的，是《中国日报》教育版编辑刘慎旃先生，他是四川涪陵人，谦和有礼，他提出当前国内外若干问题，和我讨论征询我的意见。其次，有一个刊物的主编何乃黄先生，也和我谈过若干问题，这个刊物，我想了半天，记不出名称，只记得在南京太平路一间楼上办公，似乎是“大陆杂志”？或“大路月刊”？已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位和我接触的，是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科长王运明先生，他是四川人，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系毕业，短小精干，有组织天才，能说，能写，能跑，我至今对他的印象极深。

写到这里，我得先来一段插曲，免得忘记。这是一件小事，但证明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

大概是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的事，因为手边没有日

记，也没有其他参考资料，所以时间不一定很准，但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党方”（CC的特别称呼，以别于黄埔系的“复兴社”）周伯敏先生任南京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社方”（复兴社）张元良先生（军校一期毕业，四川人）任书记长，王运明先生任组织科科长，周先生代表“党方”，以去之为快，但王运明办事认真，无懈可击，后来，运明奔母丧，请假去了四川，王预计路程，不能如期赶回南京，可能迟过一天半天，所以在路上拍了一个电报，请求续假三天，周先生接到上述电报后，即密嘱收发人员搁置，迅即以王运明逾假不归为借口，将王的职务开缺，径提委员会报告，越半日，王运明赶到，以接替有人，而不获挽救，手腕之狠，双方斗争之烈，如此可见一斑。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的春天，我承张元良先生的邀请，进入“复兴社”总社宣传处工作，我为避免机密外泄之嫌，辞去上海和长沙各报的职务，改以南京《中国日报》、《中国晚报》记者身份，对外掩护与活动。

我到“复兴社”总社工作（其实，我们同仁之间，都互称总会，而不称总社，这在以后的说明，便可知道），就我的收入来说，有了重大的损失，但青年人，不计较这些，只存一种政治的希望，和未来的远景，我当时在宣传处的名义，只是一名助理员，不对外公开，也就无所谓了。是时，各

处设干事一人，助理干事一至二人，以下一律称为助理员，分职办事。每月薪津，大学刚毕业者六十元，最高亦不过一百元，如在外任职，超过一百元者，须捐送社方，在当时，一纸规定，莫不遵行，且视为荣誉，毫无怨言。其后，业务逐渐开展与繁忙，各处之下，亦分组办事。我到宣传处时，大约月薪八九十元，其后加到一百元。在当时生活水准之下，个人生活，已够开支。不过，前项限额收入，由于网罗人才，在编制逐渐扩大之下，人数增加，不到一两年，已经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做到。

我到宣传处的时候，干事已由康兆民（泽）先生交给任觉五先生。康同时也是中国日报社长，任为副社长。任因负责政治大学社务，由于某一学生失踪案，被蒋公羁留在特务处，以后才被查明释出。（当时，戴雨农〔笠〕先生为特务处干事。唐乃建〔纵〕先生为助理干事。）实际上由张元良代理宣传处干事。下设助理干事二人，一为李天民先生（号仲达，四川人），后来做了“立法委员”，为有名的“匪”情专家。一为俞季虞先生（浙江人），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在卅八年（一九四九），由上海到台湾途中，乘太平轮，失事淹死。

其后，我由宣传处，调到书记处，再由书记处，调到训练处，然后由训练处，调到组织处，轮流服务。

我到书记处服务时，是酆悌先生（号力余，湖南湘阴

人，军校一期毕业)任书记。廿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第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集会，力余先生以在任助书陈光国，涉嫌刺汪(精卫)案乃被去职调往湖南常德，任行政督察专员，于廿七年(一九三八)，死于“长沙大火”一案中。

至于刺汪案之陈光国，原为胡汉民系刘芦隐所组织之新国民党分子，系金陵大学毕业，与酆力余先生内弟孙茂柏为同学。(酆妻孙颖夷，另一弟为孙慕迦，同为复兴社同志。)在南京以办理神州国光社为名，蓄意要打入“复兴社”，以为工作掩护，乃走孙茂柏路线，而取得酆之信任，酆因受感情蒙蔽，派陈为总社助书。当日，刺汪案，即为陈光国受反动派王亚樵等所指使，以照相为掩护，亲自开枪，无奈，为张继(溥泉)先生发觉，自其后将陈光国拦腰抱住，而未达到目的。(当时报上所发表者，为孙凤鸣其人，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开枪射杀，实非也。但孙凤鸣即为陈光国之化名，或有可能。一说陈光国系由日本人收买，亦有可能，并录于此，以供参考。)事发，陈遭枪毙，而酆亦无辜受累，被革书记职务。

刺汪案在当时政治上、社会上，搞得满城风雨，牵连颇多；四届六中全会时，中央党部系由叶楚傖先生任秘书长，叶之本家叶敬持先生(江苏崑山人)任事务科长，主持发证工作，叶不在，适陈光国请领大会出入证，复因一位新闻记者未到，乃由其事务科干事周希龄先生作主，发证给陈(周

为湖南人)。但事后查明，周、陈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却因此受到安全人员的审讯，吃了很大的苦头。

我调到训练处服务，是滕杰先生（号俊夫，江苏阜宁人）任干事，当时滕俊夫刚和杜心如等，由欧洲考察德国社党和意大利黑衫党（法西斯党）归来；滕先生穿了一身油绿色的制服，上面是中山装型式，结领带，下面是马裤式细裤脚，着上马靴，精神饱满，非常神气，但事后滕先生看到我的《元霞阁随笔》对我说，他从来不神气，而是严肃。据滕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军服。他和助干汤武先生（后任驻赖比瑞亚、智利等国“大使”）一道接事。不久，俊夫先生就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他在南京励志社和戴日恒女士结婚，我还躬逢其盛。（滕之原配为陈启坤女士，为陈启宇之妹，因病去世，这是第二度结婚。）以后俊夫先生做过南京特别市市长，及国民大会代表等要职，到了台湾。

最后，我被调到组织处工作，当时是高传珠先生任干事（高号晶斋，山东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助理干事是匡正宇先生（江西人），后来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到了台湾。继后担任干事的，有骆德荣（四川人）、梁干乔（广东人），助干也有多人调换。不过，骆、梁两位先生的字迹与神情，喜欢模拟蒋公，使我记忆特别深刻。

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三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开会（即以五全大会代表为代表，未另行选举），经大会一致决议，修改党章，推蒋公为总裁，以汪精卫副之。随后，接开五届四中全会，决议：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乃适应时代要求，于是年六月，宣布结束（以下简称“武昌会议”）。当时，我是以“复兴社”总社组织处指导组组长的身份终其职。在我以前的指导组长，为徐君佩先生（安徽庐江人），因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并到欧美各国考察，去国经年，故由我担任。后来，君佩先生做了“立法委员”，到了台湾。

青白社

这里要附带一提的，就是“党方”的组织。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可是，外界并不如此称呼，仍称为CC。CC起源于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英文字母开头，因当时党务工作，实际上由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负责为多，故亦附会为二陈的组织，以陈为C字开头故也。嗣因“复兴社”成立，CC亦为加强组织，改名为“青白社”，以资对抗，但外界仍以CC称之，正如外界称“复兴社”为“蓝衣社”一样。此一组织，和“复兴社”一样，在二十七年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在武昌同时宣布解散，已不复

存在。

关于CC这个组织，在我后来所见到的资料，陈果夫先生和陈立夫先生，均有详尽的解答，兹分别摘录于后，以供关心中国近代史者，参考和研究。

（一）陈果夫先生所著《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解释CC之由来于下：

当本党统一的局面逐渐完成之际，共产党又造作出大同盟，CC团，两个名词来离间分化中央的力量。大同盟是指丁先生而言，CC是指我而言，因为当时丁先生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的缘故。他们开始是在党内外散发传单，说我组织CC团排挤丁先生，说丁先生组织大同盟，来对付我。此种传单，散发得很普遍。有一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姓段的寄来秘密信，说是丁先生如何组织、在何处开会，和如何筹划对付我的办法等等。我正要到中央秘书处和丁先生商洽公事，就随手把信放在口袋里面。到了丁先生的办公室，丁先生恰巧在拆阅信件。我看到丁先生拆到一封信，与给我的信，笔迹相似，而且信面同为姓段，乃互相交换阅看，大家才明白是有意挑拨的。后来查知段某是一个共产党。过了十几天，丁先生接到北方一部分同志的来信，并看到他们的传单，在某处开会，是专为反对我的。丁先生告诉我说，他们是中了人家挑拨之计了，应该派

人去说明才好。于是他就指派郑异、洪陆东两位同志到北方去，才把事情平了下来。当时有某某等，特地到南京来见我，向我当面解释，怎样受骗与误会的情形。后来胡展堂、孙哲生两先生返国，第一次参加常会，也因为受此传单影响，竟指我与丁先生组织小组织，向常会提出诘问。我同丁先生均在会说明这回事情，完全是奸人造谣，并申诉我们以取消小组织统一于党为主旨，决无自己再组织小组织之理。过几天，我在中央纪念周特别声明，我同丁先生没有大同盟和CC的组织。并且说明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道理，以及为党统一组织的原理，和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与发现的经过等，从此谣言暂息，但是CC这个名词，没有消灭，以后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别的小组织，对于中央党部及我等，亦以CC为称。日本人窥伺中国，更从中煽动，一似真有CC之组织，甚至为一可怖之组织。共产党造作此谣言，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一贯做了二十几年宣传工作。以乌有之名，传遍世界，可谓怪事。民二十七年共党在长沙召开干部会议，有本党调查同志秘密参加，据其报告，徐特立估计国民党之力量，以CC与蓝衣社为大，共党今后应以CC与蓝衣社为对象。并向干部指示：蓝衣社方面，可以用鼓励民族方式驱使其牺牲，至于CC必须全力对付之。当时有人问CC的组织章程是怎样的呢？徐说没有看见过，不过凡是反共，与陈某等接近，或

是调查人员，或曾为国民党做过事而不肯变更意志的人，均可以CC目之。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故CC之名，实由于本党十七年完成统一之后所反应出来之名词而已。（按文中丁先生系指丁惟汾先生而言。据史学家李云汉先生指出：丁先生并未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只任青年部长，当时秘书长为叶楚傖，果夫先生记述有误云云。——作者附记）

（二）陈立夫先生在传记文学杂志社所举办之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陈果夫座谈会”上主讲《我所知道的先兄果夫》中，解答CC这个谜，谓CC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称谓。认为绝对没有这个组织，其理由如下：

一、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

二、本党总章严格规定，不得有小组组织。负责党的组织的人，必须以身作则，怎样能知法犯法？如果真的犯了法，总裁怎能不予制裁？

三、先兄最恨用外国文字命名，怎能用CC来为自身命名？

四、戴雨农同志的调统组织，人人知其为最严密，岂能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找不得一点证据呢？

五、先兄与本人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

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唯其“为而不有”，才能“为其所当为”，来帮助领袖，指挥拥有五百余万党员的党啊！

但是何以仍有这样一个名称的存在呢？让我告诉大家以经过。先兄是首先主张党内不应有小组织的，所以在民国十六年在南京召开的全会中，正式提案通过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在军阀下面作秘密工作时，本党同志不得不用一可公开之名称以作掩护，例如：在河北平津有兴中会、实践社，山东有大同盟，江西有AB团等小组织种种不同之名称）。这是对共党不利的，减少他们在本党内作分化挑拨之机会，但是不择手段的共党，竟复捏造出一个名称叫“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向各地本党同志宣称，“中央自己有CC小组织，偏要你们取消你们的，不要上当啊！”这种挑拨，居然发生了一部分影响，北方有一二小组织，竟不肯登报解散。后经本人（时本人任中央秘书长）去平津亲自加以解释，始知受共党煽惑，而一一自动解散。共党知计不得售，乃改称CC为代表两陈，陈字英文拼音首字母亦为C（此时家兄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本人为中央秘书长）。其时本党元老，均各拥有一份力量，对于我兄弟二人在党内负责实际重要责任，而时时在为党建立中心力量，使蒋先生的军事力量与党配合，亦间有感不安者，故对

CC所指，亦不无半信半疑，共党在叫，他们的部下亦在叫，于是积非成是，共党之计售矣。以后党与团共存，磨擦日增，此一名称，更感用之日广，日寇又时在报上公开认CC为反日中心，尽力渲染，众口铄金，不胫而走，而本党亦不为忠贞同志辟谣，任人诋毁，痛心曷极！所以有多人曾劝先兄对于此事加以声明，先兄认为不必要，他认为敌人所加以我们的诋毁，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共党，可以指白为黑，无中生有，是他们的惯技，本党同志不应信之，信之者，未加深察之故，时间与事实，自会将之澄清的。

以上为陈果夫先生和陈立夫先生，对CC的说词。

但在“陈果夫座谈会”上，同时有近代史学权威沈云龙先生，和“立法委员”萧赞育先生发言，是值得重视的，兹将沈、萧两先生发言，分别摘录于左：

沈云龙先生：CC与果夫一生大节无关

最后，一谈所谓CC派系问题，这好像是果夫先生一生大节所关，但究竟有没有CC？则有人言之凿凿，确有这个组织，有人则极力否认，纯属无稽谰言；有的唯唯否否，似有若无，我个人以为都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一个全国性拥有众多党员庞大组织的政党，由于主张保守与激进之不同，或政治权益分配之不得其平，因而内部发生若干派

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纵然派系之间有争执，也是其争也君子。甚而至于由派系而脱离母体，另成立一新的政党，此在世界民主国家中，人民有政治结社之自由，亦属事所常有，无足惊奇。若如胡汉民先生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那才是误解政党政治极可笑的偏狭之见。中国政党政治不能步入公平竞赛的正轨，未始不是一大原因。因此，果夫先生之称为CC领袖，或对CC，有若干不满的批评，完全出自反对者之口，无用重视。足以证明果夫先生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的。

萧赞育先生：CC无损于果夫先生

至于刚才好几位谈到CC问题，我现在也说出我的看法：

我们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直到抗战胜利止，在这长期艰苦复杂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始终要和阴险邪恶的共产党斗争，还要不断跟一般腐恶反动势力斗争，而且这些邪恶反动势力，无论在党内、在党外，到处混杂潜伏，我们为了要巩固党的基础，维护革命的胜利，我们自身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党性，来跟这些敌对势力相抗衡的话，那么这场斗争，还能继续斗下去吗？所以为了革命，必

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战斗中心来作党的先锋和党的中坚，才可以去打仗，才可以战胜敌人。这一点我的看法和沈云龙先生相同。至于人家说CC也好，或其他的名义也好，甚至于有没有这一个组织，我认为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是一个值得计较争论的问题。对果夫先生来说，我以为并无损害可言。果夫先生在本党的地位，对革命的贡献，不是CC这个问题所能影响他的。

我在“复兴社”总社，服务多年，就所接触的问题，和所看到的资料来说，完全同意沈云龙先生和萧赞育先生的看法。“复兴社”的同志，似为较年青的一代，热忱！坦白！有勇气面对这些现实，却不懂得政治艺术的窍门，台湾“复兴基地”，大揭“复兴社”以往的秘辛，在香港《春秋杂志》、台湾的《中外杂志》、《传记文学》、《中国报导》等刊物，均有“复兴社”以往的同志，发表长篇文字，报导以往“复兴社”的情形和对国家的贡献，积极的表现了这一确切的事实。邓雪冰（文仪）先生更在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报导》各期上，发表《民族复兴记》长文，详尽的报导“三民主义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中华复兴社”的实际情形，这些都是所谓“蓝衣社”活动的史实。

我在写本书时，曾多次与“复兴社”（包括前述三个名称的总称）主干贺君山（衷寒）先生、滕俊夫（杰）先生等，

有无数次的长谈，有详尽的笔录，以帮助我个人的记忆、印证和参考。故所记非徒我个人的回忆，实均有所本，如所谓CC之“青白社”，即为君山先生亲口向我说明这一史实。贺先生为“复兴社”主要负责人之一，想必不致凭空捏造此一事实。而萧化之（贇育）先生，为当时随侍蒋公的秘书。他在蒋公的身边，有无“青白社”，心里当非常明白，在座谈会上，我想他为着某种顾虑，不便正面指证，而提出上述的看法，我认为是非常中肯的。

至于立夫先生所提理由中之第（四）项，说戴雨农同志的调统组织（笔者按：实际上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别于徐恩曾所领导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其能“找不到一点证据吗？”这话就我当时在“复兴社”服务，所接触的资料而言：是“特务处”戴雨农先生向总社所提供的，属于极机密文件，例不公开。沈云龙先生说：“……有人言之凿凿，确有其组织……”想亦有所本而言，笔者不想在此深入的研究。

至于果夫先生和立夫先生说“中共如何捏造事实，利用机会，从中挑拨离间，渗透破坏”等等，乃题中应有之义，这事实一点不假，对“复兴社”亦莫不如是，在此暂且不提，我只是提供双方资料，略抒个人观感，藉供读者与研究现代史者参考而已。

蓝衣社 干部群

“复兴社”外传为“蓝衣社”，起因为刘健群先生在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三月以后，以个人名义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做《意大利黑衫党》，刘先生主张中国革命，须仿照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精神，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由于法西斯运动，穿黑衫，被外人称为黑衫党，故主张此一组织的干部，着用蓝色的制服。后来，这个小册子被泄露出去，而当时，中国革命复兴运动，正在开始，误认即为此一组织，无以名之，名之为“蓝衣社”，于是不胥而走，传遍各地。其实“复兴社”筹组在前，刘健群这个小册子在后，虽然刘后来参加这个组织，并担任其重要干部，这个建议，并没有被社方采纳，没有任何干部或工作人员，穿着蓝色制服的事实，只是出于一种牵强附会，令人可笑而已！

“复兴社”的全衔，是“中华复兴社”，我们要叙述这个组织，必须从它的核心组织讲起。它的核心组织，最里面的一层，叫做“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或“力社”，以原始发起人及少数由“青会”（详后）甄选合格的干部为骨干，限制极严，到“武昌会议”时，“力社”的同志，约三百余人。所谓“青会”，包括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叫做“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叫做“革命军人同志会”，顾名思义，就知道它的性质和发展的路线了。

我们在总社服务的同志，都互称“总会”，就是由此而来，意指“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会而言。两个会都在一起办公，均简称为“青会”，开始在形式上，分别设职办事，有所区别，但后来便混在一起，只是指定某些同志，兼办“青会”业务罢了。“青会”的同志，是以“复社”（复兴社的简称）同志的努力与贡献，分别考核，加以晋升。到“武昌会议”结束时，约三万余人，可见考核很严，晋升不易。至于“复兴社”同志，在廿七年（一九三八）六月，“武昌会议”结束时，约计十万人，详细数字，已不可考。因原始档案，由武昌迁到重庆，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又由重庆迁回首都。卅八年（一九四九），大陆情势逆转，在沦入中共之前，便完全销毁了。

此外，在“复兴社”的周边，尚有各种不同的周边组织，如“忠义救国会”，“华侨青年社”……等等，我已记不清，不在这里详叙了。

现在再谈“复兴社”组织的本身。“复社”上承“青会”与“力社”的领导，其组织系统：由总社（会——含青会之意，以下同），而分社（会），而支社（会），而小组，共分四级。在首都设总社（会），各省市设分社（会），各县市设支社（会），以下再分别编为各种小组，另在各种产职业部门，成立各种分支机构，或党团小组，如军队分会、交通分会、新闻小组、体育小组等等皆是，悉视实际需要，采取灵活编

组，以资因应。

总社的组织，在社长（由蒋公兼任）之下，分别设置干事会与检察会。干事会设干事十七人，常务干事五人；检察会设检察九人，常务检察三人。干、检两会，各设书记一人，综理社务，分别向干事会及检察会负责，“干”“检”两会，则向社长负责。“干”“检”两会，并视实际需要，设助理书记（简称助书）一至三人。干事会下，分设书记、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

总社干事会，最先设常务干事三人，是由贺衷寒先生、滕杰先生、康泽先生担任，其后增至五人，除原有三人外，增加曾扩情先生、桂永清先生二人。检察会常务检察三人，则是由周复先生（号旭人，江西临川人，军校一期毕业，后来于“苏鲁边区剿匪总部”任政治主任，为共党所惨杀）、田载龙先生、李秉中先生担任。以周旭人先生任检会书记较久。

总社的书记，由“力社”、“青会”、“复社”，大体是三位一体，由书记一人，综揽其事。“力社”与“青会”，属于权力与决策机构，“复社”才是真正推动工作与展开业务的机构。不过，有时候因事实的需要，亦有分别设置书记的情形。“力社”由开始至结束，共有五任书记，每任大体上任期一年，他们是滕杰先生、贺衷寒先生、酆悌先生、郑介民先生、康泽先生。其中“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书记，则一度

由潘佑强先生担任。“复兴社”总社的书记，曾一度由刘健群先生、邓文仪先生担任。其变迁情形，似乎是这样的：

总社成立时，书记职务，原应由贺衷寒先生担任，因贺先生就任“江西剿匪宣传处”处长，乃由滕杰先生担任。其后，贺衷寒先生出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乃由贺兼任总社书记。至民国廿三年四月，曾扩情先生继刘健群先生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乃以中央军校政训处长兼书记职务。旋因刘先生患病，去庐山休养，乃由酆悌先生出任书记，嗣因其任内助书陈光国涉嫌谋刺汪精卫案，酆乃去职。是时，刘健群先生复去北平，因《何梅协定》，北平军分会裁撤，改为陕甘豫鄂边区“剿总”，刘又由北平回京，复任总社书记。至廿五年春，陈济棠等，在广东谋叛，乃成立军委会广州行营，刘先生出任行营第二厅（掌理党政事项）厅长，仍遥领书记职务，由贺衷寒先生以常务干事名义，兼代书记职务。时邓文仪先生，适任新生活促进会总干事，到广东视察，刘以邓较为闲暇，嘱其到社代理书记职务，复由贺衷寒先生推荐，乃于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秋，真除书记职务，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蒋公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达十日之久，于廿五日始还蒋公自由，翌日（廿六日）中午，由张学良恭送还京。廿七日中午，蒋公即于中央军校官邸，传见刘健群先生，嘱即留京整理社务，刘为聪颖明达之士，以其非军校出身，又非现任带兵官，且广

州行营工作，亦复重要，乃力荐郑介民先生担任是职，蒋公照准，郑乃出任书记职务。直至廿六年秋冬之交，乃由康兆民先生接替书记职务。

据说：蒋公十二月廿七日，迅速传见刘健群先生，乃因《中国日报》登载蒋公回京消息，标题为《脱险回京》，有失对领袖崇敬，不如《中央日报》等之标题为《由张学良恭送回京》，或《恭迎回京》。故蒋公当以手令两纸交刘先生，其一为着刘健群即日回京整理社务（指复兴社），其二为着《中国日报》即日停刊。这两件事，后来均获得解决，前者由刘先生推荐郑介民先生接任书记，后者将《中国日报》改组，由顾希平先生接任社长。——原任社长为康兆民先生，副社长为任觉五先生。

至干、检两会的助书，先后担任者，共有多人，兹就记忆所及，列举名单如下：

侯志明（广东人，为首任助书）

顾希平（江苏人）

何衡（字幹夫，贵州人）

王受泰

吴兆棠（字昭谔，安徽休宁人）

倪文亚（浙江乐清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刘广璞（字性天，沈阳市人）

袁其凝

任觉五(四川灌县人)

陈光国(南京人)

王超凡(安徽太平人,军校四期毕业)

王大中(浙江人,军校四期毕业)

陈介生(四川南部人)

梁其林(检会助书,在任颇久)

“复兴社”在当时,外传有所谓“十三太保”,乃出于上海一家小报的报导,这家小报,已记不清楚它的名称,只知道是李济琛、陈铭枢等在上海租界所组织的“复社”(与复兴社的简称相同)所出版的机关报。它所指的“十三太保”,实际上多是最先的发起人,分任干事会的干事,和检察会的检察,事实上,不止十三人,其人名大致如左:

滕杰(字俊夫,江苏阜宁人)

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

康泽(字兆民,四川安岳人)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

郑介民(广东文昌人)

黄珍吾(字静山,广东人)

高传珠(字晶斋,山东人)

周复(字旭人,江西临川人)

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人)

潘佑强(湖南人)

李一民(湖南人)
邱开基(云南人)
刘咏尧(字则之,湖南醴陵人)
袁守谦(字企止,湖南长沙人)
田载龙(检察)
李秉中(检察)
彭孟緝(字明熙,湖北武昌人)
干国勋(湖北人)
曾扩情(四川人)
刘健群(贵州遵义人,筹备初期无,后来参加)
酆悌(号力余,湖南湘阴人)
胡宗南(浙江人)
邓文仪(号雪冰,湖南醴陵人)
梁干乔(广东人)
叶维(四川人,军校四期)
葛武桀(浙江人,军校二期)
萧赞育(字化之,湖南邵阳人)
胡轨(字步日,江西萍乡人)
赵范生(贵州人,军校五期)
娄绍铠(湖南人,其妻骆亚林,亦在团体服务,其后离
婚)
邵令江(浙江人)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七”芦沟桥事变，是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发生，八月十五日，南京开始受日军空袭，总社开始疏迁，初由明瓦廊搬至玄武湖附近大树根办公，至九月下旬，始循津浦、陇海、平汉等铁路，历时数日，迁至武昌，与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兆民先生)，在一个地方办公，第二厅在外，总社在内。至廿七年(一九三八)六月，宣告结束。

关于“复兴社”的组织及其重要干部，以上所记，系就我到“复兴社”工作以后，所了解的实际情形。初期组织及重要干部，容或略有出入。邓文仪先生在《民族复兴记》长文中，曾详述“三民主义力行社”初期成立的情形及其重要干部，是这样的。他说：

二十一年春，江西、湖北的共产党，倡言扩党百万，扩军百万，占领大城市，宣称要在夏季端午，进占南昌，秋季中秋，进军武汉，事实上他们已利用中央军在上海抗日战争之机会，在江西进攻赣州、万安，情势非常紧急严重，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应付共匪的猖狂暴乱，国内战争的爆发与危急，更有甚于国际战争。

国民政府由于上海中日战争的威胁，已于廿一年二月决定由南京迁都河南洛阳，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三月初在洛阳开会，决议以洛阳为

行都，西安为西京，并发表宣言，以长期抗战决心昭告国人。中央政治会议推蒋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救国。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任蒋先生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负责救国，规划第二期对日作战方案，授权全力清剿长江流域共匪暴乱。蒋先生受命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持危治乱，救国救民，惟有凭借复兴革命复兴民族的一片赤忱，及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组织，由团结黄埔学生发扬黄埔精神，进行有如东征北伐时期的英勇战斗，遂在匆匆组织军事委员会的同时，更集中精神来建立国民党革命领导中心，于最短期间内，完成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组织，并使之迅速动员革命干部，前往长江流域豫鄂湘赣各省，和共党共匪匪谍汉奸，从事革命决死的战斗。这是革命成败，党国存亡，客观的迫切需要，也是唯一的治乱扶危的方法。三民主义力行社的成立与需要，乃是当时民族兴亡，革命成败的关键。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成立大会，是三月八日在励志社礼堂举行的，参加成立会的人数百余人，除力行社的基本社员近百人之外，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也有数十人参加。成立会由社长蒋先生主持，他简单说明力行社成立的宗旨在“驱除倭寇，复兴民族，力行主义，完成革命”。当前的任务为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对肃清汉奸，诛锄匪谍，严惩贪污，移风易俗，复兴民族，改善民

生的工作，务须切实进行。如何团结革命青年、革命军人，组训国民，改造社会，改善民生，组训干部，严密组织，严守秘密，健全本身，刻苦耐劳，任劳任怨，不惜牺牲，乃是每一个社员会员都要切实负责，身体力行的。国家兴亡，革命成败，实在本社，希望大家都能力行三民主义，为巩固中国国民党，复兴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危亡，改善人民生活作最大的努力，人人都要作无名英雄，奋勇牺牲，革命救国，一定可在大家手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希望大家精诚团结，互助合作，急起直追，共赴事功。

社长致开会词之后，由中央干事宣读力行社章程，及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组织纲要，与纪律条例和保障生活限制生活条件，接着由社长宣布发起人社员选出的力行社干事会的干事。名单为干事滕杰、贺衷寒、胡宗南、康泽、桂永清、潘佑强、萧赞育、邓文仪、鄞悌、孙常钧、郑介民、邱开基、葛武棨十三人为中央干事，李一民、骆德荣、韩文焕、易德明、干国勋、戴笠、彭孟缉、刘诚之为候补干事。检察会检察的名单为周复、杜心如、李士珍、田载龙、李秉中。候补检查白瑜、娄绍铠、叶维。经干事会决定由滕杰、贺衷寒、康泽三人任常务干事，滕杰兼任书记。李一民干事任总务处长，萧赞育干事任组织处长，邓文仪干事任宣传处处长，桂永清干事任军事处长，戴笠候补干事任特务处长，周复检察任检察会书记。干检会名单

宣布之后，接着宣布革命青年同志会干事由力行社干事兼任，以葛武荣为常务干事兼书记，干国勋为常务干事兼负责组织责任，康泽为常务干事兼负宣传责任。革命军人同志会，由潘佑强任常务干事兼书记，易德明为常务干事兼负责组织责任，娄绍铠兼负宣传责任。两会组织最初与力行社干事会合并办公，人员多属兼任，仅对入会及由会员升任社员多负考核责任，事实上组织系统虽有二级三级，但工作实际业务则很少划分，力行社仅为领导中心干部组织，革命救国活动及行动业务，初期为两会，后来到第二年组织扩大时则全以中华复兴社及其周边组织负责对内对外工作，复兴社员都是组织群众干部，这是力行社秘密四级组织活动的实况与特色，不会因组织层级或名称，而发生分化割裂作用。公文来往及形式工作尽量减少或避免，既为增加工作效率，亦可利于保守秘密。

成立大会出席人员计有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滕杰、贺衷寒、潘佑强、康泽、萧赞育、邓文仪、桂永清、胡宗南、杜心如、葛武荣、周复、酆悌、李一民、邱开基、孙常钧、蔡劲军、黄仲翔、娄绍铠、易德明、戴笠、刘诚之、张本清、曾扩情、叶维、干国勋、戴颂仪、张镇、宣铁吾、严泽元、张桓、任国光、张宰臣、陈荣明、陈烈辅、程沸浪、贾毅、秦启荣、周煦龙、朱玫莹、何德用、贺明宣、向理润、谢永平、柯建安、甘丽初、李湘如、李守维、李维果、廖士翘、林桂

圃、张良莘、张辅邦、赵定昌、陈德法、蒋坚忍、邱清泉、仇硕天、诸树德、范正桐、韩文焕、贺伯犹、萧作霖、熊梦飞、徐培根、胡靖安、黄炳阳、黄铁民、任觉五、高传珠、官全斌、龚舜衡、冷欣、李士珍、梁其林、林爱民、张元良、张人玉、陈介生、陈苍正、陈德林、郑炳赓、周秉瑾、笠鸣涛、斐存藩、何志浩、贺喜业勒图里耳根、萧彝、萧文哲、徐庆誉、胡轨、胡维藩、黄珍吾、黄梅兴、何衡、顾希平、关麟徵、郭一予、谢瀛洲、李忍涛、韩涵、滕倬、臧元俊、曹敏、李安定、李厚徵、李国俊、李天民、李树森、梁干乔、林桓、凌光亚、林作民、李绳武、李立侠、李国幹、李晖、李新俊、郭寿华、匡正宇、顾谷宜、任文海、洪传经、胡国振、徐为彬、徐君佩、侯志明、何汉文、何浩若、冯剑飞、周斌、蒋鹏翥、郑作民、陈烈贻、陈启坤、赵范生、张彝鼎、张坤生、张一清、张毅夫、张廷镛、赵龙文、陈景贤、郑介民、郑道儒、蒋肇周、靳汝民、周竞人、朱文中、酆裕坤、侯标庆、萧洒、徐中岳、胡淳、宣介溪、黄两、黄默忱、洪士奇、况汝霖、李骧骐、李义、李铁铮、李毓九、梁步云、林英、刘慎补、刘健群、刘公武、刘雨卿、罗敦伟、鲁学瀛、毛嘉谋、石祖德、孙秉乾、戴仲玉、唐国桢、丁昌、曾广武、崔新之、王振敦、王公亮、王汝举、王认曲、文重孚、吴淡人、仇硕夫、杨政和、胡维藩、杨绍西、禹治、刘观龙、刘咏尧、刘千俊、陆梦衣、潘其武、上官业佑、孙文明、汤武、丁炳权、

曹凯之、王志文、王慕尊、王家鸿、王叔铭、汪秀瑞、伍觐璋、杨周熙、杨文连、燕永治、余洒度、袁渔溪、刘广瑛、刘哲明、刘任坚、柳元麟、毛邦初、邵令江、戴文、陶熔、田亚丹、左权平、宋长福、王锡钧、王受泰、翁坚、韦碧辉、邬绳武、杨啸伊、杨亚仙、杨震亚、叶成、俞济时、袁覲贤、阮齐、袁守谦、刘观时、刘倚屏、刘炳藜、孟昭钻、包烈、柏梁、宋思一、孙慕迦、唐纵、邓季两、田湘藩、左铎、王梦、王新衡、王泰兴、汪伏生、吴兆棠、邬竟成、杨立、杨荫渭、杨廉、俞季虞、袁其凝、岳岑、刘伯龙、刘少铠、刘伟、白瑜、孙伯睿、丁文安、左漱心、王超凡、王大中、汪洪业、吴寿彭、伍诚仁、傅云、贾伯涛、杨学海、叶简修、严登汉、俞墉。

革命青年同志会及革命军人同志会当时已入会会员，后来曾升力行社社员，也有部分参加成立会的如王任远、王公遐、唐钧、彭文凯、买国民、卢冠军、罗治忠、乐幹、吕岳、马培基、沈伯超、魏象明、汪子奎、王介庵、宋新民、彭凤昭、庞宗仪、吴迺宪、文明昌、曹凯之、石钟麟、彭克定、毛光远、刘毅、白世维、王公亮、杨政和、叶德炎、颜德贵、袁国幹、陈逸云、陈友生、周振强、傅忠良、向衡、谢静生、胡竞先、顾一和、郭礼伯、李立人、陈春霖、陈敦正、简立、周安国、朱光澄、萧勃、谢青茂、胡秉章、黄镇忠、黄雍、梁华、林培琛、高然圭、黄远晟、徐亮、朱国洸、蒋

伏生、吉章简、陈又新、张諲、张袞甫、张客公、张宗良、陈光国、陈绍平、郑汉生、程登科、郑鸿经、何清铭、胡伟克、华学端、柯寿耘、李士奇、廖树东、詹学海、张世希、赵海屏、陈如元、郑吉康、方超、傅胜蓝、胡启儒、黄正山、管公度、郎维汉等，以上合计力行社员两百八十多人，青会、军会会员八十多人，乃就记忆所及者写出，容有遗漏或错误者，因作者对上述各社员会员，都曾认识，并与各同志多有接触，时间或有先后，当年在南京参加成立会者不到半数，约百五十人，就当时三百六十余人中分析，黄埔学生超过百分之七十，其他如党校政校毕业生约占百分之十，其他各大学教授学生约六十人，女同志不过十余人，都堪称青年才俊，革命干部的干部，以后曾在党政军民各界任中上级领导干部者居十之七，在大陆为抗日反共革命救国牺牲者，早已过半数，来台湾者约百五十余人，二十五年来已因公务病逝者将近三分之一，今日尚有百余人健在，仍有不少尚未退休或在立监两院与国民大会继续为反共复国力行三民主义努力奋斗。吾人追述四十五年前力行社成立的往事，革命领袖蒋公，伟大仁慈，领导力行社数百高级干部五年之间，对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作了空前的刻苦奋斗，壮烈牺牲，三百力行社社员的丰功伟绩，与黄埔军校五百革命青年军人干部，五年东征北伐统一中国之贡献，有同等之价值，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曾缔造现

代中国历史光辉之记录，值得全国青少年及中国国民党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军人研究参考及效法。

以上为当事人邓文仪先生亲自述作，自为第一手资料，全文所叙，与笔者所记，仍脉络一致，并无抵触之处（仅成立日期及与会人数，略有出入，请参阅下文，邓先生所记，恐误）。特为节叙，以供参考研究。

时代背景与活动剪影

要知道“复兴社”成立的缘起，必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是很必要的。远的不说，单就“复兴社”成立之前一两年而言：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赤祸”猖獗，西北军阀抗命，阎锡山（伯川）、冯玉祥（焕章）联合称兵，而有陇海路之战役（亦称中原之战），蒋公誓师柳河，辛苦备至。教育方面，亦有李煜瀛（石曾）、蔡元培（子民）两系之龃龉，而有蒋公自兼教育部长之事。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廿八日，胡汉民（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时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去立法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城内黄龙巷暂住，几乎引起了极大的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讽刺的口实。九月十八日，日军突袭北大营，沈阳沦陷，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

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者的气焰，时刘芦隐为中宣部长，亦久不来京，蒋公忍辱负重，一面令守军节节抵抗，一面诉之国际联盟，然失地日广，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学生团体来京请愿者不绝，群集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更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予政府以难堪，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及教授等情事发生。而反政府分子之结合与破坏，亦愈趋激烈。中央蔡（子民）、张（溥泉）、陈（真如）等，力主斡旋宁粤，共谋团结，蒋公以内部不臻统一，无以对外，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决定委曲容忍，请胡（展堂）、汪（兆铭）、孙（哲生）以及粤系委员，一同来京开会，然后辞职。嗣接胡电，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能来京，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三军统帅，本兼各职，一律辞去，由中央会选举林子超先生代理主席，陈真如代理行政院长（孙科为院长），宁粤乃趋团结。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上旬，蒋公于杭州与汪会晤，一月中旬，南京中枢动摇，行政院长孙科，离京赴沪，外长陈友仁，高唱宣战，蒋公既发表《独立外交》论文，复不忍中枢扰攘无主，乃与汪相约入京，共同负责。既抵京，而“一二八”沪战即起，而有政府迁移洛阳之决定。

以上乃当时的实际情形，显示党内外不能团结，全国

人心，彷徨无主。其时，军校留日学生，先后回国者，有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陈启宇、杜心如、叶维、李秉中等多人，鉴于日本军阀，公然叫嚣，向我国进兵，而国内人心士气不振，毫无作战准备，青年颓丧，举国惶然。认为党的组织脆弱，已无力应付当前情势。乃纠结军校同学，及有识之士，思有以复兴中国革命，组织人力，发挥黄埔精神，以投向时代的洪炉。他们最先的动机和计划，是想坚强党的组织力量，团结全国青年俊彦及忠勇爱国军人，形成党的核心领导，进而运用党的领导，强化党的动力，由党做起，然后扩及全民，俾达成一切人力物力的动员，以应当前紧急需要。

这个呼吁，首先赢得了军校同学曾扩情等的共鸣，先后参加者凡八十余人，即以此为基础与骨干，进行各项工作与计划。

“复兴社”的进行，酝酿于九一八事变前后，于廿年（一九三一）初冬，开始积极筹备，首先研究进行程式，组织章程，及工作主张等。筹备期间，假南京二郎庙康济医院楼上办公，康济医院，即康兆民先生之住宅，康住楼下，以资掩护。此一期间，书记与助书工作，由滕杰夫妇任之。其时，蒋公适下野，居奉化溪口，邓雪冰先生侍其左右，乃透过邓之关系，将各项筹议，禀明蒋公，时在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中旬。旋蒋公回京，首先召见筹备人贺（君山）、滕（俊夫）、康（兆民）、曾（扩情）等多人，面询

一切，欣然承诺，出而领导。蒋公谓：“你们很懂得时代的需要，不过，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恐做不好，我拟在京住一个时候，你们可以天天来见。”时蒋公住陵园官邸，如此天天去见者，约三星期，每谈必三数小时。以后，到三月一日下午，认为筹备工作，已告就绪，乃假南京励志社，正式成立，由蒋公亲自主持，原有发起人八十余人，是日到会者五十余人，其余因公职在身，不克到京参加。（按成立日期，邓雪冰先生谓为三月八日，恐误。三月一日乃根据冷欣先生所提供之资料，谓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不致有误云云。——作者附记）

首先成立的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其后“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及“中华复兴社”，在很短的时间内，均相继成立，以“力行社”为领导中心，而以“复兴社”为实际推动工作执行任务之机构。其所标榜的主张，最坚决而明显者：（一）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理想的三民主义国家。（二）坚决拥护蒋公为国家领袖。（三）以中国革命复兴运动为言论准则，并酌采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精神。

以上乃“复兴社”组织之缘起。自是，社务日趋发展，不到一两年，其分支机构，便已遍布全国各地及华侨社会之中。各项措施，在“复兴社”策划与领导之下，全国青年，无不同声回应，国家民族复兴气象，几已弥漫全国，人心振奋，蔚为高潮。

“复兴社”成立以后，总社的办公地址，最先是在南京朝天宫，后来搬到明瓦廊。这个地址，前门挂着“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的招牌。政训处在外，“复兴社”在里。当时，政训处长是贺衷寒先生，副处长是袁守谦先生。后门是三道高井，门口排着“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后来改为处）的招牌，当时调查处长是刘咏尧先生，副处长则是后来投共的黄雍（号剑秋，湖南长沙人）。在总社服务的人，均有以上两个单位服务的识别证明，由明瓦廊或三道高井，均可出入，但极严格。我们如乘用交通工具，规定须在其附近二百公尺以外下车，不能直达门口。

“复兴社”对当时的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精神，颇为重视。曾数度派员前往考察，据我的记忆所及，第一次曾派滕杰、杜心如、李国俊、郑介民、陈荣明等五人，由汤武任秘书，于廿三年（一九三四），前往德国与意大利，考察青年组训情形，并特别注意德国国社党，及意大利法西斯党组织与活动情形。第二次曾派贺衷寒等，于廿六年（一九三七）六月下旬，前往德国考察，贺等行至可伦坡，而七七事变与“八一三”沪战，相继发生，乃电召回国。

“复兴社”对训练工作，非常认真，当时编有《我们的训练》一书，为训练工作的指标。其中有好几章，由我执笔，或参加意见。训练工作的参考书，我记得有由俄国译过来的《格柏乌》，是描写俄国特务工作的书，其中有不少原

则性、技术性一类工作方法的提示，似乎是由留俄学生邓季雨先生翻译，因为手边没有参考资料，已记不清楚。

我们的小组会议，非常机动活泼，在室内，在野外，在餐馆，在茶馆，在浴室，在马路上……均可以开成很好的小组会，达成“交付任务”“分配工作”，以及“交通”与“联系”等种种任务。我们曾有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会，听取蒋公训示，参加的人，没有涉及任何有时间、地址及听训的书面通知，身上只带着一张的普通的名片，三个字的或二个字的，没有编号，也没有任何暗记，便代替了通行证。至于时间地点等等，则完全以口头传达，天衣无缝，万无一失。我记得有一次到南京中山路励志社，听蒋公训话，是阳历过年的一个下午，我们所持的，便是一张普通的拜年卡，代替通行证。上面印着“恭贺新禧，某某鞠躬”字样。

“复兴社”成立后，对全国青年组训，特别重视，其训练要旨，着重对全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与爱国精神和爱国情绪的激发。曾在全国各省市，举办暑期青年军事集训，造成了全国青年空前的蓬勃朝气，精诚团结，拥护领袖，整个国家，欣欣向荣，令人兴奋！这件事，对于后来“剿匪”、抗战、稳定工潮、学潮，与团结民心士气，是有莫大影响与贡献的。这个军训计划，完全是由“复兴社”拟定，透过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严格执行。各省军事集训的总教官和训育组长等主要干部，亦都是由“复兴社”

精选派出，我亦参与其事。其时，国民军事教育处的主管，由贺衷寒、余井塘、酆悌、潘佑强至杜心如，都是“复兴社”的同志，故能运用自如，收效极大，这个处，后来并入军委会政治部了。

“复兴社”特别注重各种党团活动。我记得我在总社工作，虽然以《中国日（晚）报》记者，及《湖南前锋报》驻京记者的身份掩护（有时候亦以军委会别动总队指导员名义来掩护），但实际上内部工作繁忙，对外已少活动。然而，南京体育界，却成立了一个体育小组，由于我做过教育记者，为上海《申报》等，采访过体育新闻，便派我做小组长，直隶总社指挥，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程登科先生（四川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教务长萧忠国先生（号伯平，湖南浏阳人，留德习体育）等，都编在我这一组，由我领导。外表上却由程登科先生主持。后来，首都记者体育会成立，我亦爆出冷门，高票当选为监事，其时，我不过廿多岁，现在想起来，未免有些惭愧！我妻德瑜，于芦沟桥七七事变后，由南京回到长沙，亦加入“复兴社”，在私立蔚南女子中学执教，是年秋，亦由于“复兴社”党团活动，发生作用，高票当选为湖南省妇女会理事兼救济组主任。以此事例，可概其他。“复兴社”工作，做得如此有声有色，而不为外界察觉，皆由于它的党团活动成功。因此，对社会的影响，对各项社团的掌握，充分表现

了它的力量。

我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是在台北，担任中央党部的总值日，因而想起了当时“复兴社”的值日，有两个故事。其一：是有一位张益勤先生（名字可能有错，已记不太清楚），在军事处服务，为人忠厚，克勤克俭，名实相符，其时，各单位值日，晚上必须睡在办公室，一日三餐，完全由公家供给伙食，他老实不客气，长期为别人代理值日，有吃有住，不花一文，真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也算得上是一个值日专家。其二：是有一位名叫郑吉康的，才不过廿多岁，年轻活泼，喜欢跳舞，他却利用值日的机会，将“复兴社”的机密，偷出去卖，为宪兵队捕获，立即枪决，而送了一条命。郑吉康有一个叔叔，名叫郑全山，军校毕业，当时也在“复兴社”组织处服务，干练有为，为朋辈所称道，抗战时期，做了和尚，在重庆南岸一个寺庙当“知客”，抗战胜利以后，有人在上海遇见过他，以后便不知下落了。郑全山去做和尚，也许与郑吉康的被枪决，有些影响。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西安事变，蒋公为张学良、杨虎城等所劫持，我因母亲病逝，请假回湘奔丧，刚到长沙不到三天，正在一家印刷厂的排字房，亲校讎文，忽然由“湖南分社”，转到总社的电报，说蒋公在西安蒙难，嘱即返京，我因经办一些机要工作，乃星夜驰归乡下，禀告父亲，并向母亲灵前祭告，次晨即转道汉口赴京，当时，

尚无飞机直达南京，但因沿途有组织照顾，购票容易，两天多即赶到了南京，而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是我终身抱憾的事，但也反映组织命令的严肃和彻底。由蒋公“西安事变”一事，看全国的民心士气，亦反映了“复兴社”组织的精神和力量，更证明蒋公的伟大！

结束与贡献

关于中国的革命复兴运动，我原来打算，只写我参加的经过，但越写越觉得思潮起伏，无法抑止。同时，感觉得这一段幕后工作，实在对当时政治，有莫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国民党和国家民族，亦有强烈的振奋与刺激的作用，这种史实，将来未必见之于正史，我因参加实际工作多年，所以我有详加记述的必要，至于其他工作，则有公开的记录与史实，可以查证，倒可以从简，这是我写这一段幕后工作回忆的一个态度。我的笔触，自信非常客观，也很忠实。

前面我已将参加“复兴社”工作的经过，及其组织与干部，缘起与活动，作了一些扼要的记述。现在，我想再就“复兴社”的结束经过，与它对国家的成就，加以说明，算是告一段落。

“复兴社”的工作与活动，多采多姿，已如前述，为什

么要将它结束呢？这里我想先引用一段陈布雷先生的回忆录（见《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五五页），以见当时国家环境的大前题：

临时代表大会之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蒋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戮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犹顾虑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混吞并或降服之嫌疑，此种意见，于会前向各党派负责人坦白说明之。中国青年党表示可接受，国家社会党允可考虑，独中共负责人秦邦宪、王明等，坚决拒绝，谓合作可，合并则不可，此议遂寝。然临时代表宣言，仍一再申明，勤求全国有志之士，共

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并引总理由兴中、同盟会以来，每改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爱国革命分子以为例，盖即此种意志之吐露也。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为汪（精卫）之手笔，余等均参加讨论，仅修改字句，未更动其内容，蒋公谓此文语意轻重未尽当，而主旨大体不谬，独戴君季陶颇加訾词，谓此文实毫不足取，与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同其芜杂而散漫，此实亦有所偏蔽也。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为集中意志力量，决定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以为抗战期中集合民意之机关。

陈布雷先生这一段回忆录，是记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三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的事。但实际上，蒋公对党派问题的考虑，可能更早一些。在前一年（即廿六年——一九三七）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后，越三日，蒋公即发表谈话，望中共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十月廿日，并决定国府迁重庆办公，重申长期抗战决心。盖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国家情势改观，军政业已统一，独有党的内部，未臻一致。蒋公认为党派之团结，尤须从吾党本身做起，使“党方”与“社方”公开，方能统一，尤期此一改变，一方面能团结党内一切派系与力量，一方面更能号召全国青年大

结合，使之行动一致，力量集中。

这一具体意图，蒋公曾授意“复兴社”负责人康兆民（泽）先生，研拟具体方案，康又授意由我草拟一个“中国青年挺进队”的计划，作为腹案。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大体上是采取“中国青年挺进队”的精神与作法，可以证明。青年团的筹划，蒋公曾指定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贺衷寒、康泽、酆悌、周佛海等七人，进行专案研究。

“三民主义青年团”名称，闻系由贺先生提出，于廿七年（一九三八）三月，复经五届四中全会，决议设置。

“复兴社”秉承前项决定，乃于是年六月，在武昌大江中学，召开“武昌会议”，结束了这个对中国政治深具影响力的组织。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昌湖北省党部原址，正式宣告成立，由蒋公任团长，设临时干事会与监察会，朱家骅（骝先）代陈辞修先生为书记长。至是，“党方”与“社方”，乃公开合作，团结一致，终止双方的秘密活动。

“复兴社”于廿一年（一九三二）三月成立，至廿七年（一九三八）六月结束，为时共计六年三个月，其影响与成就，自然非一句话，可以说完，但大体而言之，我觉得有下列数点：

一、在民国廿年左右，党的组织松懈，革命精神解体，因“复兴社”的成立，而受相当影响，使原有组织，能积极

整顿，相互竞争。

二、在当时，政治腐败，民心士气不振，经“复兴社”强化军中政治教育，鼓舞革命士气，推行新生活运动，及劳动服务，对国军战力及国民心理，有莫大的振兴作用。

三、倡导中国革命复兴运动，建立领袖威望，使蒋公成为国家领袖，得以强化领导中心，巩固中央政权，促成国家统一，于西安事变后，见其巅峰。

四、举办全国青年暑期集训，培养国家民族观念，激发爱国情操，使全国青年，精神意志集中，对安定工潮学潮，有极大的作用。

五、推行经济建设，维护交通安全，强化调查与别动队工作，整肃贪污不法之徒，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凡此种种，仅举其荦荦大端，莫不对抗战、建国、“剿匪”，有直接间接的贡献。

（原载一九七九年六、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六期及

第三十五卷一期）

我所知道的复兴社

——即非蓝衣社更非特务组织

白瑜

首先声明者，复兴社在上海开始组织，尚未闻蓝衣社之说，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俗称特务）亦未成立。一九七〇年我往美国一行，抵三藩市，住柏克莱，即有就读加州大学校本部的世兄辈相告，中共在香港出版的中文书刊，大骂复兴社，提到有孙伯謩与我在内。且说：“遭共党骂的人或事，一定很棒，很有道理。”我真啼笑皆非，反问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大发议论，倒是很有见解，可惜无法详述。抵纽约，先觅一本香港出版的什么录看看，不禁骇然。这样歪曲、虚构、诬辱蒋公的书刊，国内无人知道，海外无人辩正，而使洋人误解。我何人斯！只好生闷气而已，落得此行开始即感不安，小住而返。

翌年，邓文仪兄的长公子元忠世兄（华盛顿乔治大学博士留美任教），返国收集资料，拟写中国复兴社一书，以正视听。彼示我以日本人与美国人的论文，内中并提到孙伯

睿兄与我在大陆的文稿。他们总是误将复兴社、蓝衣社与戴雨农的工作须发不分。多年来外国人亦有信给我，恕均未复。洋人既已开始研究复兴社，我们不能任其以讹传讹，邓元忠君之作（原稿英文），当然有其必要，但因故搁笔。最近邓文仪、干国勋两兄继续有文发表，也提到孙兄与我，同时我那年在美有些复兴社旧雨学人，向我细诉，他们谁都不认识刘健群、戴雨农两人，绝对没有与彼等发生任何关系，扯在一起，太欠正确。且嘱我有所说明。戴雨农将军功在国家安全，其人其事，论者已多，刘健群亦有其作为。今孙伯睿兄逝矣，我年已老，勉将我之所知，对复兴社作此交代，并答邓、干诸兄的催促与外国人的来信。

一、复兴社之称始于上海

北伐后若干党政官僚开始腐化。我在南京中央军校教书两年，与张治中不睦，与现任“立委”张九如兄（还有徐兄）一同离校，先是教育长张治中，在军校工字餐厅落成典礼餐上，高呼蒋夫人万岁，蒋公及夫人均现厌恶之色，确系事实，在台知者甚多。十九年秋我转到上海去教书。不料故乡陷敌，家破父亡，思亲守制，哀伤经年。接着“九一八”国难又起，家仇国恨，更感苦痛，但已与实际政治脱节，又有无可奈何之感。记得某日同倪文亚兄散步胶州路上，谈

到我们该行动了。当时上海党派活动甚热闹，朋友们皆兴起，我忽然猛有所感，冲口而出“你我皆自中央军校退到上海，而今校长蒋先生肩负救亡重任，其直接领导的黄埔同学，必定有所作为，我们稍待为宜”，文亚兄同意管见。

“一二八”后学校复课，同在某校教书的孙伯謩兄邀我到静安寺乔治咖啡厅谈天。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精力充沛，在上海党派活动，阅历已深，而反共奋斗不停的政治系教授。他问我：“听说黄埔毕业学生已到上海接触教书人士，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他且不信。不久果有黄埔毕业生叶维（价人）来访，他与我南京东南大学同学，同闹风潮，站不住了，先后南走广东，他竟然入伍。此时叶从日本归来，老友重逢，恳谈之下，国难当前，一拍即合。我问他认识孙伯謩其人否，他全然不知，要我介绍。我将孙兄种种说明，并担保他的忠诚，叶说不怕，正要找些英雄好汉，从此我们三人结盟在上海，组织起来。原来我还提出几位好友，南京只核准我们三人尽先开始工作，其余从缓。

这一救国组织，原始名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系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亲予核定。筹备期间，极为谨慎，目的在抗日、“剿共”、建国，故暂采用不公开方式，简称力行社，或力社，下属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是平行的组织（以后合而为一）。在上海以青年为对象，机构仅用前者，简称青会，起初只有叶维兄找到两个在校大学

生，男女各一，分向各大学发展，中学、小学，以教员为限，不收学生。当年上海处于次殖民地地位，买办世家、流氓帮会，挟新官僚以自重而自娱，还有日、俄汉奸，有时且合流，天下殆哉，岌岌可危。倭寇炮声，惊醒了洋场大梦，尤其是爱国青年，热血沸腾，有人一呼，四方响应，发起爱国组织，自非难事。惟有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率领的共党，混迹其间，假抗日之名，遂行其倾覆阴谋，是一大困扰，而仅由两位大学生四出奔走，不出一月，会员人数已达四十余人，分成三个小组，乃扩至大学以外向交通、金融、生产各行业发展。选择分子，极为严格，首重领导才能、生活勤奋、有大志向者，人数仍然激增，左倾分子亦归服不少，非党员更多。孙伯謩兄尚不知有力行社，提议组织外围，以资应付。命名原有多种，最后选择了我提出的“复兴社”，简称复社。假借明末复社名义，以示不惜牺牲、激励青年意志，虽未能兴复绝学，而声势仍壮。南京接受此项建议，渐渐推行全国，形式上又添一层组织，实际上代替了青会的运行。能证明此一措施者恐已不多，但至少尚有加派到上海的娄绍铠兄（广州中大转入军校毕业，留学日本，“八一三”淞沪之役，曾与彭孟缉兄分任两个炮兵团长），尚健在台湾，而且应有案可查。

至于蓝衣社之称，为刘健群兄的佳作，未经采用者（详见邓、干两文）。由我们从未着蓝布衬衫，更谈不上列队游

行，招摇过市，即可证明。据我所知的复兴社文人社友，不仅不认识戴雨农其人，对刘健群老兄亦绝少相识，每一提到特务或蓝衣社，皆叫冤枉。有人说我们哪有干特务的能力，有人说要我们身着蓝衬衫制服去见蒋先生，他老人家亦必大发脾气。而不幸在台的作家，亦有将戴雨农与蓝衣社混为一谈者，想系有欠考虑或不明真相。应知所谓“蓝衣社”，全为子虚，是敌人诟骂我们的。

二、严正风气激励人心

上海复兴社组织开始，不公开的办公地点，觅在环龙路附近四十四号，取怀念老国民党之艰辛。学生同志，秘密出版《民众喉舌》，揭发官僚黑幕，只在激励人心，惟立论有欠正规，旋即停刊。乃分向蒋坚忍将军的义勇军《人民周刊》以及《社会新闻》、《民众呼声》同情刊物投稿，颇具声势，以资策应。接着我们教书朋友正式出版《前途月刊》，由刘炳藜（一青）兄经理编辑发行，第一期创刊号以“前途”为主题，孙伯睿兄写《中国政治的前途》，我写《中国经济的前途》，倪文亚兄写《中国教育的前途》为骨干，还配有李石岑写的《中国哲学的前途》，周谷城写的《中国社会的前途》等文，可以说是复兴社代表性的刊物。日本人、美国人收集资料以此为依据。本稿行文之前，干两阶

(国勋)兄病后来长信,邓雪冰(文仪)兄亦屡催,要我写出当时上海工作及海外情形,并问到“九一八”时上海国民党员号称卅万,何以由周恩来、张闻天指挥的共产党仅潜伏约三百人,能发动上万沪宁一带的大专学生到南京请愿,捣毁中央党部,逼得蒋公下野,暂返奉化休息。干兄又说:廿一年春蒋公返回南京,筹组力行社,上海开始组织后,《淞沪停战协定》,以至廿二年长城之战与《塘沽协定》,共产党再不能煽动大风潮。来信中有恭维我们之句。天呀!“一二八”后国内一时的安定,完全是蒋公的德望所归,人心痛定思痛所致。至于对上海青年的接触,我们在技术上确有所用心,无法胪列,除复兴社的定名有利号召外,另述两点小事,聊可解嘲。

(1)“一二八”以后的江南一带,复兴社消息,无法完全封锁,难免不胫而走,大学里风气为之一变。共党搞的“反帝大同盟”也烟消云散。即曾在南京率领大学生请愿,自称身先士卒,冲入外交部,要打外长王正廷,比美五四运动打倒陆、章的两位名教授,其一不久即加入复兴社了。另一后为青年团巨擘。上海大学教授多向往者,我主张尽量吸收,孙伯睿兄则以过去失败经验很多,加以反对,叶维左右为难,结果从严选择。我们重视的是大学生与中小学教职员,故先吸收的中小学校长,即多过大学教授,中小学教职员更多。有效法往昔日之胜俄,普之胜法,皆归功于小

学教育之意。对于大学校长，仅接受一二人，余则暂列官僚之类。此一决策，社友普遍赞成。《淞沪停战协定》后，斗争对象，偏向共党，这样一来，工作艰难多了。共党无孔不入，无技不施，非我们所能。我们只好在工厂里加紧职工青年的宣传与吸收，并在大学里和由红色教授一变而为红教授的朋友们在课室纸上论兵起来。例如我在暨南大学教“经济地理”与“俄国近代经济史”，后者讲到苏俄政府成立即止。教育系左倾名教授张栗原，在其教育课程中，则讲苏俄五年计划，尤着重经济部分，大肆鼓吹。“九一八”前我在吴淞中国公学讲李嘉图的租税论，一同回国的留俄同学邓汉钟兄，讲原富与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都不讲苏俄的东西（我译的《俄国通史》亦不包括苏俄），学生们都很表失望。以后回国的沈志远同学（共产党），则大讲马克思派的政治经济学。其他课程，左倾教授亦大为发迹。终于我们找到一个秘密，左倾教授的教材，以采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为多。该社翻译日本左倾书籍外，并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文讲义改编发行（后来在伦敦与王礼锡兄谈熟了他也惊奇）。慢慢自俄返国的同学在上海教书者不少，绝大多数自首，左倾教授也走下坡，一般的教授，大都同情我们，不像北方的教授，有些甘作人民阵线的木偶。至于孙伯璠及其同行教政治学门课程者，也有一番苦经。

（2）“九一八”以前的上海，共产党利用左翼文人，诱

惑了不少有为的青年，流为颓废。同时新月派的文人，也毁丧了不少青年的意志。我们要作挽救，颇不容易，对左倾青年，拯救其思想，即得之矣。而对浪漫颓废的青年，欲端正其观念与生活，则更为困难。我们乃拟定“贤者浪漫，必损其志；愚者浪漫，必益其祸”，互相勉励。适逢“一二八”抗日圣战中，有“王赓献地图”之说，由陆小曼扯到徐志摩身上，不无牵强。但爱国青年对浪漫诗人兴起了贬斥之风，爱国诗人自然还是受人尊重。李后主的词，当不亚于屈灵均之诗，但复兴社青年唾弃于李，尊敬于屈。倒霉的徐志摩，做了当时的牺牲者，爱国青年斥之为无病呻吟，享受爱浪漫的逸乐，既无苏曼殊家庭背景，更不能比有南社的组织，人工的潦倒颓丧，确实无聊。有对其漫骂者，我乃以“不祥少”名之，以示冲淡。又揭穿了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为俄国柯罗连哥《马加尔的梦》日文译本的改编。总之我们不惜各种积极方法，以求拯救人心。可巧者，当时有为的青年，对周恩来、毛泽东，仍不无幻想，很想知道他们的其人其事。恰恰周是孙伯睿天津南开同学，毛是我湖南一师同学，而且彼此都是五四运动时期打过对台的，说来故事很多，听者极饶兴趣，闲来常有谈论。例如我们指出苏俄比日本更可怕，说明共党袭列宁故技，利用国难，发动对外战争，转为对内战争，夺取政权，那一套阴谋，对有志气、爱国、向上的大学生们，不无启示和警惕。所以我们在上海共同奋

斗，干得起劲，以及扩充到社会各部门在职的青年，皆兴致勃勃，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升官发财。好在那时大学文理并重，习商者极少，何况常被同学以“商人无祖国”加以讥讽，引导青年向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还有可资纪念者，叶维开始找的两个学生，是吴淞中国公学有领导能力的学生。

“九一八”前，我和孙伯謩都在中公教书，中公又是有开国功勋的学校，也可说上海复兴社运动，是从吴淞出发，有先烈英灵的感召。

三、南京、汉口、南昌

廿二年春，力行社在南京开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合并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海的复兴社，一年之内已奠定基础，众推叶维、孙伯謩与我为代表，会场在励志社大礼堂，与会的全国代表二百余人，气氛肃穆壮烈，人心激励而沉重。主席团，上海我与叶推伯謩。起初只见我与孙兄两人着长袍，没想到刘健群兄亦着长袍，我与孙着长袍，有意抗议“蓝衣社”，而刘兄着长袍坐在主席团台上（至少应着短服），主席是贺衷寒，台下虽无人言语，但多左顾右盼。散会即有人问我和孙：“你们与刘健群一定是好友，刘亦抗议‘蓝衣社’乎？”我与孙同声相应：“我们与刘兄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尚未交言。”这次我和孙兄在南京盘

桓了几天，和力行社廿七位原始筹备人（外称廿八宿者），与十三位干事（外称十三太保者）自然的都是黄埔毕业同学，几乎都见了面，他们多是国外留学归来。有一早晨，贺君山（衷寒）、滕俊夫（杰）两兄邀我和伯謩兄上中山陵园早餐，谈得很多，滕兄富有思想，条理精细。有一晚在康兆民（泽）兄的新婚之家闹新房，贺、康、孙、叶四兄斗酒，好不热闹。静下来时，并和在座其他诸兄一起交换了不少意见。又有一天，叶维领我与伯謩到郊外某监狱，探问曾驻兵苏州，“一二八”前杀了英国侦探大鹏，由戴季陶先生坚持下狱的黄珍吾兄，彼出狱后改名黄正山，是我在星加坡的老友，话题太多，谈了一整天。其他接触较多者，是周旭人（复）、桂率真（永清）、萧化之（赞育）、胡步日（轨）诸兄，大家有谈不完的话，绝对未提及限制收入，各种纪律的不自由，与夫生活的劳苦和紧张，反以为乐。回到上海，也对青年社友添了不少鼓励。

廿二年暑假，蒋公在汉口怡和村官邸，召见孙伯謩与我，由邓文仪引见（其时邓任侍从秘书，责任重大），我和孙仍着长衫，蒋公亦着长衫。第一次已谈不少，约第二次再谈，内容以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为主，那时蒋公每周一次或两次邀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与周鲠生教授等先生谈比较宪法，陈辞修先生与邓文仪兄也常在坐。蒋公对我和孙谈民主政治时，强调复兴社须实践由训政到宪政的快速之

路，已露两党政治的倾向，谈经济则提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要旨。并对孙与我在南京总会的讲演（孙的讲题是《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讲题是《我们的经济政策》），以及上海复兴社的工作，均有所指示。最后我们辞出时，蒋公还用力的说：“转告同志们，不要疑虑什么，反对我的固多，国家政权我还掌握得住。”从汉口回上海，对同志更激励不少。记得当初我们在上海《淞沪停战协定》前后，已将蒋公成立力行社的致词（内容见邓文仪、干国勋两文），向同志们转述，时有许多同志泪雨潸潸。我们又将李鸿章《马关条约》的利害得失，详加说明，同志们心气稳定多了。这次从汉口回来，将蒋公谈话的大意对同志阐明，并转告领袖（此时我们已改称领袖）对同志的关怀，则无不气志昂然了。

不久南京调我接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第二期教育组长，因为第一期由刘健群兼班主任，何浩若任教务组长，梁干乔任训育组长，三人意见各异，梁、刘竟起冲突。第二期乃改由贺衷寒兼班主任，我去是作缓冲。我原不肯去，据说这是命令，已报蒋公核准，我只得前往。由则之（咏尧）兄介绍行布达式时，我还是着长衫，受训人员均系大专毕业，见怪不怪。二期毕业，又招考第三期，上海有些复社同志来考，我劝他们想升官发财的止步。记得中公领导人物仲起亚、东吴法学院×××来见我，且发誓过来，我们都笑了。以后仲起亚任成都军校政治军官，积劳病逝，×××于复兴社

结束，不再入青年团，胜利后回上海做律师，我来台前，洒泪而别。还有中公的一位同学是现在台北的“立法委员”封中平，与我常谈往事。另有某君，在南京入班前来看我，他说犯了一次浪漫的纪律，无人知道，自己罚自己，由下关步行到我家，我极感动。听说此君已来台湾，希望能见一面。廿二年冬，第三期入学后迁南昌，害得我请好兼课的顾谷宜（留俄同学）、李维果诸位中大教授，只好作罢。在南昌觅人不易，恰好前在中央军校政治部的同学张一清兄，自德国进修回来，家住南昌，人熟地熟，多叨他的解危。以后我离南昌，一切偏劳张兄了。此兄人品极高，生活自励甚严，曾任“立法委员”，来台后病逝，获得蒋公的褒扬。蒋公在南昌于军事委员会行营纪念周颁布新生活运动时，我去参加，仍着长衫。有几次在蒋公官邸开会，与刘健群兄混熟了，曾戏言，如果他登报取消“蓝衣社”之说，上海同志把复兴社的“版权”让给他，由贺君山兄作证人。他笑而答之：“狗皮膏药贴在背上，只好认了。”健群兄聪明过人，惜爱玩弄，有时却也天真可爱。

四、复兴社在欧美的情形

我从南昌回到南京，准备再出国进修，适逢孙伯睿兄因上海暨南大学风潮，遭到锢禁。我去看他，谈笑风生，同

他一处禁闭的，另有一位来自北方，也是犯了纪律的青年学生，而且为了恋爱问题，烦躁不宁，我们对他加以开导，于他不无安抚。暨大的风潮，因反对官僚校长而起，但行动过火。孙兄有一次前往指挥，身怀手枪，虽是为了准备与乘机而入的共党搏斗，总是与人口实，犯了纪律，甘心受罚。有一晚，他到我家闲谈，据云：某夜他同萧化之兄外出散步，偶过夫子庙，戏寻名卜占问吉凶，拈一“栅”字，卜者谓其身在线继，无凶有吉。固属江湖，但肯定开春一定喜获麟儿。果然，那麟儿在美国早获博士，其他子女均在美国很有成就。孙兄为安徽名宦孙家鼐先生的侄孙，由通儒孙养雍先生嗣养，躬自教育成人，与孙多慈女士如同胞兄妹。孙氏一门忠孝，伯睿兄得成大器，有叨先人余荫。我所知复兴社文人朋友，这一类型者多。孙兄与我在汉口见蒋公时，孙兄是第一次面谒蒋公，我尽量让时间孙多发表意见。桂率真知此，乃邀我与孙畅谈，以后对孙特别要好。抗战初期，武汉干训团，桂任总队长，邀孙任政治部主任，两人个性相似，打得火热。孙与袁企止、贺君山亦友善，来台后病逝世于桂任内的海军司令部。我赴英伦，过上海，得知倪文亚、张云伏两兄已成上海复兴社的中心人物，欣然再出国门进修。

廿三年七月，我抵达伦敦，原拟诸事不问，专心读书三年。詎料那时伦敦，乃中国留学生卧虎藏龙之地，自比民初马君武先生出国进修者不少，盛况空前。来到台湾者，有中

央遣派的李寿雍、李超英、吴铸人、陈岱楚、周德伟、黄少谷、杨锐灵、温广彝和学理、工、法律的胡光熹、唐君铂、俞伯泉的军官学生。还有崇敬胡展堂先生的蒋某、汪新民、胡钝俞，适成蒋、汪、胡三名家的中央大学同学（我亦崇敬胡先生），与夫各省遣派的韦从序、孟昭瓚、陈玉科、胡秉正、张宗良、刘文腾、黄正铭、孙亢曾、李鸿音、李崇年、叶守乾、缪培基，乃至中英庚款遣派的周鸿经、林致平、李国鼎、孙景华，加上自费前往的于望德、王兆荃、胡秋原、余纪忠、谭季甫、陈勉修、吴世英，和工读互助团的使馆总领事谭葆慎、二等秘书赵惠谟、学习武官陶熔（一时记忆所及）诸兄。以及其他留在国外讲学或留在大陆的专家学者，如旅美之唐培经、伍盛元、周宗莲，旅英之熊式一、蒋彝，留大陆的吴定良、吴大任，皆国际知名之士。合计百人以上，均在国内外有成就，或闹了一番出来的，年龄平均近中年。伦敦气氛的阴沉，又值国内多事之秋，如果大家不谈谈政治作为课外活动，或是消遣，都会同俞平伯一样，更要哭哭啼啼的离开伦敦。有必须申明者，以上所举诸兄，现在台北，虽是五陵车马，冠盖满京华，但几乎全非复兴社社友。也不能否认者，后来在伦敦加入的复兴社人士，亦不在少数，又几乎全是纯为爱国的学者专家，理工人才诸多，且多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以后亦未转入青年团者。我也对他们说过回国只想教书。而且离英赴美时，在大西洋邮轮上，又

去信件作此保证。

我抵英之初，即接任觉五兄（也是在东南大学同闹风潮入军校留日返国者）来信，该信发自南京禁闭室里，并未言及被禁闭的原委（据说是领导某大学复兴社运动，被人暗算），只劝我乘机安心读书，最为得计。又有湘人王芃生老大哥，常相谈论国家大事，以及他读书苦经，且说吾人做事的时间长，读书的时间（指进学校）短，嘱我珍惜此行的三年计划，谊同手足，盛情可感。其实我在伦敦，没有负担复兴社责任，只是知道一般情形。复社工作，公使馆里有人兼负全责。廿四年六月，国内发生所谓“河北事件”，适值学校放假，有一天在中华协会（China House）闹了一次大表演。事缘有一部分同学，秘密开了一次会议，冒用学生会名义，去电中央政府，请惩办何应钦将军，并及早宣战抗日。接着真的同学会，乃召开全体大会，国民党员各派合作，形成多数（黄宇人兄标榜专心读书未到会），讨论热烈，有人提议另电政府否认前电。共产党首雷雨鸣（刘峙将军资助留英者），见势不佳，挟持主席某小姐（可巧是我的堂姨妹），抱头鼠窜欲抢走会议纪录未果，不料主席指定的纪录，适为复兴社员，早有准备。旋由某兄很技巧的建议，另推某兄为主席，继续开会，完成会议程序。少数人民阵线分子（内中国国民党员不少），终未离席。散会后，李鸿音兄说：“几个月来，竟把共产党打下去了，总算好事。”翌晨，我那

堂姨妹来访，又哭又闹之后，转学德国去了。听说次年西安事变中又有一场更大的风波，如以此两次故事，详细说明伦敦的复兴社，堪称一部非小说（Non-fiction）或传记文学。欧洲几个大都市也有中国复兴社，情形相仿，亦有相异之处。

我深感在伦敦住不下去了，我欢喜在伦敦读书，但奈静不下来何？羡慕黄宇人说到做到，由来是硬汉（此兄现在加拿大，一切还是硬撑），尤其是柏林的吴兆棠兄，百忙之中，竟能完成博士学位。我原可领三年的进修公费，迁徙自由。到美国后，决心不住纽约与华府，有意到波士顿，又想看看纯粹的美国教育，乃选择了密歇根的安雅堡，想讨密歇、安雅之兆，加之得悉该校经济系主任是曾在上海圣约翰教书有年，正在写他的《外人在华投资论》，而且他自己教国际贸易学，岂不更好。他的姓名是Carl Remer，早已退休，约在十年前，他还来过台北。安雅堡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已有三百余人，以交通大学毕业生为多。好在大家不谈政治，落得清静。我作此选择是亲内弟某博士的建议，他很爱国，但不谈政治。至于美国复兴社的情形，也很有几个博士参加。他们在华府、纽约，与共产党徒冀朝鼎（山西左倾学人冀贡泉之子，孔祥熙先生的世侄），及人民阵线领导人李俊龙、潘楚基（皆为驻纽约总领事馆馆员，李且系共党李维汉的堂弟）等搏斗。后来听说还有一位女同学，自动放弃

博士奖学金，到华府、纽约一起参加反共抗日运动。那时她连国民党员还不是，自告奋勇，费时半年，垫钱不少，走遍美国华侨众多的城市，向各派系领导人物，用广东话，广为说服。力求统一，集中力量，效果颇大。详细说来，也可写一部非小说或历史小说。我在美国一年，绝未过问复兴社社务，但也略知一般情形。日本、香港、东南亚的情形，我更不知。听说韩国革命人士加入复兴社者不少。

五、我入总会工作

复兴社运动（此系简称，据干国勋兄告我，华北廿三年始采用复兴社的名称），对于国内与海外的统一团结，不无影响，有利于抗战。日本军阀与苏俄共党最为清楚，可怜的是中国人民阵线之徒，所谓“反法西斯”“反蓝衣社”也作传声筒。我此次在海外两年，间或之中，既不费时，亦不费力的揭发列宁“利用国家多难，发动对外战争，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转对外战争为对内战争，夺取政权，向敌人媾和，稳定政权”的颠覆教条，以及阐明蒋公“和平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之志意，是我曾留学苏俄得来的方便。廿五年暑假，华北问题日趋严重，局面外弛内张，战争一触即发。邓雪冰兄任驻俄大使馆武官，返国述职之便，绕道美国，支加哥一晤，藉

知日、俄勾结，日趋紧密，险恶万分，目的不同，谋我则一。促我归来，共赴国难。由是我静了一年的心田，又被锄乱。犹疑匝月，停止往美西住一年后，可能重返伦敦再住两年的计划，毅然放弃第三年公费和回国路费，以及可能延长两年的待遇，竟于七月底回到南京。结果抗日圣战，又再推延了一年，使我到了牯岭，不敢面谒蒋公。此一关键，使我一生学书不成学剑亦不成了。路过日本，往驻东京大使馆访问严泽元（不严）兄，不料参事王芃生老大哥出迎，口称你们存心给我们捣麻烦吗？雪冰刚过，你又来了，日本很注意。我说：“区区如我，算个什么？”并介绍同行的北大教授孙铸（铁仙）兄。王兄带有难色的说：“我带你去见许大使。”我说：“不必了。”他摆出老大哥架子说：“不懂礼貌。”好在孙铸带两个同船的女学生找别人去了。许静老（世英）开口即说：“我知道你来，芃生兄说你学问见解都很好，一点儿也不浮夸，很想和你谈谈；不严兄返国述职，他为人通达，与我们很合作。”又承指教了一些日本政情，问到美国孤立主义，我也恭谨的据所知相告，静老像是考我似的。我在伦敦未与公使郭泰祺交谈，深觉老官僚比新官僚可爱。

我原拟重返伦敦，迁到外埠去读书。忽然蒋公命令邓文仪代刘健群为早将力行社与青会合并办公的书记，并令我接滕杰兄（曾为书记）为训练处干事，倪文亚兄接组

织处，由柏林赶回的吴兆棠兄接任助理书记。又允我延请英、德、法回国社友，分别屈就训练处各组组长，一时好不热闹。我生性爱热闹但怕麻烦，而邓兄则爱热闹，最不怕麻烦，有欠警惕，有时竟将事态闹得不可开交，成就不少，吃亏亦多。例如在汉口、南昌被蒋公器重，责任重大，全无“高处不胜寒”之感（他同我十四年在广州考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又同是该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赤都反共，闹事惯了的）。好！我们的霉运马上到来。西安事变发生，为国难，输忠忱，昼夜奔忙。值得一书的，某日蒋夫人在孔公馆召集我们谈话，在京干事、检察均出席。夫人语极和善，态度恳切，嘱我们抑制感情，切戒激动，要顾到蒋公在西安的处境。当时孔祥熙、何应钦两先生亦在场。桂率真（永清）兄哭了，刘健群兄自广州赶来。散会后，有人议论到戴季陶先生在中央党部纪念周高呼“讨伐张学良”事，大家都感心伤意乱。事前贺衷寒兄与我和训练处宣传组张某博士（现在欧美大学教书），连夜草拟对内告同志书，最后还是贺兄亲笔完稿。绝未言及讨伐张学良事。记得那时每夜有会报，某晚散会后，我与倪文亚兄步行一程，仰观天色，倪兄说：“万一蒋公在西安有何不测，则将天地变色。”似有所感的，我冲口而出：“不会的，不过如总理在伦敦蒙难一样。”倪兄亦有同感。后来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开拔抵达开封候命，也是事实。如果张学良执迷不悟，复兴社与他同

归于尽，也是难免。当时伦敦复兴社同仁，千辛万苦，妙计横生，设法请于凤至夫人急电告张要他把握良知，不作千古罪人。电文集体起草者，尚有二人健在台北，故事如果详细说来，可歌可泣，内容丰富。

蒋公安返南京，全国欢腾。领袖之称，无形的适用到全国上下，已不限于复兴社了。由康兆民兄惨淡经营的《中国日报》被令停刊。该报要算公开称蒋公为领袖的第一家日报。那时总编辑为天津《大公报》资遣伦敦进修回国的某兄，也就是前述廿四年夏伦敦学生会开会任大会纪录，未被共党劫去该项纪录的某兄。《中国日报》停刊，他又出版《创导周刊》，继续我们的言论，后来他也没有参加青年团。接着邓文仪解除书记职务，由郑介民接充（不久贺衷寒又以出洋闻），干事级的人员，无进退的自由，我只好暂时留下。而且郑介民和我，是国民党改组以前，在南洋与共产党斗争之友，被逼于十三年先后到广州。他入军校，十四年一同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共同反共，先后返国。此人作法不同，平稳踏实，不露锋芒，与我原是好友。不过他以后与戴雨农合作去了，很少见面。郑兄在莫斯科喜欢研究国际问题。他干“特务”，决不是老粗。退出大陆前，某晚在朱家骅先生家开谈话会后，他和贺君山与我一路步行一程，我发现他多年来气质未变。至于戴雨农与我，只在西安事变时，有两晚开会他来了，亦未交言，此外绝无来往。介民兄廿四年

在伦敦，有一次深夜与我私语，谈论复兴社的人事和前途，则迄今未忘。他责备我疏懒，我一生未改，愧对死者。知我有我者，莫过于胡步日兄。谈到青年革命同志会与力行社合并办公的组织系统，会长蒋公之下，分设干事会、检察会。干事会设书记办公室、组织处、训练处、军事处（主管国民军训）、总务处、特务处，由书记总其成。一切受会长指挥。除特务处不知地点何在，无人过问外，其余均在总会一起办公，检察会同。特务处的业务，只限于执行检察会决议的犯律案件，平时干事会开会，特务处干事可以不出席。检察会的助理书记，必须一人有律师资格者，方可充任。必要时，可代表检察会书记，列席干事会议。地方组织系统类似。

我在总会训练处任干事，不满一年，日常业务，与两位助理干事、各组组长、全体工作同志合作。偏劳他们者，编纂《人民阵线评论集》与滕兄任内的《我们的训练》成两大册，是可资纪念的出版。廿六年春夏之交，刘健群兄旋风式的回到南京，又任书记（邓、郑似是代理）。到会办公，调我为什么设计委员会主任，我乃加聘委员多人，均系初由欧美回国，略尽招待之意耳，他们不必驻会办公，大家落得自由。此时我已请准重返英国读书，已定六月廿五日船票与贺君山、吴兆棠两兄同行，谁能料到，恰巧又遇着王芃生老大哥，他以质责的口吻说：“你重返英国安心读书！马上要开

战哪！国亡了，你再读书，又有何用？你离开伦敦时，对王礼锡担保，一定有抗日战争，他说抗战一起，回国同生死，他准备回来了，你有脸返伦敦见他吗？”我不能不留下了，所剩留学公费未领。后来在重庆观音岩，路遇王礼锡，不禁拥抱，喜极而泣，警报声中，路人侧目。不幸王兄去到前方，病死于汤恩伯部队之中。“七七”圣战开始时，我在牯岭见到袁企止兄，以无事可做，不无悔意，接着君山兄奉召返国，来去匆匆，他笑我后悔，我笑他空跑，同叹读书命薄。还留在总会挂名设计委员的同仁们，由企止兄在军委会政训处成立宣传委员会，一律聘为委员，动员起来，由雪冰兄任主任委员，大家又热闹了一番。还有躲警报、看空战，全不害怕，夜间常无电灯，亦不为苦，一直撑到退出南京。那时我蒙政府派驻苏俄海参崴总领事，被史达林直接向蒋公拒绝，王亮老（宠惠）部长、蒋廷黻大使，竟不知其故安在。我被蒋公召见，亦在防空壕旁的警报声中。同时苏俄之行，是一肥缺，但非我所愿，知者甚多。宣传委员会还有一位皖籍留英同学吴大哥，对着大家说：“老白不愿去苏俄，这正是‘求仁得仁’了。”

六、复兴社的蜕变

抗日战起，复兴社已成看守状态，书记又由郑介民兼

任，迁到武汉，改为康兆民接充。此兄不夸张，能谦逊，忠勤而有毅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时，久为俄共所注意。返国与我同一车厢，对面铺睡，谈得很愉快，回国之初，且同甘共苦。力行社成立时，康任宣传处干事，旋裁并训练处为宣传组。此时恢复宣传处，请准派我为干事，金陵大学教授鲁学瀛、匪情专家李天民任助理干事。鲁、李两兄，分由美日返国，日常工作偏劳之。某日，我代表政治部第二厅出席指导青年记者学会成立会，主席为范长江，出席者有老记者邵力子，人民阵线主干郭沫若等，场内场外近百人。轮到我说话时，郭沫若挟十余人离席，向我示威。我谙其惯技，只赞扬青年记者学会的成立，必有利于抗战，切望不让某外国人（指俄）的影响渗入，无形的违反国策，以及新闻记者必能谙习法律与民情等语。范长江答以遵守指示善用组织（与会者台北、香港应还有人在），散会后送我出门，态度倒很诚恳。归途邵与我同车，他说：“我为你着急，原来还有些人待你说话后起哄的，郭沫若倒失去了一次宣传机会。”翌日，复兴社检察会书记周旭人语我：“昨日之会，原为鸿门宴，共党早就想找机会对付你的，我们担心你下不了台，亦有所准备。”周兄做人做事，与萧化之兄如出一辙，勤谨通达，毫无名利之心，两人文章道德均佳，“九一八”同自日本放弃学业归来。力行社成立时，蒋公命题作文，同列前茅，化之兄初为力社组织干事，兼代贺君山为书记。在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共党笔战被讥为小戴季陶。旭人兄抗战时，殉难于中条山，为共党所害，第二次临行时语我，明知不能生还。这是两个力行社重要人物，无名英雄，一向排难解纷，乐于助人。说来我们都是为革命而牺牲学业者。

复兴社在武汉濒于蜕变，一面谋社务的结束，一面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有一次复兴社干事会开始讨论结束事宜，蒋公特派原非社员的陈辞修、陈立夫两人参加，会议进行，原本严肃，忽然刘健群演说一番，触动了酆悌、戴笠两人（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戴，以后再未见面），先后起立发言，对刘大加指责，语态疾厉，使我很同情于刘，觉得六年来刘的长处是对民众、兵士们作通俗讲演，功亦不少，见宠于蒋公，俨然一人之下，颐指气使，予取予求。刘固爱耍聪明，喜玩弄，何以酆、戴等人，事前置若罔闻？最后又何必如此过火，逼得刘实在受不了，一气之下，返回故里，退隐山林，礼佛修行。当晚散会后在蒋公行营官邸用餐，已不见刘。记得桂率真兄早就对我说过，刘健群是他介绍，但他另介绍一位留学欧美，学通中西的某博士，惜未通过。否则力行社人才比较充实，作法大有不同，言下不禁唏嘘。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的筹备与成立之初，均无刘健群的参加，数年后始还俗回归青年团。至于青年团的筹备，也大费周章。蒋公原派有陈诚、陈立夫、贺衷寒、康泽、谭平山、韦永成等十六人为筹备委员，不知怎的，听说那十六

人只开了一次会议。复兴社又在武昌由康泽找我与任觉五、鲁学瀛、李天民等人起草计划，呈达蒋公。陈诚找张宗良、朱岱杰（共党兼第三党）等在汉口，也拟有计划。陈立夫先生如何，我不知道。一日，我忽然接陈辞修先生通知，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招待所开会，我因行车故障，慢了五分钟到达，未能入场，在一小客厅里，足足等了两小时。在他们会议完毕前，又派人叫我进去，辞修先生查问原因，我只说系我迟到误事，绝未露出只差五分钟，此事陈之侍从秘书谢然之知道最清楚，张宗良兄亦知道大概。辞修先生乃将讨论结果，对我解释一番，垂询我的意见，我自己知趣，只寥寥数语而毕。第二次开会，辞修先生未到，草案待遇一项规定，处长一百元，副处长玖拾捌元，以下类推递减两元，且必须专任。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提出修改意见，谢然之说：“这是陈先生的决定，不能变更。”他且有一套俄国共党如何如何的理论。以后通知开会，我就不去了，蒙宗良兄告我，朱岱杰对我有批评。

复兴社廿七年初夏，在武昌开结束大会，会场布置由宣传处文化组艺术股负责。会场两壁，挂有几对白布黑字标语（原用红布白字，忌有共党标语型态），大意纪念同志的冒险犯难，清风亮节，以及策励将来，其实上下缀有红绿花边，不料有“进入会堂如孝堂”的讽语。第二天赶制大幅红布金字“准备百年战争”横额，大张于会场讲堂的对壁，

亦惹人批评，好在即有大公报《论英法百年战争》的社论刊出。不过大家风趣谈笑，结束大会还是在欢乐气氛中进行。七月青年团中央团部成立，复兴社社员转为团员与否，悉听自由。复兴社（包括力行社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结束大会，由贺衷寒主席。此人由来为复兴社重心干部，即共党什么录中，亦如此云云。我知贺较详，彼于民国九年秋，继共党李维汉之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本科第二部，上课不久，旋赴苏俄参加远东青年会议，即开始就地反共，李维汉则先已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共党。贺在黄埔又发起孙文主义学会，策动反共，被迫再往苏俄，先入中山大学，继入陆军大学，依然反共，与我常讨论返国后的计划，有一次和国大代表杜从戎兄嫂，留在他们营房宿舍过夜，相当惊险。在台老友也常同忆往事。复兴社运动的诞生，确有时代使命，揭橥民族复兴运动，对于抗战大业，不无影响。只说那百万以上正式社员的一股朝气，即有助于精神动员。包括推动新生活，国民经济建设，复兴中华文化等运动。又如所属忠义救国团，借以制服流氓，打击汉奸；军事交通学会扩整军邮制度，畅通于各战区；建立稽核网，改进全国主计制度；开创国民军训制度，扩展后备兵源，皆为壮举。蜕变为青年团，设立中央团部，书记长由陈诚先生兼任，朱家骅先生代理，干事会人选，许多为名流学者，妇女有曾宝荪、吴贻芳两先生，监察会人选，书记长为王世杰先生，监察有梅贻

琦、王星拱等先生，颇具两党制度的雏形或是趋势，蒋公之用心苦矣！如无抗战、反共，蒋公两大政党的民主政治，必早已实现。

七、党团合并和多党模式

复兴社蜕变为青年团，干事名单中已无戴笠，到了重庆，戴已叱咤风云，为显赫人物，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已当选中央委员，蒋公还劝其他复兴社员与戴一同退出。蒋公之苦心，戴等能体谅，复兴社员谋国之忠，亦可概见。复兴社结束后，文人同志不论是否青年团员，在重庆常开联谊座谈会，有时在警报声中进行，讨论时局与建设问题，由青年团组织处长康泽同志转呈蒋公核阅。有一次，请徐培根社友报告世界军情，专精透辟，深蒙蒋公嘉许，改建两党问题，也曾论及。且在青年团干监联席会议公开讨论，何浩若等发言尤多，结论也呈蒋公核阅。胜利后蒋公多次与胡适之、张君勱等先生，以及各友党与社会贤达协商两大政党的建立，乃至容纳共党参加政府，这是众所周知之事。民国肇始，国民党即力争多党制与责任内阁，国父与蒋公一以贯之。不幸，国民党外人士，多数不谙共党一党专政教条及其倾覆阴谋，百端迁就，依然毫无成就。同时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初，在四中全会蒋公亲临主席，并提案请全会

通过行宪政府以党外贤达（意指胡适之先生）出任首任总统，并宣言扶助友党发展成最大政党，亦全国皆知之事。

抗战胜利后党团合并，事先在牯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公曾两次嘱干事、监察另开联席会议，有话交代。第一次他老人家到场后，含笑徘徊会场，只说：“你们先讨论罢。”而缓步退出。讨论什么，大家只有风闻，竟无人提出两党问题。第二次蒋公到场已入席，且从口袋中取出纸条，看看又塞入了，只说些其他，怏怏而去，我欲发言提出两党问题，但观大势，未敢贸然。第一，大会中已有部分团员过分嚣张，团结不易，第二，陈辞修先生为了王某教授（现在台湾）一事，未免欠耐或操切。而且陈先生不能放下兵权，书记长一职老是请人正式代理或代行，团内尚无重心（陈先生在重庆主持中央训练团，也是如此，我吃过苦头）。使我灰心，昏沉几天，当时情形，老友倪文亚任大会秘书长，谅能记忆，但不知尚同意我的看法否？那时康兆民兄在美国考察，有一天，我在汤如炎兄（也是同在南京闹学潮，他愤而入黄埔军校者）家午餐，饭后谈了一些，我乃写一长信由汤邮寄给康，痛言团结之必要。康返国，他谈及此事，很感动的说，牯岭之事，是他料想不到的。他还记得，出国前我劝他先到英国，研究政党组织与地方政府；并私语他决心回四川从事地方实际建设，且有一番计划。抗战初期，他曾邀请留英返国的复社社员，往四川作经建观察

(现在台北、美国者有人)，有报告书转呈蒋公。所以他最后乐于先往荆襄，也一向对西南同志注意联络。刘健群如何能够还俗复出，此为关键。我不知有己，斡旋团结，故知道这个谜，也很赞成这个作法。上述黄埔军人朋友除桂率真兄为职业军人外，余皆未曾带兵，十足书生气息。复社文人朋友，工程师、教授居多，非邓、干两人举其姓名者，我不能不为之隐晦，免受“蓝衣社”或“特务”之冤，也是受他们之托。

所谓党团合并，是国民党与青年团中央及地方机构合并为一。最初经过，是卅六年初夏，青年团中央团部忽然召开干事、监察临时联席会议，只有在京者出席。书记长陈辞修先生主席，宣布奉总裁命令，党团合并，青年团团员不论是否党员，一律转为党员，余无交待，语极简单，拟即散会。我回顾无动静，能说善道的何浩若兄，曾主张两党建制者，若无其事，大而化之，真浩若也，我与刘健群兄四眼相对，他低头不语，真聪明人也。张晓峰、陈雪屏、李维果、倪文亚诸兄，不知是否在场？我与有些地方干部同志，廿余年的患难相共，只好起来说话。略谓一个政党团体，各省、县团员众多，如此简单合并，地方团部如何结束？地方干部如何安排？我们应替总裁设法交待，以安人心，而利团结。辞修先生似有不耐，接着张宗良、胡步日两兄发言补充说明，主张应有研究。乃空气一变，成立研究小组，召集各省级干事

长等人来京，共同商讨，情绪热烈，拟定办法，呈报总裁核夺，始有最后的党团合并办法。接着办理中央民意代表的提名，争辩两月之久，张溥老死于此时。选举结果，行宪后的立法院有所谓革新、新政、一四三大俱乐部的产生，皆为蒋公所乐许者。尤以一四俱乐部，政团风范，至今屹立不移。党团合并后立法院的“议会党部”，友党且不许，仍有两大政党或多党功能。迁台后，辞修先生常邀我餐叙，垂询经建计划，恳挚可亲。且谈到党团合并，他有云：“当时不是你发表意见，今日立法院的局面，又当别论了。”他也曾趋向多党问题，我主张台湾暂时不宜建新党，仍以扶助友党为宜。他又说胡适之、蒋廷黻等如何如何，我又说英国光荣革命，经数百年始成；美国两大党制度，固似一蹴即成，但有赖英国血缘；土耳其凯末尔式的两党，是在救平共党之后，他有同样看法。惟于某一经济法案，意见相左，未免遗憾。我认识辞修先生始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反共群中，由贺君山兄介绍。现在台北，除前述黄埔诸友外，能来往话旧者，只有冷容菴（欣）兄。五十年往矣！回忆是极不智慧的。（一九七六年九月廿八日）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十一月《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四、五期）

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

千国勋

一、先说促成我写此文的原因

查《传记文学》杂志，是年来很受读者爱好的刊物，将来也极可能是供给民国史家的一份文献。笔者忝为“三民主义力行社”自民国二十年初冬筹备时起，历二十一年三月八日，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于蒋介石先生亲自主持下正式成立，以至二十七年九月，当我任该组织湖北省书记时，在我住宅武昌武胜门街六号——静宜别墅，由陈诚先生主持，并国民党中央派来之陈立夫先生参加下，召集该组织中央级全体干部近三十人，先后开了两次会议，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继承而结束为止，我为始终亲历其事的中央级干部之一。故我虽年已七十二岁，体弱多病，执笔写作深感困难，但一息尚存，愿就所知将这段承先启后的力行三民主义革命运动史坦白写出，以驳斥外间以“法西斯”、“蓝衣社”、“特务组织”等有悖其真情事实的谰言讹传下

去。因为这个组织之最高两级——“三民主义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之决策指挥实行机构，有严格的纪律维持绝对保密，除其中央级干部外，外界并其下层各外围组织成员，都绝少知道。所谓“法西斯”、“蓝衣社”、“特务组织”云云，则是其时安内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和攘外的主要对象——日本各驻华特务机关，在他们遭受这个组织重大的打击后，所捏造编印了一些用中、日、英文发行的小册子，予以诬蔑破坏而丑化之者。这些诬蔑丑化那个组织的小册子，因为它很迎合一般好奇人的心理，故流行也广，虽在国民党治理的地区，不易见到，但在香港、东京、新加坡、新得里、华盛顿、纽约和中共控制的地区，则可随时可见而买得到，故自四十多年前起，就对我们三民主义革命建国事业，有极大的阻碍和伤害，遂致中国共产党之统战，能孤立我们，渗透我们内部，致我们终于失去了大陆，到达今日这步田地，犹有人不深加研究，掉以轻心，只图迎合一般好奇者的心理，而不知不觉，或多或少，跟着其路线，用文字随便忆写其内容，真所谓“世衰道微”，是非莫辨！笔者是五十余年前，诀别父兄，应孙中山主义之号召，从我故乡湖北军阀统治地区，潜往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五期肄业，为了增强学生革命军人精神教育和对政治的认识，其于孙中山先生著作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革命军人精神教育等，遂为必修之课程，往后从军、从政、办

党，日子久了，读的也多，深觉其千言万语，皆是前后一贯的自一个崇高之理想出发，以中国固有之正统思想为基础，集古今中外圣哲济世利人学说精华之大成，创立三民主义，针对现时代需要，为谋人类的至善生存而设计，以发扬中国正统王道民本政治思想文化而光大之。且从在广州时起，于蒋介石先生间接和直接领导之下，先后以“孙文主义学会”、“黄埔同学会”、“三民主义力行社”诸组织为中心，与唯物反中国固有正统思想文化的共产党，作过相当长时期的斗争，三民主义力行社在民国三十年代初期，六年余岁月中，是极为成功的一次奋斗，使其恃以为统战的“万应灵丹”唯物辩证法，完全失效破产了，孤立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共的汪洋大海中，使“猖獗”数年于华中之共党，先后于民国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冬，由朱、毛、周、徐向前等，率领其残余落荒而逃至陕北保安县，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难于填满肚子的包谷杂粮，彻底肃清，仅时间问题耳。至于其如何改变策略，得迁至食、住均较好的延安县，因不在本文范围内，概从省略。笔者此作只求质诸鬼神而无疑，问诸尚健在的创始该组织之各重要干部而不惑，其他知我罪我，则非所计。

二、该组织创立前之背景与筹备

民国二十年夏秋之交，长江中游发生了大水灾，中国共产党乘机在赣、鄂、皖等省，大量裹胁灾民，组训红军，据中央代表王明——陈绍禹，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届全会报告：红军正规部队三十六万，民兵与赤卫队六十五万，共计一百零一万，据赣、鄂、皖三省边区扩大“叛乱”。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发动沈阳事变，迅即占据了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北侵至长春，南侵至锦县，几于是与中共不约而同的趁着天灾，对我内外夹击，而中共派在上海搞统战之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以请愿抗日为名，煽动民众数万，涌至南京，打国民党中央党部、国府外交部、中央日报社，以配合其在赣、鄂、皖的军事攻势，期陷全国于混乱，使彼等好在混乱中谋发展——全面进行“赤化”。是时为国民党“训政时期”，亦即是“以党治国时期”，共产党此项举动，即是对其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为致命之一击，使其威信丧失，无能有所作为。

这时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因在广东的国民党部分中委，以九一八事变东北要地失守，应由蒋先生负责，迫其辞去本兼各职，方肯来京共赴国难，蒋先生以闯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乃向党中常

会辞去了本兼各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飞赴奉化休养，南京虽由北来之汪兆铭、林森、孙科、陈铭枢等分负党、政、军责，然而在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倍感困窘，顿成空虚状态，全国有陷于分裂混乱之势。

在此危急存亡险象显现之际，以黄埔军校一至六各期毕业生为中心之护党救国筹备处的工作，不忍其自民十四以来，流遍了血汗才告统一的国家，再遭受亡国覆党之痛，便更加积极进行，遂派叶维、娄绍铠去上海，郑炳庚去杭州，李国幹去安庆，匡正宇去南昌，丁炳权去武汉，秦启荣去济南，萧洒、陈祺去开封，贾毅去北平，刘广瑛驻北平任东北特派员，申傲霜、梁雪停去太原，萧乾去福州，张海如去西安等地，就各该地区，选任在军、警、宪、党并民众团体工作之各期军校同学，建立核心干部小组，一至三五组不等，秘密指挥党、政、军、民、警、宪，展开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日本驻华特务机关汉奸活动，及一切反国民党反中央分子，予以有力之打击制止，南京由筹备处书记滕杰与各筹备员直接指挥在党、政、军、警、宪、民各方面服务的同学，组成大致是三个小组，作巩固国家命脉的安全措施。

筹备处是设在二郎庙街，康济医院内一大间木屋内，滕杰偕其未婚妻陈启坤女士——助书，每日都来办事十小时以上，康泽即住在那里，经常前往开会和策商工作进行者有贺衷寒、萧赞育、潘佑强、杜心如、周复、李一民、孙常

钧、韩文焕、邱开基、黄仲翔、桂永清、彭孟缉、笔者等。而乐幹、李国俊、梁干乔、陈九陔、余洒度、梁步云、陈景贤女士——周复妻等，亦常去接受任务。是时贺衷寒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韩文焕任宪兵司令部及首都卫戍司令部警务处长，黄仲翔任中央党部组织部军人科长，周复主持大型的《亚东新闻报》，李国俊、乐幹、陈九陔等均在首都警察厅工作，梁步云在南京市党部任专员，王敬久的八十七师驻南京及其郊区，王任卫戍副司令，他们皆对巩固首都治安，坚强筹备处展开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因必须绝对保密，连同外省市工作人员，都可说是无名英雄。

是时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生达万人，除在上述各机关任中下级工作干部外，并控制有武装部队近三十万，但其官阶只由排长到师长为止，师长以上多半为其老师辈，因平时训练一致，生活习惯也一致，战场上共过生死，复有其在“孙文主义学会”、“黄埔同学会”之对共党并其他“反动分子”相当长时间之斗争经验，如笔者在入伍生期中，即被派参加北伐，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党”时，被任为苏州市清党委员会主席、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委——县长、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主委等，其他贺衷寒、潘佑强、滕杰、葛武荣、周复、韩文焕、叶维、彭孟缉、黄仲翔、曾扩情、萧赞育、邓文仪、胡宗南、郑炳庚等，皆是在“孙文主义学会”并“黄埔同学会”中之健者，故在党国多难中，一经有个策划

指挥的中心组织，便能一心一德，发挥其对一切反动势力作极有力之斗争，此非笔者在事过境迁的今日，随意自我夸耀，有违中国人传统“好汉不言当年勇”古训，然试一回索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发动侵袭我淞沪时，在战地及全国所表现之民心士气，与秩序安定的情形，与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时迥然不同，事隔不过四月，而有此差异，足证所述乃历史的事实，虽因其事属秘密，史家迄今未见记载，而这种客观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以上为促使此组织创立之背景，及其筹备期间人事与工作情形。

三、正式成立经过及其真实名称与分工并二三级组织之名称

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前数日，汪兆铭与孙科，因日军积极部署进攻淞沪，他俩乃循京杭国道前往杭州与蒋先生会晤，并敦促他即返南京，统筹对日军抵抗事宜，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亦派人向蒋先生有所报告，蒋先生以上海逼近南京，如不作有效之抵抗，则南京亦势将难于久守，南京一失，则将使整个局势危殆，故即返京。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日驻沪海军司令盐泽，即指挥其陆战队进袭我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迅即进入闸北及京沪车站，我驻沪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乃即率部奋起抵抗。蒋先生一面命中央

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以八十七师王敬久，八十八师俞济时两部组成第五军驰援，一面与汪、孙等决定，迁中央政府于洛阳——称为“行都”，二十九日他亲自护送国府林森主席、行政院汪兆铭院长至洛，当即回京指挥军事，苦战二十余日，日军数度由其国内派军增援，达四个师团近十万之众，以白川义则大将为总指挥，我军为五个师约四万人，白川为断我军后路，派一个师团两万人，潜由浏河登陆，三月一日我军不得已放弃前线阵地，撤至太仓、黄渡之线坚守，日方见我军作战英勇，民心士气仍然高昂，而迁都洛阳，后方秩序亦极稳定，以示抗战到底决心，国际舆论亦对日本倍加抨击，日本遂放弃逼我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进攻南京之企图，即在太仓、黄渡、南翔之线，成胶着对峙状态，并酝酿停战议和。

此时前线情势已趋缓和，蒋先生住中央军校内官邸，筹备处乃推滕杰、贺衷寒、康泽三人前往晋谒，报告组织动机及宗旨：为团结同学并全国人民恢复革命精神，护党救国。报告筹备期间工作情形，及所发生的效用，陈述未来的工作计划，并请领袖指示。他听到称他领袖，即微笑说：“你们仍称我校长就好。”有谦让不敢当之意，滕杰即解释说：“现在党国危难，各方意志也不一致，我们亟须有一个领袖，作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领导中心，以发挥其护党救国的功能。”他说：“你们知道这样作，是很好的，但你

们经验都不够，恐怕作不好。”贺衷寒答复说：“这就是我们须要一个领袖领导去作的原因。”他已意识到了滕杰所报告的以往数月之工作经过，可能就是沪战时之民心士气高昂及后方各地秩序稳定，比之九一八事变时，大不相同的原因，于是就说：“试试看吧，改日再谈。”这试试看，就是他认为有此需要，不过含有警戒须细心之意。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举行后，三月六日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推选蒋先生为委员长，以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等为委员，至此蒋先生以党中政会常委而兼负军责，已恢复了其党、政、军的职权。他在三月四日就嘱侍从秘书邓文仪告知滕杰，自是日晚七时起约集筹备处全体筹备员到中山陵园下松林中，一栋独立平房内开座谈会，计到有：滕杰、贺衷寒、潘佑强、鄧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萧赞育（以上除滕杰外皆军校一期）、葛武棨、蔡劲军（二人军校二期）、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骆德荣（皆军校三期）、娄绍铠（四期）、干国勋、彭孟缉、易德明（军校五期）、戴笠、刘诚之、陈祺（六期），另有一期曾扩情、胡宗南，四期叶维三人，因公出未能到会，合共二十八人，这是绝不错的。座谈会没有设置会议长桌，仅在那个长方形屋子内，置些大小不同的沙发与木椅，蒋先生坐于屋之西端靠墙壁的藤圆椅上，前置中型写字台，邓文仪坐其右侧小沙

发上，前置茶几当记录，滕杰送呈到会者名册，并报告曾、胡、叶三人因公出不能到，蒋先生当举目遍视到会人员，即说：“党国现处于非常危难中，特约你们来谈谈，听取你们各个人的意见，故不采正式会议形式，重在听取你们每个人发表你们的意见，说话不限时间。”他也没有规定谁先谁后。惟军校那时有一自然习惯，即凡集会，总是从前期又年长者依次发言，因曾、胡未到，贺衷寒为第一期又年最长者，故他首先说话，依次是孙常钧、潘佑强、桂永清、杜心如、酆悌、萧赞育。邓文仪因当记录本晚未讲话，他们每人占时间二十分钟、半小时不等，蒋先生静坐倾听，不时用蓝铅笔记其要点，偶尔听不清楚时，发问一两句，好像极力避免打断发言者话头，他是那么镇静耐烦，一改过去他对我们严厉督责的态度，可谓循循善诱，从七时到十一时约四小时，说话仅七人，以桂永清占时最多，他刚从德国经莫斯科、伯力、满洲里、张家口、北平回到南京，他的报告，正是蒋先生与我们亟欲知道“九一八”、“一二八”变后，欧洲及北满和华北一般反应情形。座谈时屋外没设岗哨，仅戴笠一个人内外走动，他表现得机警、勤劳、镇定，这种不设岗哨是当时蒋先生所到之处少见的，他也许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个个都是他的卫兵，为了保密轻松，只要戴笠一个人走动看看就可以。那房子左上方是巍峨孙中山先生之陵寝，右后方一华里处，是驱除蒙元皇朝朱元璋之墓，他选定这

样一个宁静而肃穆的处所，召集我们开座谈会，是含有深意的。会完他说：“没有讲话的，明晚同一时间在此继续。”由邓文仪陪走，我们即分乘来时坐车回家。在车行途中彼此虽少谈话，但各人面部表情无不兴奋，会心的认为他在百忙中，是如此集精耐烦的听取我们的意见，意味到，是我们与党国新生命的起步。次日下午六时前后，我们均到二郎庙街康济医院乘车前往，戴笠与滕杰第一车，他俩一在察看环境，一在察看会场，余亦皆准时到达，蒋先生仍由邓文仪陪同莅临，邓第一个讲话，依次是葛武荣、蔡劲军、周复、康泽、李一民、韩文焕，此时桂永清又突然站起举手要求发言，大家颇为讶异，他说他要当领袖及大家之面推荐人才，其人即刘健群也，他说刘自广州时起，即追随何应钦老师由书记渐升至同少将主秘，现在他对护党救国有具体意见，是个忠党爱国的人才，我们要罗致重用。领袖点头说：“明日上午八时请他至军校一谈。”我们之中有多人与他相识，亦无异议。次即轮到邱开基、黄仲翔、骆德荣，又已到深夜十一时，还有八人未说话。蒋先生说明晚同时在此继续，即散会。

第三晚娄绍铠先说，依次是干国勋、彭孟缉、易德明、戴笠。戴三晚来辛苦极了，别人除说话外，多静坐休息，惟他须保障安全，无片刻休息，仅在临他说话前，坐了两分钟，他年已三十，浓眉、大眼、方口，穿灰间白点的中山装，

站立室中，表示他的意见，简明有力，说完，谦请领袖及老大哥们指教。再是刘诚之、陈祺，最后是筹备处书记滕杰，他未依次在娄绍铠前后发言，显有以创始兼负责人，对三晚来大家说话作结语，并其创立组织之用意，领袖及全体与会者皆极注视，时近深夜，格外宁静，他整洁服装，戴近视眼镜，挺立室中央，声音宏亮，慷慨陈词，力主以坚强组织，在领袖指挥下，恢复革命精神，内除反侧，外抗日敌，死里求生，操之在我则存，列举史实后，结论是：“过去在广东我们以数千之众，带动友军，扫除了数十倍于我之敌，并不怕近在香之英帝，以大量械弹金钱支持陈廉伯捣乱，也不畏受俄共操纵处在我心腹中之共党掣肘，终于统一了两广，完成了北伐。今有三十万众，据整省精华之地，还不能协同友军结合人民，以剿除共匪，抗御日帝吗？！”表示极有信心，能完成总理遗给我们的建国大业，等于是要求再动员，再战斗，再革命之怒吼！大江之滨，钟山之灵，要放射其能力，以慰总理先烈在天之灵，而副全国人民喁喁之望。

最后蒋先生作结论指示说：“三晚来听了你们每个人的意见，你们有进步，有志气，但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军俱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更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可用之兵时，

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满清入关统治汉族二百六十八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文字狱，订种种苛法虐待杀戮汉人，观于日本统治朝鲜、台湾五十年来，其苛虐较满清犹过之，自总理逝世后，革命责任不幸落在我的肩上，我断不可失于知己知彼，不负责任，上负总理先烈，下负国家人民。须知现代化了的日军，我华北平原，绵长海岸线，和长江水道，都极适于他陆、海、空军之活动，现代化武器杀伤力极强，机械化装备行动迅速，我们虽地大、物博、人众，一点准备没有，有什么用？现在高喊抗日者，是别有用心，像共产党到处高喊抗日，如一旦真打起来，他不但不会上前线，还要在后方捣乱，‘九一八’、‘一二八’、沈战、沪战，他拥有百万匪军，除了在后方捣乱外，派了一兵一枪上前线吗？你们如果是总理信徒，应从现在起实干、硬干、快干、苦干，须知多一分准备，便少一分牺牲，多一天准备，便少一天危险，现在一般不负责任的人说：蒋光鼐、蔡廷锴是民族英雄，我蒋介石畏缩妥协，你们想想：我有你们三十万众，如果不负责任，不知彼己，不顾后果，我不能做民族英雄吗？须知个人受辱事小，革命大业和保全国家人民事大，我断不能只顾个人，而牺牲国家人民，上负总理先烈，及亿万世之祖宗，下遗祸后代，故只有忍辱负重，在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

绝望时期：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

他这一席出自肺腑的精诚结论，使我们全体深为感动，当即一致起立，表示敬谨接受。时已至深夜一时，他又说：“明早八时，再在励志社见面。”而散会，这个结论，就是后来“三民主义力行社”，积极致力其四大运动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最切实的安内攘外国策，使中国革命第三度进入高潮，消灭了“以共党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拒绝了日本之妄想连续入侵，使我国获致了六年余的准备时间，对内致力各项建设，对外争取了些同情的与国，终于得以坚持八年抗日，为得到最后胜利奠基，其详容另分述。

当然抗日胜利的出力者，并非仅止于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人，我们非敢贪人之功以为己力，但当时如无这个组织，在蒋先生苦心孤诣的坚强正确领导之下，实干、硬干、快干、苦干，以扭转险象横生危局，重振了国民党并其训政政府之威信，形成了中国谚语所谓“天下大势有利于我”，而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大众，云龙凤虎，翕然相从，如此，才有那些智能之士，为保卫国家出力，发生其效能的机会，这是为外界迄今不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的。

三月七日上午八时，我们齐集黄埔路“励志社”，那是一栋宫殿式的建筑，仍然无岗哨，仅戴笠一人照拂，他陪同我们进入东边一个长方型的教室，除东头靠墙壁处，上悬

总理遗像遗联，下树立黑板白粉笔，及藤靠椅写字台外，余是一排排的稀疏双抽屉木桌木板凳，我们鱼贯就坐顷刻，蒋先生穿蓝长袍由邓文仪陪同进来，滕杰像个学校的值星班长，喊起立，蒋先生就坐后，他报告了已到人数，也在蒋先生点头命坐下之后，一同就坐，蒋先生略一看过名册注视一遍，便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九个字，随拿起《孙文学说》，桌上还放了其他数本书，就对我们讲“知难行易与真知力行”，一个多小时，再出两道题目，命我们每人各选择其一题，作国文一篇，文言白话字数多少不拘，须于明日上午八时来此交卷。

八日我们遵时到达，蒋先生仍由邓陪来，穿着如昨日，滕杰送上各人作文二十余篇，他戴上老花眼镜，近两时看毕，并写顶批、评语、打上分数，易德明文改得很多，并为之解说，再令滕杰送还各人，他谦虚的说：“你们各人看看顶批、评语、分数对不对？”后再由邓文仪收起，即由蒋先生领导往礼堂当着总理遗像，连他在内手牵着手，他并说：“这个组织就叫‘三民主义力行社’。”这个名称，正是对症下药，适当极了。随即各人拿出预先准备好了誓词，肃立面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誓词笔者虽记忆不太清楚，似乎是：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

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宣誓人〇〇〇押右姆指印

监誓人蒋中正盖章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八日

以上是这个组织正式成立的经过，及其名称之确定。可见蒋先生在那时是如何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及其认识正确深远，绝不瞻顾因循，而忍辱务实，集精会神，以突破横逆。三月九日邓文仪送来他亲笔书写的干部姓名，并其职务分配名单如下：

常务干事兼书记：滕杰。

常务干事：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康泽。

干事：胡宗南、孙常钧、邓文仪、杜心如、萧赞育、葛武荣、周复、韩文焕、李一民、曾扩情、酆悌、黄仲翔。

候补干事：蔡劲军、邱开基、骆德荣、叶维、娄绍铠、干国勋、彭孟缉、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

上项干部名单的决定，是经蒋先生参合陵园座谈会每人的意见、仪态、期别、经历、作文成绩、选举得票数等综合而成，是极慎重的。旋由常干贺衷寒主席，开全体干部会议，研讨通过组织分工办事和其人选如次：

甲、书记处：书记滕杰，助理书记侯志明，稍后再加林

培琛。

乙、总务处长：李一民，助理何日纲。

丙、组织处长：萧赞育，助理胡轨、李新俊。

丁、宣传处长：康泽，助理梁干乔。

戊、特务处长：桂永清，助理戴笠。但桂永清仅任职一周，因他筹办军校附设军官干部训练班事繁，不能兼顾请辞，由书记滕杰转报领袖，准予辞职，并以助理戴笠升任，同时任郑介民为该处助理。

以上为力行社本部之人事及分工情形，这个最高计划决策中心，是以书记总其成推动一切工作，对领袖，及常干会、干事会负责。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又通过了设立两个二级组织，为执行推动一般工作，并初步征选训练分子机构，其名称与分工及人事如次：

甲 革命军人同志会

潘佑强任常务干事兼书记，杜心如常干兼组织处长，娄绍铠常干兼训练处长，干事易德明兼助书及总务处长，孙长钧、韩文焕、彭孟缉、骆德荣等为干事或候补干事。但这会于二十二年春，会员大会改组后撤销了，因领袖面谕不要在部队里发展组织，恐有损正规部队团结。另在力行社本部增设了一个“军事处”，办理有关军事事宜，以杜心如任处长，孙常钧副之，包烈、李国干等任组长。

乙 革命青年同志会

葛武桢任常务干事兼书记，干国勋常干兼组织处长，康泽常干兼宣传处长，刘诚之干事兼助书及总务处长，桂永清、酆悌、蔡劲军、赵范生等任干事或候补干事。这级组织，除每年改选人事有变动外，其在各机关各地区，均以此名称吸收分子，并分成小组，训练、活动，推行工作，设有组织、训练、特务等干事与助干，视必要在各行政专员区，或特定处所，设支会与直属小组，均有办事机构与经费，一直到二十七年冬由“三民主义青年团”继承结束为止，惟书记概系力行社社员，或中央级干部。

以上中央级内外两层组织之分工、人事、组织、助书、助干等以上，概须经领袖亲书姓名核准，各机关地区组织、人事等，由中央级组织会议通过后，再送呈力行社通过转呈领袖核准之。

丙 复兴社

属第三级外围组织，是二十二年七月，任觉五任青会书记时，在其住宅南京市“三益里”四号兼青会办事会所，开会后于其屋顶纳凉时，大家便谈中，以现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组织者多，未便不顾，为了保密并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复兴社”名义吸收，作为第三级组织，后提力社会议通过，再呈领袖核准，惟其自中央以至机关地方，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其事务是一律由青会办

理，但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

在这要说明的是：凡力行社社员自然必为青会会员，亦自然必为复兴社社员。但青会会员必须经力行社会议通过，呈领袖核准后，才提升再宣誓得为社员，复社社员提为青会会员，亦须由青会会议通过，呈报力行社通过，再分批呈报领袖核准宣誓后，始可。

四、力行社附属的其他外围组织

这些组织，均各有其特殊性，而为力行社先后遵领袖意旨，而订定规章，提会通过，呈领袖核准设立之，兹依照其成立先后时间分述如次：

甲 民族运动委员会

采委员制，以扶助弱小民族独立运动为宗旨，成立于二十一年四月，主委干国勋，桂永清、邓介民、叶维、任觉五、黄绍美、赵范生等任委员。有办事处所及经常费，所辖有“朝鲜义烈团”，为其时金九氏之“朝鲜独立党”另外之一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系军校四期陈国斌，鲜籍姓名——金元凤——金若山。曾由本会支援其办了数期“朝鲜革命训练班”，每期学员生百人上下，修业时间半年或一年，皆鲜籍青年，队职官与各科教官及事务员亦皆鲜籍，陈

国斌为班主任，中国人仅笔者为其顾问，与滕杰、康泽两人间或前往作精神讲演，绝对秘密，其团址与班址，先设在南京郊外麒麟门，不久为日人所侦知，再迁距汤山约二十华里之茅山深处一栋经改造后的庙宇里，改造材料多就地取自山里之木、石，人工概由该班员生操作，金九时在洛阳，特派延秉浩君南来与笔者及陈国斌联络。二十五年由康泽接办，并先后迁至武昌、重庆。二次大战后，韩国独立，闻陈国斌与李承晚不能合作，而未受到美方支持，大多未参加政府工作，陈国斌亦未再见其露面，究竟如何？我们不知其详。

乙 中国童子军励进社

采委员制，笔者先奉命为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主任，故该社主委亦由笔者兼，有机构经费，委员赵范生、杨克敬、陈潮中、蒋无识、陈启宇、吴淑清（女），成立于二十二年四月，有社员约三百人，多系各省市任童军职者。

丙 西南青年社

委员制，成立于二十二年六月，康泽任主委，委员任觉五、叶维、李秉中、刘伯龙、张元良、毛嘉谟、柏良、雷清尘。有机构经费，旨在团结川、滇、黔等省青年，参与民族复兴运动。

丁 中国文化学会

委员制，成立于二十三年春，有经费机构，邓文仪任主

委，委员高传珠、吴兆棠、李厚徵、程兆熊、郭寿华、郑用之等，旨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各省市设有分会，大致由该地青会兼办。

戊 忠义救国会

委员制，附属于特务处，各省市分会亦多附属于其青会之特务干事主管，主委戴笠，委员赵龙文、王兆槐、邱开基、郑介民、周伟龙、王新衡。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成立于民国二十四年春，力社以工、商界群众，仅次于农界、学界，认其为第四级外围组织，与前述各外围组织稍有不同，抗日时之“忠义救国军”，即以其会员为基础。

五、力行社各种训练机构

力行社成立之始，为了全面推动其工作，迅即陆续创设多种业务性质不同，而宗旨却是一贯的干部人员短期训练机构，兹依据其创立时间之顺序，分述于次：

甲 军官高等教育总队（附设于军校之内）

成立于二十一年一月，学员全为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生之军官，约六百余员，分为四个队，徐培根任总队队长，第一、二、三、四队队长为：桂永清、潘佑强、杜心如、阮齐，皆力社基本社员，除阮齐外，后皆当选中央级干部。修业期

限半年，所有队职官员及学员，后皆成为各种训练机关之主官或中上级干部。

乙 情报人员训练班

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他具有情报性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尽忠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一支奇兵。

丙 国民军事教育组

成立于二十一年七月，主任赵范生，副主任胡屏章，队长杨涛，教务主任杨克敬，训育主任陈潮中，教官二人，训育员二人。除了教育童子军智、德、体三育外，兼教军事常识，由队职官任教。赵与杨涛皆军校五期，胡日本士官，杨、陈皆原童军司令部组科长。训练计划由总会筹备主任于国勋，连同总会章程、编制、经费等亲呈会长蒋先生一一核准。招收学员一百六十人，军校各期毕业生三分之一，余皆调自各省市立学校及社会童子军现职干部，训练期半年，旨在配合新设立之总会，予中国童军以改进，强化扩大其

组织，增进其智能、体能、爱国革命的思想意志，并兼有青少年军事常识，以适应时代需要。

丁 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

主任孙常钧，训育主任林英，皆军校一期、力社社员。成立于二十一年四月，下设五个大队，大队长皆军校一、二期、力社与军会社员会员，学员一千八百余人，军校各期毕业生五分之一，余出身讲武堂及归顺国军之各部队所设之临时军官训练班队者，修业期半年，大部分派任各省市县学校任国民军训教官与职员，余派任尔后力社续设训练机构队职官。

戊 军校附设军官训练班

成立于二十一年八月，设四个大队，抽调各部队校尉级军官一千七百余员。班主任桂永清，训育主任干国勋，班附王公亮，一、二、三、四大队长为：张坤生、岳琴、周振强、王振敦。除干国勋外，上述诸员皆军校一期。但自中队长以上皆力社干部，或社员，及两会会员。聘有德籍顾问上、中、少校各一人，共三人，以巴德上校为首席顾问。此项德式军训，以其于一次大战战败后，在中国无任何特权，能以平等待我，而其战技仍属世界第一流，能助我改进部队战技，为抵抗日军现代化作准备，与其政治性质无干。流行到现在之领袖歌词，即系桂永清与笔者商酌所作，词曰：“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

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校本部音乐教官戴逸青谱曲。修业期一年，大半仍回部队原职，余留校创立“教导总队”。

己 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

成立于二十一年七月，招考军校各期毕业生五分之一，余皆各大学校毕业生，共取六百余人，为力社一高级干部养成之所。班主任刘健群，总队长阮齐，副曹金轮，教务主任何浩若，训育主任先后由梁干乔、余洒度出任，指导员滕杰、康泽、萧赞育、干国勋、赵范生、何德用、袁其凝、沈遵晦、杨啸伊、李秉中、王天中，秘书兼总组长匡正宇，教官孙慕迦、高信、向理润、孙伯謩、白瑜、布哈林（俄籍，教情报）、桂永清、彭孟缉等，除何浩若、高信两员外，余皆力社中央干部或社员。蒋先生亲书班训“坚苦卓绝”，训练纲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训练目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修业期半年，原拟分发各机关地区发展组织，推行四大运动，二十二年二月毕业，适长城抗日战事发生，除小部分分发重要地区办组织外，余五百人组成“华北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分三大队、九中队，率领北上，担任说明中央安内攘外决策，团结军民，一致抗敌，消灭日本特务机关及伪满洲国之地下汉奸活动，振作军心民气，确保华北内蒙不受侵略与日本之“特殊化”阴谋，使我们在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区，

得以做好安内攘外之军事、政治、经济建设等工作。至长城之战结束后的华北工作，容另章叙述之。

庚 豫、鄂、皖、赣四省团干队训练班

成立于二十二年一月，班主任蒋伏生，训育主任滕杰，大、中队队长及训育员以上，皆力社及两会会员，是针对其时四省“剿匪”工作而设，学员一千七百余，除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分之一外，余皆调自该四省之保安团及县自卫队之中下级干部，施以半年“匪情”、情报、军事、政治、战技训练，结业后各返其本团队，强化地方武力，配合国军之“进剿”，扫荡“匪党”、“匪军”，使行政正常施行，人民复耕复业，并协助力社推行四大运动。

辛 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

成立于二十二年春，办了三期，先后主任为酆悌、李秉中。每期学员，约三百名上下，修业期一年，皆调自各邮、电、铁路、公路、轮船、航空等局或公司，施以专业、政治、情报、军事常识、体能等训练研究，而以各该专业及思想精神革新为主，亦旨在配合力社推行四大运动，建立交通与通信系统。

壬 星子特别训练班

成立于二十二年暮春，当时是为了配合碉堡政策对赣南山地各县盘据共党、共军之“围剿”，由力社本部研究对共党、共军、共谍等之运用其唯物辩证法。在那些绵延数

百里之山地里，雨量适宜，带有峡谷平原之肥沃耕地，村落处处，裹胁人民，斗争地主富户，以求共党、共军量变多，质变赤，常化整为零避开国军优势，而仍钻隙进行其地下活动——不易发现的少量活动，并伺机集零为整，以袭击我劣势之国军，因而敌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得意语。由这研究所拟之肃清共党共军的计划，是由滕杰、萧赞育、康泽三人携往在江西临川县督师的蒋先生面呈，并说明其要点，蒋先生当即批准，命与南昌行营参谋长兼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商量进行。在返南昌途中，康泽表示办报非其所长，要负责执行这计划，否则他想辞职出国考察，意在要求滕、萧推荐他，他有此勇气，且曾留俄懂得些共党术法，他俩乃答应向领袖及熊式辉推荐他，在南昌得到了熊的完全同意，并指定在星子县设班。星子前滨鄱阳湖，后靠庐山五老峰，为三国时吴将周瑜练水军之所。康泽在力社干部群中，是一个能吃苦耐劳颇有动力具野心者。于是就由他充主任，杨文连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书，胡国泽、贺明宣、柏良任队长。首期完全招收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百余人，授以敌情、情报、化装术、突击战、搜索术、通信、联络、体能、爬山、越水、夜袭、组训民众等特别训练。修业四个月，即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剿匪别动总队”。康任总队长，受军委会委员长直接指挥，也受当地“剿匪军”长官督导。携带手枪、炸弹、特制之轻便

通信联络器具，化装游动于山区村落间。对零星“潜匪”予以狙击，“匪党”地下组织也予消灭。使人民不再受其裹胁杀害，与我正规军密切配合，断绝敌的交通连系，并使其不能再化整为零，或集零为整。同时协助地方政府，整建自卫武力，进行正常施政，使人民复耕复业，加速缩小包围圈。更使其“中央苏维埃”不再有能力对全中国有敌党敌军之处，发生联络指挥作用，及对国际共党再能获得指示支援。至二十三年十一月遂克复了敌瑞金县，残敌约七万，由朱德、毛泽东、陈赓、林彪等率领突围西去。至此江西、湖北、安徽、闽北之敌完全“肃清”了。惟特训班仍续办了数期，其学员也兼招收豫、鄂、皖、赣、闽、浙等省之地方团队干部。潘佑强亦曾任过一期的班主任，余皆康泽担任。别动总队长，则由康直任至入川，肃清了该地逃敌去陕北保安县而结束，改编为正规军为止。

癸 中央警官学校

以二十二年当选力社中央干部的李士珍接陈又新的校长职，另在南京市郊麒麟门，新建校址，增新设备，扩大教育范围，分学员及学生班两种，学员班分批调自各省、市、县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纹、户口、侦讯、擒拿、追踪、交通、信号、警犬训用等……学术，修业期半年；学生招考初中程度学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训练、外文教学、军事常识操课、体能训练等。修业期三年，旨在

革新警政。校长蒋先生兼，李士珍任教育长，刘诚之任教务处长。其任期皆甚长。至抗战时期，迁校至重庆南岸弹子石。陈玉辉（军校二期）亦曾任教育长。

此外杭州警校，亦系新创，赵龙文任校长，注重刑警教学。

子 航空学校

设于杭州笕桥，自徐培根任军政部航空署长后，参酌周至柔在欧考察报告，即改进扩充，分飞行、地勤、防空三部门，购进各项设备，招生训练，领袖任蒋坚忍为其政治部主任。蒋氏原系军校四期步科，任航空政治部主任后，亦练习飞行，取得正式飞行执照，间亦代理教育长，创刊《中国空军》月刊，引进空军各项知识，灌输三民主义信仰，增添设备，使飞行、地勤、防空三者系统化，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奠定了基础。力社每次干事会，他均亲驾机飞京出席，报告校况，力求发展。抗日战争时，空军虽居劣势，而初期常能以寡胜众，空袭警报确实，减少损害，坚忍之力居多，他有建立空袭警报经过书赠笔者。

丑 军政部学兵队

成立于二十三年春，以留德力社社员李忍涛任队长。招收初中、小学毕业百余人，购进器材，聘任专科教官，授以化学兵科各种知识技能、体能训练，正式建立中国化学兵种。抗日战争时，在大别山南麓、江西德安、湖北大冶、襄

樊、咸宁等地，发生有良好战果，迟滞了敌军前进。

寅 其他

此外中央军校，及步、炮、工、辎、军需、陆大各校之兵种干部作育，亦多力社社员及两会会员、复社社员，参与教学，或队职等工作，政训工作自然全系力社及其所属担任。而内政部主办之“县政人员讲习所”，及庐山高级党、政、军人员训练团，亦皆有力社及其所属多人参加工作。

从上述列举自力社成立之始，其所积极举办之多种干部人员的大量文武合一性之训练，以实践三民主义之诸般革命性的改造建设，兼致力安内攘外工作，并复兴民族运动，即可以证实其承先启后，导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进入第三度高潮，实非偶然。尚有若干人士健在，堪以作证。改革古老落后之中国，进入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其正统思想文化，于力行三民主义之中，故必精诚无间，多方设计而力行之，使人尽其才，野无遗贤，朝无幸进，方可获致也。

六、力社干部群

关于力社干部群，前各款所述，大多以其首届为主，兹再就记忆所及，依次自二十年筹备时起，至二十七年冬结束止，各届中央、机关、地方之较重要者姓名如下：

甲 社本部书记

一、二、三届之滕杰、贺衷寒、刘健群三人，均系按章每年举行社员代表大会改选，用直接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中央干部，再呈报领袖，大致就其中得票多者，圈一名为书记。四、五、六、七任之酆悌、刘健群、邓文仪、郑介民、康泽五人，皆由领袖直接任命，其中刘健群之再任，系因酆悌所用之助书陈光国涉及刺汪精卫案被免职，而派代者。

酆悌之免职是这样的：汪精卫被刺后，政府积极缉凶破案，蒋先生得到戴笠的调查报告，酆悌任用之力社助书陈光国也牵涉在内，他极为震惊意外，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的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惩处。”云云。因此竟搁延下来，而以免职了事，陈光国则处了死刑。酆悌系军校一期，北伐时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任黄埔同学会两届秘书。十七年接周佛海任军校政治部中

将主任。一般皆知系蒋先生亲信学生之一，如因汪案而处死刑，则显牵涉到党内重大政治问题，故贺衷寒之流泪请一起惩处全体干部。而孙凤鸣又是开枪刺汪者，为张继、张学良在当场所擒获，鄂遂被免职未受到严惩。（陈敦正先生所述陈案，与实情颇有出入。）

乙 补正

陈敦正先生在其大作里，所写干部群之三十二人，除漏掉了许多中央及地方重要者外，也没有分出其先后轻重，和何者为中央级？地方级？及后来增加者？这是历史性的文献，贵在严谨求真。尽管现已有多人作古，而尚健在，名位较当时大有升降者亦多。中国史家，自春秋时代之孔子，与齐太史，及太史董狐三人，后代常以其不问时过境迁与权势之涨落和存亡能直言为贵。如陈所述之黄珍吾、高传珠、袁守谦、刘咏尧、胡轨、邵令江六人，除邵令江一人较晚外，虽均系最初之力社社员，但始终未被选为中央级干事。而胡轨、刘咏尧、袁守谦三人，都在那三人之先的二十一年任过力社的要职。胡任第一届组织处助干——副处长，刘首任南京分社书记，袁在汉口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政治干训班”主任。

其他自二十二年起，至二十七年冬结束止，先后任过力社中央级干、检，及候补者，除首届之胡宗南，因任重要军职，远驻西安，及葛武荣因案并任宁夏省府委员兼教育

厅长，不能来京参加会议，未再连续当选外，余皆连续当选或干事，或检查，一直到最后。其历次再增选之正式与候补者，顺序大致如次：

1.徐培根、蒋坚忍、李士珍、任觉五、李秉中、刘健群、李新俊、赵范生等。

2.梁干乔、刘伯龙、田载龙等。

3.吴兆棠、白瑜、张宗良等。

4.赵龙文、孙伯睿等；李新俊因案叛离，投广西除名。

丙 力社本部助理书记

力社本部历任助书，虽多非由投票选出，再经领袖核定之中央干部，但因其是最近总枢纽书记，助其推动一切工作者，地位亦极重要，兹亦就记忆所及，与先后顺序，叙述如次：

1.侯志明：军校四期粤籍，任滕杰、贺衷寒两期助书。

2.何衡：军校六期黔籍，贺衷寒任内增设。

3.王大中：军校四期浙籍。袁其凝：军校五期川籍。皆刘健群任内助书。

4.邵令江：皖籍，金陵大学。陈光国：南京市，沪江大学。皆鄧悌任内助书。

5.吴兆棠：皖籍，非军校出身，邓文仪任内助书。郑介民接邓文仪代理书记约半年，助书仍旧。

6.俞季虞：鄂籍，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陈介生：川籍

留法，军校五期。皆康任内助书。

陈敦正先生书内所载之顾希平、王受泰、倪文亚、刘广瑛、任觉五、王超凡等六人，任助书均非是。这六人除任觉五曾任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二任书记，倪文亚曾任力社本部组织处助干——副处长约两年外，余均未在力社本部任职。

丁 力社本部历任检查会书记及助书如次

检查会：

是二十二年一月，力社与会员（力社社员一律以两会会员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改选后，因人数增多，组织扩大了，为保持其健全发展，特新创立的。除中央外，各机关与地区视其需要，设立分会。中央均设有书记、助书、检查，机关与地区，也有仅设检查一至三人者。兹述中央检会历任书记、助书、检查与候补者如下。至中央检查会所设之总务、调查、审计三个组人事，及机关与地区之检会人事，因记忆不全，又无资料可考，概从略。

1 第一届书记：

萧赞育，检查：干国勋（间或代理书记）、周复、李士珍、杜心如。助书：杨群（军校五期，海南岛文昌县人，现居台北）。

2 二三两届书记：

均周复，检查：干国勋、李士珍、桂永清、郑介民、黄仲

翔、李秉中。助书皆梁其林，浙籍，非军人，裘轸间或代理助书，亦非军人，浙籍，此二人现皆住台北。

3 四届书记：

田载龙，湘籍，军校一期，检查：干国勋、李士珍、郑介民、李秉中。助书：梁其林。

4 五届代书记：

李秉中，检查：干国勋、周复、李士珍、黄仲翔，周复他调，刘伯龙补。助书：梁其林，裘轸间或代理。

检会职责：

为对干会并接受机关与地区之检会或检查，及力社特务处报告，对其工作之检查纠正，纪律之执行，经费审核，交接监督，新进分子监誓，对领袖负责，有奖赏、惩处——包括开除、监禁、死刑之权。

笔者愿在这里一述两任检会书记周复之为。他赣籍，军校三期毕业，日本明治大学政经专攻科肄业，身材属小型，温文喜怒不形于色，群而不党，对人无好恶，但一遇大是非，则力排非是之众议，坚持不屈，至其是非明白断决而后已，在力社干部群中，实属难得，抗日时任苏鲁边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壮烈成仁，忠贞始终一贯，临书追思，不胜涕泣。其夫人陈景贤女士，亦力社社员，为妇女界第一个由领袖召见，致力妇运者，本年春逝于台北，由袁守谦、萧赞育、滕杰、笔者、梁其林、杨群为之治丧。

戊 力社之地方与机关的书记并干部

兹就记忆所及，按其先后顺序分述如次：

1 南京市分社：

第一任书记刘咏尧，依次为冷欣、黄珍吾、张元良，以刘咏尧先后两次任期为长。而李国俊、乐幹、陈景贤（女）、梁步云、陈九陔等，均先后为其助书，或干事。

2 江苏省分社：

第一任书记韩涵，继任李守维一直到结束止。柯建安、徐直民、顾希平、韩城等，都先后任过助书，或干事。

3 上海市分社：

叶维第一任书记，依次是刘冠世、蔡劲军。娄绍铠、白瑜、孙伯睿、何志浩、胡淳等，或先后任干事、助书。

4 浙江省分社：

郑炳庚首任书记三年余，次为胡维藩。赵龙文、蒋坚忍、龚焕文等，或任其干事与助书。

5 安徽省分社：

李国幹首任书记，次徐中岳任期最长。蔡炳炎、曹敏、汪洪发、何德用等，或为其干事与助书。

6 江西省分社：

第一任书记匡正宇，次为郭礼伯任期甚久。贺醒汉、柯建安、郭庸中、王梦古等，或任干事或任助书。

7 湖北省分社：

首任书记丁炳权，依次滕杰、沈遵晦、干国勋、杨啸伊、张弥川、滕倬、张傲云、简朴、刘公武、郎维汉、宋新民、陈树民、丁文安、刘毅、杨子福、詹学海、程发轫、高启圭、何清铭、王介庵、伍子贤、熊连城、任建鹏、文明昌、彭凤昭、周曼云、贺良忭、石钟灵、江海东、陈洁、叶谟、吕跃、涂少梅、王公遐、罗浩忠、武希良等，或任干事、助书、县及支社书记干事。

8 湖南省分社：

第一任书记贺醒汉，依次萧作霖、李一民、李树森、左曙萍、李人士、周保黎、刘炳黎等，任其干事或助书。

9 山东省分社：

首任及二、三任书记皆秦启荣。继任刘效义、赵公鲁、赵雪峰、王平一、王克乔、梁修乔等，任其干事或助书。

10 河南省分社：

首任书记陈祺，依次萧洒、冯剑飞、胡佛、胡长贻、张德容、李定、袁达三等，任其干事或助书。

11 北平市兼河北省分社：

第一任书记贾毅，依次阮齐、王受泰、邵令江、袁其凝、王大中、陈仙州、王任远、陈苍正、靳汝民、李天策、李荷等，任其干事、助书或天津、保定支社书记、干事、助书。

12 东北特派员：

特派员刘广瑛驻北平市。王天任、高士栋等，任其助

理。

13 山西省分社：

申傲霜（因案处死刑）、梁雪婷、王慎之、乔家才、谷绳武、陈鲁仲、靳易夫、郭澄、杨作之、杨涛或任干事与助书。

14 陕西省分社：

张德容首任书记，依次王超凡、张坤生。吴树勋、马志超、林树恩、周保黎、顾希平、蒋坚忍等，任其干事或助书。

15 四川省分社：

建立于二十三年，首任书记叶维，次为任觉五。雷清尘、王元辉、柏良、毛嘉谟、贺明宣、田劲云等，皆其干事或助书。

16 江宁实验县分社：

颜德桂任书记，邵步墀任助书，干事梁步云等。

17 绥远省特派员：

二十二年夏任张宣泽为特派员，建立组织。

18 中央军校分社：

首任书记刘咏尧，依次为滕杰、邱清泉。桂永清、干国勋、贾毅、王公亮、张坤生、徐直民、田绍汉、岳琴、周安国、王振敦、胡启儒、韩城、顾德钧等，为干事、检查、助书。

19 炮兵学校分社：

书记洪士奇。彭孟缉、吕国桢、彭克定等，任干事助

书。

20 步兵学校直属小组：

小组长娄绍铠。

21 工兵学校直属小组：

小组长黄德馨。

22 中央政治学校分社：

书记叶简修。王受泰、颜德桂、上官业佑、邬绳武、邵步墀等任干事或助书。

23 军需学校直属小组：

小组长曹振鹏。

24 军委会直属小组：

小组长戴颂仪。

25 首都卫戍及宪兵司令部分社：

书记韩文焕。张镇、丁树中、陈世贤、周敬人等任干事或助干。

26 广东特派员：

特派员叶简修，二十二年春末密赴汕头建立组织，未半年为某捕杀。叶粤籍梅县人，军校四期，文武兼资，初任中央政校中校队长，见领袖下野，党国危殆，军校、政校虽性质略有不同，而蒋先生曾手谕张治中、酆悌、陈果夫、陈立夫四人，谓宜一体致力革命建国大业，故力社成立之始，叶即选该校学生中之特优者邵步墀、颜德桂、上官业佑、邬

绳武、王受泰及另一女生(已忘其姓名),先后亲带至南京香铺营,加入革命青年同志会。广东虽汪兆铭等北来,而陈济棠主持军政,犹与中央立异,力社旨在用叶之贤能,制造此革命发源地能与中央一体之环境,以抵抗消灭日帝与赤俄卵翼下之中共两大当前敌人,何期其志业未成,即成为壮烈牺牲之无名忠烈!

27 参谋本部直属小组

小组长尹呈辅。

28 军政部直属小组

小组长李忍涛。

29 其他

南京并各省、市、县之机关与学校的组织,大多系属于当地之分支社,因地区太多,记忆不全,又无资料可查,从略。

惟自南京以至各机关,各省、市、县与学校之组织名称,及其机构并各级负责人与工作人员,自二十二年起,概以“革命青年同志会”名之,前面说过,“复兴社”亦由青会办理,即凡力行社员,必是青会会员,青会会员亦必是复兴社社员。反之,必须经过品性智能考核,及其工作成绩之表现良好者,方能逐级由会议通过提升之。而“三民主义力行社”及“革命青年同志会”两级之名称,则始终保密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继承为止,从未公开。其三民主义力行社与革

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等，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前身，名义固属一贯，至其作为之表现不同的原因……因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赘论也。

七、三民主义力行社之本质与绩效断不容歪曲

昔孔子告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笔者常想：那个以力行三民主义，治乱持危，安内攘外为其近程的国民革命主旨之组织，因蒋先生当时严格要求其一群门生要以无名英雄而绝对秘密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来恢复党的威信，遂被其敌人诬为“法西斯”、“蓝衣社”和“特务组织”；因为从来没有人本其真情实况，负责的、系统的、真实的、客观的，对那些诬蔑予以辩正，遂任那些诬蔑谰言，与所谓亦莫须有的“蓝衣社”，讹传不息，予唯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不革命、假革命的反动势力，对孙中山先生所抱持之三民主义革命建国理想，中途予以重大的损害破坏！虽八年对日抗战，利用了其所获致之绩效，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把自十九世纪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加之于我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但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大业，无容讳言的是因这诬蔑，一再的在国内和国际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即说是失败了，似也非过甚其词。

蒋先生所领导之军校一群毕业生，都是受过孙文主义之严格洗礼的，且曾与一切反三民主义的恶势力，从事了近八年的激烈斗争，故在那时因天灾，日寇入侵，和中共扩大进攻，坚持其革命路线，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乃是极自然之行为，他们以严密的组织，和严厉的纪律，用实干、硬干、快干、苦干行为，自我奉献，力行其是，同时对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采取像在广东时一样严峻的处置。在其组织成立之始，一面全力以军校各期毕业生为主，积极进行大批的各种干部训练，一面遴选优秀人员，积极的派赴各地区和机关建立坚强的组织，概略说来，就是推行下述实行三民主义之四大运动：

甲 新生活运动

从力行社组织成立起，凡其干部及成员，概都举行财产登记，尔后之增减，概视其正常俸给所得为依据，由力行社干事会或检会抽查，作为其品性之鉴定。且由纪律规定：凡贪赃二百元左右者，处徒刑，五百元者，处死刑。故此一运动，虽是其后蒋先生修正了，由胡轨执笔草拟的《新运纲要》，而在南昌市举行之国父扩大纪念周上正式宣布成立新运总会，并在各省县市设立分支会推行，实则早已由力行社扎下了坚固的基础，由其各机关与地区组织策动推行，使举国气象一新，凡奢风、贪风、惰风、欺风、诈风、赌风、淫风以及数千年来封建士大夫等好逸恶劳之风气，再无法存

在。确实做到了该纲要中之——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人人以致知力行为荣，糜费钻营为耻，旨在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为庄敬自强之奋斗，恢复了自鸦片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实为实行民族主义，恢复我固有民族地位之起步。

乙 国民军训运动

这个运动，是针对数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人民一盘散沙状态而发，分学校军训、社会军训两大项，普遍进行，期以此运动，迅速的养成全民，有团结、集会、结社、自卫的性能，当然也含有对抗日本侵略之意，这是由其时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负责办理，贺衷寒、潘佑强、杜心如等，都先后任过处长，各省及院辖市，都设有“国民军训会”，高中以上学校，设上、中、少校级军训教官一至五员不等，县政府设军事科执行，这是一种革命性社会改造运动，期由这个运动，进入到“科学的群众时代”，同时由训政时期之立法院主持起草宪法草案，并由国民政府于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公布，即所谓“五五宪草”。二十四年由内政部成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各省市及行政专员区，设立分所，当即举行代表初选，二十五年再行复选，选出代表七百余人，但东北四省因沦陷，及各边远特别行政区与海外华侨选举，尚未办竣，预备于二十六年，按国父《建国大

纲》第二十四条，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但因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略，因而停止了，故这个运动的中心旨趣，是实行民权主义的起点。抗日胜利后的制宪国民大会通过的现行“宪法”，是以“政协宪草”为蓝本，与“五五宪草”内容大有不同，以环境恶劣，蒋先生特指示，在该宪法后附以于一九五〇年修宪的“临时条款”，始勉为通过了。要而言之，这个运动，是实行民权主义的起步。

丙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这项运动，是由于久远以来，中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所谓“耕读传家”，而从事农耕的人数，恒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故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中英鸦片之战失败后，相当高度工业化了的列强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不断竞相入侵，凡割地、赔款、操纵关税、掠夺各种原料，再以高出其十倍以上之制成品价格向我倾销，使我依赖的农业经济日趋式微，而成为负债累累的次殖民地经济，只有大贫与小贫。在这种经济压迫之下，举凡关系国脉民命的国防、交通、矿产之开发，农产品改良等，均一筹莫展，故自救之道，只有自力更生，而其最现实可靠的途径，只有从广大的农耕地，扶持其众多的农业人力，积极进行农业增产并外销。蒋先生自二十一年夏起，就命原黄埔同学会，拨出公积金三十五万银圆（按自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始，每一会员都

要按月向总会缴纳其所得十分之二为会费)，蒋先生又在其军委会南昌行营，垫出六十五万银元，合共一百万元，创设“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优先配合已肃清之“匪区”，贷款农民返家复耕，其时除耕牛较贵外，其余犁、耙、锄、刀等农具，壹圆余或数角钱，即可制造购得，此种贷款多则十元，少仅三五元，皆属无利息，且多以农获物分期偿还，开民国以来扶助农民之创例。他们受此鼓舞，又不患匪类侵扰，皆能努力生产，四省除豫外，皆属肥沃之区，向有“两湖熟，天下足”之称，至二十二年夏，其农作物之收获，除偿还贷款及自食外，且由政府协助经长江水道与平汉、津浦两铁路，向上海输出。二十二年春，蒋先生除将其奉化“武岭小学”基金拨出一百万外，又由豫、鄂财政特派员李基鸿，与招商局总经理郭外峰，各借出一百万元，合原有基金共四百万元，遂请准财政部，扩充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于南京三山街，以陈果夫先生任董事长，任李基鸿、郭外峰、萧赞育、刘咏尧等为董事，大力对各省农民作小额贷款，并附设合作金库，帮助其增产外销，至二十三年底，豫、鄂、皖、赣共党完全“肃清”，使汉口、九江、大通、芜湖、徐州、蚌埠、浦口等处，屯积待运之农产品山积。在北京政府时代，除修铁路，成立军队，累举外债外，而军阀混战，亦设厘金，增加苛捐杂税，战地辍耕比比皆是，每年须自西贡、泰国、马来亚诸处进口粮食四百万圆以上，到二十三、

四年，国民政府除了偿还外债本息，转向改良扩充人民日用工业机器生产，惟仅棉织品颇有成就，而毛制品还在试验阶段。凡此均是我们欲从发展农业经济，而渐进于工业经济之措施，完成了浙赣、淮南、粤汉等铁路二千公里，碎石公路三万公里，惟日本军阀与中共敌党，深不愿予以时间，而完成民生建设，致导淮、整理黄河、扬子江水利，及大举从国民小学以至大专学校之扩充，皆不免中途而辍，然此项运动皆属民生主义建设之起步。

丁 安内攘外运动

这项运动，是保障上述三个运动遂行之基本，并列为力社最优先之工作，旨在对内“肃清”共党，并消除西南、西北、华北诸省之军阀政客把持割据状态，以力行三民主义之三大运动，争取全民意志统一，归心中央，使那些想拥兵自雄者，深感孤立，难于自存，不得不改头换面，将其税收、军权、政权等，完全交出，听命中央，纵有少数顽固者，如两广之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福建之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最后皆未费大力，或用政治，或用军事，予以解决，西北、华北、川、滇、黔等省，是用政治解决的，除了税收、军令、政令等，实质上统一于国民政府，思想言行统一于进步适合于中国固有的王道民本思想，及现代世界人权思潮外，其原有之主政主军者，大致多任仍其旧，即或有少数变动，亦分别在中央或他省，任以相当之职

位，中央旨在变化其称雄图霸之气质，以为服务人民和国家之思想，仅对极少数甘心叛国者，如“唯物共产党首要汉奸史量才、张敬尧、白逾桓”之辈，处以极刑，绝没有“集中营”，监狱囚犯反较以前减少。关于攘外方面：我们除了绝对不承认伪满，并积极作各种准备外，主要是二分军事、八分政治的战略抗拒其再进一步的入侵，例如《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皆是由于二分军事、八分政治性抗拒的成果。如二十二年长城战时，我们是以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十七军徐廷瑶部为主力，作了坚强的抵抗后，便运用了各种方法，使其酝酿停战，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后方安定，日本和伪满配合之驻平、津、张家口等特务机关，任何威迫利诱分化挑拨，都不能动摇我民心士气归向中央，对他们要所谓华北五省及内蒙脱离中央特殊化阴谋不发生作用。我们的政治抗拒办法是：配合国民党中央华北党务特派员，在军委会北平分会，统一了东北、西北、晋、绥三方面的军事指挥之下，强化平、津、保、张家口、沧县、石家庄之力社组织，并以刘健群率领之五百人华北宣传总队，分散在各地说明中央安内攘外决策，沟通党、政、军、民意志，万众一心，抗拒其阴谋，第二步即以此五百人，分配于东北、西北、晋、绥八个军和一个独立师，设立自军至连之政治训练人员，分驻各地，使党、政、军、民团结合作，推行四大运动，自张敬尧、白逾桓两大汉奸先后在不平、津日军保护之下

伏法后，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樾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虽其后由黄郛与宋哲元，负责之华北政务、军事，日人横蛮，由其政府向我强硬提出：撤销平、津党部，逼迁河北省府至保定，撤换主席于学忠职，然亦只仅能扶持殷汝耕在冀东一隅成立了没有群众基础的伪组织，而其建立的伪保安总队队长张砚田，且暗与宋哲元将军通款，受其节制，百灵庙一战，内蒙各盟旗王公，得傅作义、宋哲元支援而将傀儡德王击败。至是整个华北及内蒙，直至二十六年七月，皆能保持安定，虽张自忠、萧振瀛虚与日本委蛇，而日方特殊化的阴谋，仍胎死腹中。在二十二、二十三年最危险时期，中央华北党务特派员方觉慧先生、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笔者等五人，秘密设立政治作战小组，经常会议，研求对策，指挥行动，报告中枢及军分会何应钦代委员长，使其对华北与内蒙情况，了若指掌，而我们四大运动，除东四省被日伪占据外，其他全国各省县市与特别市，皆得积极推行，为后来抗日战争，植下了有力的基础。

八、三民主义力行社必须及时正名存真

综上所述一连串的史实，应足以证明三民主义力行社

之本质与行为，是与其中心策划推动权力机构之名实完全符合的，幸其创始极重要人，尚有滕杰、邓文仪、萧赞育、黄仲翔、邱开基、葛武棨、蔡劲军、彭孟缉、笔者健在居台，韩文焕在加拿大，而民国二十七年冬之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名继承之，亦系顺理成章之事，岂可置诸不顾，任由其时敌人以“法西斯”、“蓝衣社”、“特务组织”等诬蔑谰言，讹传永世乎！昔孔子以夏、殷之礼，因杞、宋文献不足征，而难叙述其事，今创始诸人犹有部分健在，而继起之中央级干检如蒋坚忍、徐培根、任觉五、张宗良、白瑜、李士珍等，及任地区首要人员如郑炳庚、萧洒、徐中岳、沈遵晦等，亦皆住台北，应该都不忍此一四十余年前之史实，任其没世而名不正焉。

比较令人难免不快的，是曾加入过组织稍迟的外围人士，因当时严格保密，非奉准不令其发生纵横关系，而所有保存于该组织各高级干部及三青团之资料，因大陆仓卒失败，未及带出，致他们无由深入研究，而又似痛惜那段其本人参加过之史事，黯然淹没，致丢掉了其正确名称，与许多真实内容，仅将其后虚设之三级外围“复兴社”与绝无之“蓝衣社”，挂一漏万的连在一起写出，虽然他可能迎合一般不明其真情实质的一些好奇者心理，但却难免影射其有“法西斯”和“特务组织”性之误谬，如四年前徐桂华先生，用“古僧”名编著，博学出版社印行的《戴笠将军与抗

日战争》一书，承他不弃赠送了我两册，并谦虚的嘱为评估，我看过后，仅就其第一节“戴雨衣的时代背景”之“革命英雄的结合”项，指出戴将军工作之大力起步前进，是由于三民主义力行社之建立，并指出书里所写，那个组织创始人有重大的错误近万言复他，承他于今年春再版时予以改正，并将再版之书连同我复他的信影印一字不漏的又寄赠我两册。虽然雨衣将军之忠勤，及其一生对国家之贡献，固右仰皆知，但在力社那个时期，他是推行四大运动的一支奇兵，也就是效忠领袖及力社整个组织，实行三民主义各项建设的一分有效之助力，而赞助国民党能由中央以至地方切切实实的贯彻了其决策，也为国民政府由中央以至地方，能使其政治得以有效实施，这种奇正自应分明，主客必须有别，庶力社这个组织，能承先启后导致国民革命运动三度进入高潮，不令人误会其为特务组织也。

陈敦正先生《动乱的回忆》一书，关于力社部分，他就只在复社范畴内述其回忆，并在标题上将——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连在一起，这可能他只是加入过力社后来设立的第三级外围——复兴社，如前笔者所说：因为严格保密不能发生纵横关系，他没有提到“力社”、“军会”、“青会”等上层的组织情形，并其真实的性质，和各种干部产生之先后程序，及其所任职责之分别与姓名，兼及其六年半以上之各种革命性的工作之繁重与绩效，这自是不应

责怪的。但他这篇写作，足可使现代及将来之不明其史实者，认为就是那个组织的全部概要，而会产生，以极不切其实事之点滴以偏概全误谬。

又其中有一段，显然影射到力社组织有“法西斯”性，如其敌人所诬蔑者然，如他说：“我调到训练处服务，是滕杰先生任干事——等于处长，当时滕俊夫（杰）刚和杜心如等，由欧洲考察德国国社党和意大利黑衫党归来——两者皆系著名法西斯性的党，滕先生穿了一身油绿色的制服，上身是中山装型式结领带，下面是马裤细裤脚，着马靴，精神饱满，非常神气，但事后滕先生看了我的《元霞阁随笔》，对我说：他从来不神气，而是严肃，据滕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制服。”其实那时派往欧洲考察的，不只是滕杰、杜心如、李国俊等那一次，继之还有酆悌、潘佑强、胡轨等的一次，其考察的国家，也不仅是德、意两国，还有英、法、比等国。其考察主要的着眼点，并非德、意两国之法西斯主义和其行使的模式，而是在看看他们之如何能对内肃清共产党，对外能挣脱英、法之束缚，并同时也要看看英、法等国，是怎样应付他们，一方面作为我们安内攘外之参考，同时也要与这些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国家连系，力求我们之抵抗日本与赤俄的夹攻侵略，在国际上不致陷于孤立。

就笔者当时所见，力社重要干部任军职者很多，如军

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先后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潘佑强、杜心如，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桂永清，首都卫戍司令部警务处长韩文焕，“剿匪”别动总队长康泽，国民军事教育组主任赵范生，军事委员会干训班主任孙常钧，政训研究班总队长阮齐，先后任军校政训处长刘咏尧、滕杰、邱清泉，航空学校政训处长蒋坚忍，湖北保安处长丁炳权，安徽保安处长蔡炳炎，旅长徐中岳，河南保安处长冯剑飞，湖南保安处长李树森，南浔师管区司令郭礼伯，第一师长胡宗南，以及其他很多任军职者，皆军校各期毕业生，仅有桂永清、滕杰、邱清泉三人，偶或穿如陈敦正先生所说之颜色军服，其他上述诸人概未穿此等军服，即桂、滕、邱所穿之油绿色军服，亦系中山装式，似未结领带，因是时全国所有将校，皆未尝结领带，即非任军职者，穿中山装及便服者多，而穿西服结领带者绝少，滕杰向以严谨固执称，似不致犯此幼稚病，而标新立异，一趟欧洲考察，便穿上希特勒国社党的制服？

九、特举张学良主持的“四维学会”作证

兹再举一亦笔者亲历其事，说明力社只是力行三民主义，绝非霸道独裁性的法西斯主义。那即是张学良氏于民国二十三年春，由欧考察回国，有感于德国由希特勒领导

之“国社党”，能勃然兴起，内除共党，外抗英、法，作废除《凡尔赛条约》狮吼，他志切雪国耻报父仇，乃向蒋先生建议，认为我们今日要做好安内攘外工作，亦亟需有此性能之组织，但蒋先生拒绝了，即特任其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先生兼任总司令，实际上由张驻汉口总部负责，他指挥的部队达十万，除将其东北军之五十七军何柱国，六十七军王以哲，百零五师刘多荃等部近两万人南调外，余均为中央部队，但他实际上即是这华中要地最高长官。乃再向蒋先生重提原议，并陈明将其原有之东北政治性组织——“护东学会”，完全解散，请蒋先生指派若干人，与他“护东学会”之干部王卓然、王化一、王以哲、何柱国、阎宝航、关吉玉、高崇民、刘多荃、吴瀚涛、黎天才等，合并一起，组成像德国国社党那样性质的组织，拥护蒋先生，安内攘外，重整山河，复兴民族。蒋先生以其志切雪耻报国，未再拒绝，但只允其在中国固有文化领域内，组织了一个名为“四维学会”的组织，并指派刘健群（时任力社书记）、邓文仪、邱开基、戴笠、笔者、丁炳权、赵龙文、郑介民、韩文焕等九人参加，大概是二十三年五月中旬（确期记不清），由张学良主持，在其汉口华商街原武汉银行公会“三省剿匪总部”，开了两天会议，他穿着黄间淡绿色陆军上将制服，略高的壮健身材，精力充沛，以宏亮标准的国语致开会词：首先说明奉领袖命成立此会之意义，以发扬中

国固有明礼、尚义、崇廉、知耻之民族精神，而安内攘外，振作人心，改革风气，复兴民族。随又报告他在欧考察一年，所见德国于失败之后，现在希特勒领导下之国社党重振情形，能使日尔曼人坚固团结，发奋图强，不但肃清了内部共产党，且使英、法畏缩退让，不再逼索巨额赔款，也不再按《凡尔赛条约》干涉其内政，和重建军备，言下之意，有中国似应仿效，以复兴雪耻。讲了约一小时，稍息，即讨论会章，午餐在其总部进食，午后二时，他换穿蓝色长袍布鞋，由王卓然照拂，与我们个别谈话五分至十分钟不等，轻松亲切，四时余续讨论会章，最后予以通过。晚六时我们乘特备小轮渡江，至其武昌徐家棚寓所晚餐，他穿藏青色西服在码头迎接，餐时每桌四菜一汤，皆用特大号蓝花瓷碗盛满，足够一饱，以白开水当酒，他于举杯敬水时致词说：我们今后生活必简朴，示不忘国耻，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四维思想，把耻字摆在最后，自是说，知耻后之，要勇于改过，勇于求知，勇于力行。颇简明扼要，我们心中颇喜，国民党又新增了一位有能力的人才，他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公子哥儿。

次日上午研讨办事规则，及今后活动方法——采秘密方式。在总部便餐，休息两小时，二时半选举理监事及候补者，蒋先生当选会长，张副之，王卓然被选为书记兼理事，黎天才副之兼理事，刘健群、王卓然、邓文仪三人皆常务理

事，对会长、副会长负责，余皆当选理监事或候补者，此后常在汉口开会者为王卓然、邱开基、高崇民、阎宝航、黎天才等，我们各人都在他处有职务，故会后都离去。

这事关系甚大，力社两年苦干，已造成了国民党威信恢复，实行三民主义有好的基础，经力社本部慎重一再研究，据邱开基说：高崇民、阎宝航倾向德式的作法，每次会议发言激烈，似被副会长信任，颇有只在蒋先生一人之下，用“四维学会”，推动安内攘外，复兴民族的诸般工作，这与蒋先生要我们秘密实干，力行三民主义，做无名英雄，以恢复革命精神，并恢复党及其最高干部——中央执监委员——威信相悖谬，如积极参加进行，不但不会有善果，反会违反领袖意志，引起有数十年历史之党内的分裂，并以此意向蒋先生陈明，他亦以为然，但张学良这般热忱，他又不愿使其失望，乃苦心孤诣向党中央进言，使这个在党毫无历史者，被选为中央监委，引导他能在奉行主义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出力报国，任阎宝航为励志社总干事。“四维学会”，以后就无形终止了。这都足以说明三民主义力行社无德式法西斯主义性，后来“西安事变”，多少可能与“四维学会”终止有关。这件事证迄今似尚未为世人所知，其中仅存的人，除张学良本人外，尚有任“国大代表”的邱开基和笔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的邓文仪和吴翰涛等五人，并均住于台北。

十、对于蒋廷黻曾否加入过“复兴社”问题

笔者对这个问题，可以十分肯定的说：蒋廷黻绝未加入过复兴社。我详阅关先生致《传记文学》编者刘绍唐先生的信（见《传记文学》二〇五期），他是全不了解这个组织者，只有依据胡适的话：“蒋廷黻如果未加入国民党，为甚么蒋先生要他回到国民党来呢？”胡公因此怀疑：蒋廷黻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唐德刚教授同样也有此怀疑，然而考据不出来，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结论是：“当事诸公俱已作古，蓝衣社史家们，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蒋氏是否是个社员？可能就永远是民国史上的疑案了。”

他这信，既刊载于甚受一般读者爱好的《传记文学》，又是有关近代史的问题，笔者既确知其事，特郑重说明于下：

先说所谓“蓝衣社”，既绝无其组织，何来“蓝衣社史家”，如要找这个莫须有的史家，只有从中共当时统战部和日本军阀当时驻华特务机关，所捏造编印的谰言档案中去找。

再说“复兴社”——姑用此第三级外围名，当时创始人并任其首届书记，现任“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滕杰先生，尚健在，住在台北市通化街一八六巷二十八

号。其他创始人并该社首届组织处长，现任“立法委员”与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萧赞育先生，亦住台北市内湖区大湖街一六〇巷二七号，其他创始人邓文仪先生、邱开基先生、彭孟缉将军、笔者等，及其后中央级干事蒋坚忍、徐培根、李士珍、黄仲翔（创始人）、张宗良、白瑜、任觉五等，或任“国大代表”，或任“立法委员”，并其他中央级次要干部，与机关地方级首次要干部，及现任“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院长”、“部长”，犹健在居台并海外者，总在五千人以上，何谓俱已作古呢！

关先生又说：“我同廷黻先生，都同时应邀参加过一次复兴社‘通天社’邀请的谈话会。时间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民国二十八年，大约是二、三月……地点：是重庆青年会。邀请人：康泽字兆民，川人，黄埔一期，留俄。被邀请者：蒋廷黻、胡秋原、陈介生（已故“立委”）、齐焌与不吝，其余的就记不清了……。”

查力行社——复兴社，已于二十七年九月，在武昌“三民主义青年团”继承接收而正式结束了，此时只有“三青团”，陈诚任书记长，康泽任组织处长，已没有“复兴社”了，更无“通天社”这怪名称。康泽是四川安岳县人，黄埔军校三期，非一期，关先生所说被邀请的人除陈介生外，余都绝未加入过前述之力行社——青会——复社，这是现犹健在台湾之当时的人，尽人皆知道的事实，笔者认为关

先生全不了解这个组织，而且他可能只模糊的知道康泽这么一个人，事实上，较康泽重要的人，如从二十年九月，就由日本回国，着手起草这组织计划，并被推为其筹备处书记，接着于二十一年三月八日，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正式成立即被选为首任书记的滕杰，现犹健在。年来有许多杂志或书刊都记载过，关先生似乎也未尝看到，虽然那是个民国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一个秘密的组织，写民国近代史者，大多数人也都不知其详。

笔者这篇述作，绝无意与任何人打笔墨官司，只是证明当事人并未“俱已作古”，而愿以当事人之一的资格，本我所知，以真实、客观、毋我之态度，写出来，供作民国近代史者之参考而已。

（原载一九七九年九、十、十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四、五期）

附录一：我所知道的“酆悌免职”

宣介溪

绍唐我兄：

干国勋兄近作《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气概万千，跃然纸上，诚近代极有价值之革命文献也。

惟正如国勋兄所说，历史性的文献，贵在严谨求真。因此，拟就我所知范围，补充一点资料，谅蒙欢迎。

（一）力社干部群

介溪自二十四年十一月，由北方归来，奉领袖亲派为力社干事，直至二十七年结束为止。当时同僚，计有萧赞育、刘健群、贺衷寒、酆悌、邓文仪、干国勋、滕杰、桂永清、潘佑强、杜心如、赵范生、康泽、戴笠、蒋坚忍、李士珍、吴兆棠、张镇等约二十人左右。又：安徽分社，介溪自二十五年春，接徐中岳任书记，亦直至二十七年结束，助书为顾访

白、叶逸凡。

(二) 酆悌之免职

主要谈论陈光国案那次会议，我适在座，酆本未出席，是临时打电话找来的。当时领袖责问他，为何重用陈某？领袖并没有说：“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气氛紧张是有的，但不是因为有“不要性命”的话头，而是因为领袖斥责，酆未认错，反一再起立辩解，引起领袖大怒，才骂：“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于是，戴笠起立报告审讯陈光国情形。领袖指示“严讯”，并无贺君山泣救之事。这次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宣布散会，大家正纷纷离去，领袖也正要离席时，酆赶至领袖面前，说：“报告校长，我到德国的手续，想请校长帮催一催，快一点办。”领袖此时十分慈祥的回答说：“好，我就帮你催。”当时，我深深感觉，领袖对待学生，实严师而兼慈父。

按那时系希特勒当权德国，酆在早些时，已奉派为我驻德大使馆武官，所以酆之去职（派赴德国）是在这次会议之前，不是在这次会议后才决定的。

领袖必不愿见汪之被刺，是识者所共信，且天下事清者自清，以领袖之胸襟气魄，何所惧？何所虑？更何致谈到“性命”问题，只不过他觉得有责任保障良好治安，有责任

使自己直接领导的干部，更健全、更不应犯错而已。

总之，鄆力余(悌)忠贞勇敢而有能力，是革命者典型，绝不是很窝囊而不敢直答：“陈光国是我用的”那一类人。

敬祝

撰安

弟宣介溪上 六八、十、十七

又：我也曾是政训班指导员之一，怎么国勋兄都忘了？华北宣传总队有十大队，每大队有四中队，并闻参考。

(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

附录二：再谈酆悌免职

宣介溪

绍唐我兄：

弟在《传记文学》第二一〇期，所写“酆悌免职”，现在因有新的发现，不得不特为之说明，并申述者：

（一）关于酆悌免职，我所写的固是耳闻目见，亲身参与，所谓第一手资料；但原作者干国勋兄系那个组织自筹备以至结束，皆身历其事者，他所报导的，自然更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参与第一手资料。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是，我们俩所出席的，不是同一次会议。

（二）其实，像“酆悌免职”这一类微枝末节，就整个组织功能历程言，殊无足轻重。

试看以下一个镜头：

一批爱国的军校留日青年学生萧赞育、滕杰、干国勋等三十人，当长江大水、日俄侵逼、粤方内讧、国势十分危急时弃学归国，会同留俄及国内同学，组织护党救国筹备

处，并推滕杰、贺衷寒、康泽等三人，晋见校长蒋公，报告护党救国计划。

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晚七时，蒋公约集筹备处领导人员滕杰、贺衷寒、萧赞育、邓文仪、酆悌、桂永清、葛武荣、蔡劲军、康泽、周复、韩文焕、黄仲翔、邱开基、娄绍铠、干国勋、彭孟缉、戴笠、刘诚之、陈祺等二十余人，至总理陵园下松林中一独院平屋，开座谈会，摒去随从护卫，仅戴笠一人巡回警戒，邓文仪纪录，各员充分报告，至深夜十一时，才报告了七人，在整整四小时中，蒋公入定而耐烦的凝神静听，偶有未听清楚处，亦只发问一二句，唯恐打断对方，五日、六日继续，一连三晚，报告完毕，蒋公结论，座谈成功。

三月七日上午八时，各员齐集南京励志社，蒋公着蓝色长袍，由邓文仪陪同进入，滕杰喊“起立”，随即由蒋公讲解“知难行易”、“真知力行”学说，并出作文题二，任选其一，文白均可，限次晨交卷。

三月八日上午，蒋公当堂批阅作文，下评语，写眉批，打分数，然后带同大家往礼堂总理遗像前，二十余人连同蒋公在内，手牵着手，一面命名曰：“三民主义力行社”，一面行礼宣誓，宣誓人滕杰、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等押右姆指，监誓人蒋中正盖章。

这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八日的一幕。

这一幕导致了甚么后果？对党，对军队政工，对邓小平乱，安定西南、华北危局，西安事变，士气民心，国家统一，都有些甚么影响？它之“新生活”、“国民军训”、“经济建设”、“安内攘外”四大运动，有何绩效？它之广设训练机构，培育有高度革命性的革命青年如“军委会政训研究班”等，于一般训练，有何特殊不同？它为何特具有一种威力和引力？使人既畏之又欲亲之？^①

十三年党之改组，奠定了北伐成功基础，它的六年埋头苦干，曾奠定了抗日胜利之基否？历史当有正确的评估，在

^① 关于力社的威力、引力兹举两例：

例一：一九五一年左右，刘健群兄辞去“立法院长”后数日，觉得一身轻，约我陪同去看秦德纯将军，闲话中谈到“蓝衣社”，秦说：“当时大家对蓝衣社颇有戒心，但如有接近机会，又以接近为荣。”

例二：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军委会有四个参议在昆明：刘震寰、冯占海、高鹏云、宣介溪，我同刘同住在西山一庙中，日夕同游，我进城则冯、高为居停主，给我最亲切愉快的款待，我们简直不是同事而已，而是如兄如弟（高夫人现住台北）。高，曾任四十七军军长，上高之战对抗日建有殊勋，西安事变时，任一〇五师旅长，不久接刘多荃任一〇五师师长，为张汉卿副司令警卫部队，他曾告诉我：“中央军明令讨伐，我们并不怕，所怕的是那个秘密组织，他们硬干、蛮干令人难测。”

例三：二十一年八九月间，政训班开学前，我请刘健群兄签呈委员长特准在三十九军党部工作的顾访白来京入学，未料，引起军长刘和鼎氏的猜忌，深疑他及另一党部常委黄先进兄是那时正风传一时的所谓蓝衣社分子，次年，刘附和“福州人民政府”带领全军正以先锋官姿态由闽北向浙江挺进时，黄先进冒险的向他说：“某某团体早已把你列为团体之友，正在安排介绍加入，现在这样干，真令亲者失望！”刘闻言，坦诚的答道：“这几年，我为中央打多少硬战，牺牲多少生命（十九年在延平、福州打卢兴邦，二十年在宁化打毛泽东），结果，反把我军费扣去一半，我实不平！”原来，那时刘军经费是包办制，十八年入闽时，中央每月给十五万元，到闽后，因护运木材等由财政部逐渐补贴到十一万余元，共计每月可得二十六七万元，二十二年春，或因另有护运单位，财政部取消了前项补贴，黄将此情电我，我在北平立报何敬公，呈委座电刘解决了误会。于是反戈相向，熟路轻车，势如破竹，会同友军，不旬日而削平闽乱，此固军费是一原因，但“力社”的引力，“力社”给人的兴趣，实为主因（按黄先进是我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时团政室主任，我任安徽书记时，合肥支部书记，政大四期毕业，为空军叶逸凡将军同窗至友）。

此不拟多论。

惟：蒋公领导国民革命，凡半个世纪以上，是党的总裁，是国家元首，他所精心导演的，由当时参加人写出的这一段“所谓复兴社”秘密史实，能不为世人珍惜吗？“国史馆”，党史会，能不以故宫博物院获得异宝似的心情，来接受这份贡献吗？尤其，研究历史的人，例如，当代史权威，您，刘绍唐兄，名史学家党史会副主委李云汉弟，能不格外欣赏欢悦吗？

只是，只是当大家激赏高兴之时，却有一个人在旁发呆，那就是我。过去，四十余年来，一直自以为与刘健群兄是“所谓蓝衣社”创始者，^①现在发现，民国二十年春季、夏季数个月，我同健群兄在南昌百花洲、湖心亭，所日日夜夜研拟的复兴革命方案，只不过是与“护党救国筹备处”的先进同志们，在爱党爱国情操上，救党救国方策上，有些不谋而合而已。敬祝

撰祺

弟宣介溪上 六八，十二，十五

（原载一九八〇年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① 关于蓝衣社者，事实上根本无蓝衣社组织。一如于国勋兄在《传记文学》二一〇期第八四页所写者。稍后，如有机缘愿写一“所谓蓝衣社来龙去脉”，以阐明之。

三民主义力行社

千国勋

自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始，即面临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满清政府及其遗孽北洋军阀，并上溯及中国数千年之专制政体。第二是自明代嘉靖年间起即以侵略中国为目标之日本军国主义，并其后之世界各资本帝国主义。第三是自清代康熙年间起也以侵略中国为目标之帝俄，并继起之赤俄。

这三大敌人，即是实行孙文主义，为谋中国及世界全人类幸福生存之障碍。因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从近程以至远程，概括的说，即是以这三大敌人为对象。对第一个敌人之奋斗的计算，似宜从民国纪元前十八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创立时起，因该会明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也，至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三省易帜，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全中华民国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为止，才算达到了目的。对第二个敌人正式展开奋斗，是自民国二十年九月

十八日，日军发动沈阳事变，大举侵占我东北时起，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完全战败，向我及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同时取消了列强在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为止，才算达到了目的。

对第三个敌人的奋斗，应自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宣布清党，并与苏俄断交时，而全面展开“剿匪戡乱”的奋斗时起。

为了消灭第一个敌人，国民党先后以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等组织为中心，主要以广东为基地，团结了全国最进步的志士仁人，经过了数十年的奋斗，始告成功。而对第二与第三个敌人的奋斗，几乎是同时进行，不过在策略上有时分缓急耳。民国十六年春，在我们宣布清党时，日本也在这时派遣山梨大将率领日军登陆我青岛，目的在阻挠我军进入华北继续北伐，同时又命其第七遣外舰队司令少将某前往四川白帝城，向已失败的吴佩孚表示：愿以来福枪十万支，机枪并平射曲射炮等，配以弹药，及现款千万圆，唆使其再起，以四川为基地反抗革命军，但未为吴接受，而迎吴入川之二十军军长杨森，亦不同意，并向中央报告：“吴现是以个人旅游性居川，决不过问政治。”此后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止，日本政府受其军阀集团操纵，为阻挠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而达其侵略目的，迭次制造事件，如十七年五月一日我军攻入济南，日

军也进入济南，突击我军，五月三日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囚禁我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濬，占据济南车站，迫我军退出济南城外二十五华里，及我军绕道渡过黄河，六月二日攻占沧县，并续与沿平汉铁路北进之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等，以北平为目标攻击前进，日本驻北平公使及特务机关，犹图助奉鲁军张作霖、张宗昌抗拒，但张作霖觉大势已去，且虑东北不保，坚拒日人诱胁，于十七年六月二日通电撤兵出关，有“国事悉听国民裁决，冀中华国祚于不自我而斩，共产恶化不自我而兴”之语，十七年六月四日张作霖专车经过京奉、南满铁道交叉点的皇姑屯，即被日军事先预置的炸药炸死，主谋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点燃炸药引线的是奉天独立守备队附东宫大尉，日军企图是想借张作霖之死，引起东北陷于混乱，然后日军以保护其权益为名，大量出动其关东军，占据各要点，制服东北军使其为傀儡，以阻遏国民革命军出关，期于那时便在实质上完全控有我东北。张学良既已确知日方是杀其父主凶，深知非净化东北军内部，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便难于生存，乃于十八年一月十日，把尚控有原第三和第四方面军主张联日的主将杨宇霆与常荫槐两人处死。

但苏俄亦因国民党清党，使其对南中国之“赤化”活动，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也想乘东北军败退，内部陷于困窘时，即以其驻哈尔滨领事馆为总部，密令其驻华北和东北

各共党负责人，开所谓“第三国际宣传大会”，实则此一会议为研讨决定令其中东铁路职工，与远东贸易局职工，商船局职工，以及残存在中国之各地使领馆人员，与其国营各商业机构职工等，从事“赤化”宣传、组织、暴动诸阴谋。经我东北当局派遣军警搜查，捕获了其中东铁路局商务委员斯达基维赤，东北共党执行委员兼贸易局副局长巴力，商务局监察员打拉洛夫三人，当我方搜得其在哈尔滨领事馆的第三国际侵华训令，“赤化”东亚的部署，暴动暗杀计划，及宣传共产主义书刊数万册时，苏俄阴谋“赤化”中国真相完全暴露了，使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一日中东路中俄战争，即在北满爆发，俄方指挥官为布里耶诺，兵力为四个师八万余人枪，配以飞机、坦克、大炮等。中国以张作相为边防总司令，辖四个军团，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两方激战三个月，各有损伤，我旅长韩光第、梁忠甲战死。后经德国调停，中国由蔡运升代表，俄方以西门诺夫斯基为代表，于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在伯力签订停战议定书五条，惟俄国对中国之“赤化”工作，却并未因此而稍戢。

他的方式是再用第三国际名义，从思想策略到金钱武器，积极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心脏地带赣、鄂、皖、湘扩大“叛乱”。民国十九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因反对中央整军编遣，而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阶段，在北平召开所谓“扩大会议”，实行军事叛乱，掀起了讨逆的中

原大战，结果虽冯、阎、汪失败，而共党却乘机在大别山与赣南，建立了赤色的据点多处。二十年秋长江发生了空前的大水灾，湘、鄂、赣、皖四省灾民千万，共产党除派周恩来、张闻天在上海从事全国性的统战外，并在湘、鄂、赣、皖“诱胁”这些灾民，组织为红军及赤卫队（即以刀矛为武器的民兵），分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挺、鲁易、贺龙、孔荷宠、张国焘、徐向前、旷继勋、项英、叶金波、萧克、徐彦刚等率领，在赣南，闽北，皖南，幕阜山，鄂中洪湖，大别山区等处，四出扰乱，中央军虽置主力于江西，分别进击，但敌利用山地，此攻彼逃，并配合其政治统战，从华北以至两广，制造矛盾分化，予中央以牵制，难全力以赴，及日本于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央有北顾之忧时，共产党遂乘机大肆进攻，其在江西者，如前述攻入赣州，威胁吉安、南昌，并南入福建汀州。在幕阜山者，遍扰江西之都昌、武宁、修水、德安、瑞昌、永修，湖北之阳新、大冶、鄂城、咸宁、蒲圻、通城、崇阳、通山，湖南之修水、醴陵、浏阳、平江等县。在鄂中者进出于沔阳、天门、潜江、汉川等县。在大别山者，如前述西攻湖北黄安、麻城、罗田、浠水、广济、黄梅等县，指向黄陂，威胁到平汉铁路交通及汉口，东北出安徽之英山、霍山、金家寨（后改设立煌县），威胁及于合肥，与河南之商城、潢川、罗山等县。至于在所谓中国苏维埃控制之下的敌军数量，据中共代表王明——即陈绍禹，于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在共产国际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报告称：正规红军三十六万，非正规军——即赤卫队民兵——六十五万，总计壹百零壹万，这数字也许有点夸大，因敌军是时尚属地下性质，其番号人数和所在地点，对国内保持绝对秘密，且变动无常，我们很难确知，但在六十万以上，是极可能的。故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处于在日俄两个强大的赤白帝国主义者内外夹攻之中，而内部广东方面，也早已另有党政两方面的组织，反抗中央，并指九一八事变沈阳失陷，应由蒋先生负责。蒋先生鉴于自十九年中原讨逆大战后，而接之以水灾与“匪祸”、日寇相继而来，如党内再自相阉墙，是正中国共产党与日寇覆灭我党国之计，乃表示只要党内同志能团结，共赴国难，他个人随时可以退让，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容纳粤方选出之全部中央委员，并胡汉民先生之愿望，蒋先生乃于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提出辞呈，将所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且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往宁波转回奉化原籍退休。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国府主席为虚职元首，仅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主持典礼，接待外交使节，所有政府重要官吏任命及国家大政决策，均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中正、胡汉民、汪兆铭三人为中政会常委，林森任国民

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蒋、胡均未在京，中央大权由汪精卫独揽，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调十九路军蒋光鼐部驻防京沪，外交部长陈友仁高唱对日作战，财政部长黄汉梁对军政两费支出，倍感困窘，因而南京顿入空虚状态，士气低落，全国心动摇，加之共党与日寇气焰高张，全国有形成混乱之势。最“凶狠”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与张闻天两敌首，以请愿抗日为名，从上海发动暴民数万涌向南京，先至丁家桥中央党部，由秘书长叶楚傖接见，叶开口讲了数语，暴民即高声喊打，气势汹汹，叶即退往后室而去，暴民遂打门窗玻璃，并取下悬于正门之党部横额名牌，掷诸地上，再往鼓楼外交部请愿，部长王正廷头部亦被打伤，续往珍珠桥打中央日报社，所有各该机构少数驻卫警察，均以事出仓促，是而暴民众多，无法抵抗，仅中央日报社职工略与之撕打，因珍珠桥巷道窄狭，暴民多数无法冲进，时尚为“训政时期”，即国民党以党治国时期，共党此举真是对国民党决策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予以致命的一击，使国民党威信丧失，而彼得配合其赣、鄂、皖军事攻击，与日军的侵略，造成全面混乱。在此以前军校一、二、三、四、五期毕业后再留日及在国内的同学近三十人，因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于二十年七月三日，在我吉林省长春县，发动其朝鲜移民，横蛮的侵占我当地农民土地开渠筑坝，引起所谓“万宝山事件”，枪杀我农民并大肆渲染，掀起汉城、

仁川等地韩人集众袭击华人，在韩华侨遭杀害与投海死者千余人，财产损失就仁川一地达数百万元，七月七日华侨逃至威海卫者六百余人，至烟台者千余人，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此一连串事件，皆为沈阳九一八事变之前奏，日人在其国内和国外，大肆宣传说：其由血汗得到在满洲之权益，已处在危险中，即增兵两个师团到朝鲜，高喊消灭东北政权，其侵略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田中义一大陆政策，直如箭在弦上。

因此，军校各期留日学生，曾假东京某华侨餐馆及国民党总支部，两次集会检讨，一致认为日本侵华从我北伐至现阶段，已发展到了最高潮，而国内共党复于大水灾后，日益“猖獗”，其中肄业明治大学的葛武荣、贺衷寒、滕杰、黄绍美、周复，及肄业陆军大学的潘佑强等，皆是过去孙文主义学会的健者，葛武荣且是该会的秘书长，深不忍由我们东征北伐付出无量血汗而得到统一的国家，再蹈比民国元年而后更惨的覆辙，于是滕杰、萧赞育两人先行回国，但南京是时正忙于救灾和“剿匪”工作，似无暇商讨此等护党救国之大计，萧赞育因而回其湖南邵阳原籍探亲，滕杰则往如皋县与其未婚妻陈启坤把晤，南京、如皋本只一日之程，不一周滕乃偕陈启坤同来南京借住在他表兄胡朗如君任职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事试验场。这个试验场面积约两英亩，在鸡鸣寺下，考试院前，场内有若干小块苗圃，种植

了多种农作物幼苗，有溪流从玄武湖穿城而入通过其间，并有若干花木，环境颇属清幽，饮食与胡君夫妇共炊，滕乃着手就中大图书馆及南京各书肆，搜集资料，如中国固有文化，及党部和民众团体组织现况，现在各省及边疆特区人口数字，及其各种农作物、矿物、畜牧，与交通、水利、教育情况，现役及在乡军人人数，兵工生产能力，军事教育情况等，以为其草拟护党救国计划之依据，并由陈启坤协助之。他的基本观念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地大、物博、人众，如有一个有力的组织做中心，从事策划推动，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迈向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之途程前进，则其内忧外患，自不难消除，而达到最后的成功。他旷观全国，当时能思想一致，意志集中，奉行一个主义，又有长久奋斗改革的经验与历史者，只有一个中国国民党，而又有由国民党培育出来的黄埔军校一至六期的文武兼资之革命军干部，所统率的达三十万众的武力，才能担当得了这项重责大任。过去他能以三千之众作主流协同友军统一了两广，又进而以三万之众作主流协同友军统一了全中国，现在就不能以三十万之众协同全国军民，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吗？

滕穷旬日之力，把计划写好，就携往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与任省府民厅视察员的同期好友胡轨商量进行，

哪知胡看后未表同意，滕也未与之辩论。即返回南京，次日再携往丁家桥中央党部，与任军人部秘书的一期曾扩情商量。曾略看一遍，便拍胸脯说：“俊夫（滕号），你这计划，实获我心，应即进行，恢复我们以往的精神，使党国转危为安。”滕说：“扩大哥既赞成，是否由你我出名，邀些意气相投的同学便餐研讨，期集体努力。”曾说：“就这样办，像张本清、康泽、孙常钧等都可邀请，其余的人请你想想，一桌两桌都可以，钱由我出，请柬请你费神缮发。”滕说：“就这样办，地点由弟选定，请哪些人，我想定后，再报告你，届时请你先说明餐叙意义，我再报告计划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进行方法云云。”是时南京物价便宜，十人一桌便餐合菜，连烟酒有伍圆大洋即够，曾扩情是时年近三十，在广州时任第一届黄埔同学会秘书，会长是蒋先生，负实责等于现在执行秘书，北伐前他曾奉派密赴四川做联络工作，在那时任中央党部秘书，是军校同学中任党内重要高职者，故一般对他皆以“扩大哥”称之。

第一次餐会，一桌人，大家对这办法极赞成，相约下次再集会，这次参加的人，每人能介绍一至数人同来，通知仍由滕杰发，惟参加的人，第一必须完全出自心愿同意这种作法，第二须绝对保守秘密，第三限于军校已毕业之同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据了我辽宁省，并北侵吉林，南沿北宁路侵入高山子，东北军退集锦县以南，在北满东北

军完全隔绝孤立，全国人心愤极，对张学良之不抵抗，尤其责难，两广与共产党，除宣传抗日外，对中央表不满，这一情况的发展，更促成了这项护党救国运动之积极进行。我们极知中国是时处于劣势，若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在全国议论纷纭中，会形成混乱，不啻予日寇和共党以有利的机会，但尚不敢报告蒋先生，因他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意我们有此作法，更增其困难也。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团结军校同学，保持黄埔精神，使以往的血汗不致徒流，再进而与全国人民结合，内除祸乱，外抗侵略。当时军校任军职最高者，为第一师长胡宗南，其余任旅、团、营、连、排长及各级政工人员，宪兵团、营、连、排长，江、浙、皖、赣、豫、闽等省的警察干部、中下级党务干部、少许民众团体干部、各铁道护路队干部、各省保安团队干部等。这些人在蒋先生生聚教训之下，其思想和意志是一致的，生活与习惯也相同，他们入社会不深，尚没有染上坏习气，不论其地位如何，是绝对服从蒋先生及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继承、钱大钧等老师的命令，这在当时全中国是唯一坚实而有朝气的力量。第二次聚餐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了，便有两桌人了，贺衷寒也由江西“剿匪”前线回京参加，当推滕杰为筹备处书记，陈启坤为助理，由邓文仪在其所经营之“拔提书店”里，借出三百银圆，作筹备费，租到南京二郎庙街“康济医院”，两间简陋的木屋，作

为联络、开会、办事之用，康泽即住在那里，除买了些旧桌椅凳应用外，没有起伙，买开水泡一大壶茶，自饮自倒，有时也叫些面点或客饭充饥，一碗肉丝面五分钱，一个客饭一角钱上下，滕杰、陈启坤每日都去办事，而经常去的是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孙常钧、娄绍铠、潘佑强、杜心如、葛武荣、易德明、彭孟缉、曾扩情、叶维、韩文焕、骆德荣、邱开基、梁干乔、余洒度、笔者等，并派叶维、娄绍铠去上海，郑炳庚去杭州、李国幹去安庆、秦启荣去济南、萧洒去开封、贾毅去北平、贺醒汉去南昌、丁炳权去武汉、刘广璞为驻北平任东北特派员，他们的任务是在各该地区建立核心组织，时间是从二十年十月到十二月那段期间。在这期间，有个留日学经理的三期同学李一民，声言：“滕杰你们组织小组，我要报告较长，办你们。”这是很严重的事，因为自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央决议分党时，并决定取消“孙文主义学会”，及共党外围“青年军人联合会”，禁止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存在，虽然共党口是心非，仍继续其在国民党内，用党团分化，但国民党为防止共党借口再进行渗透阴谋，自我起绝对不许党内有小组织，而且是在蒋先生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先生代行）及军人部长时，严厉执行这决议，故李一民这项声明，引起了大家的恐惧，虽已事过境迁，汪精卫及粤方委员早有小组织，但中央这项决定，并未取消，如果蒋先生接受了李一民的报告，我们

不但一切努力徒然，更要受到党纪的惩办，于是决定，由滕杰密电在奉化的邓文仪，请其即刻就近婉陈蒋先生，说明我们因鉴于党国处境危殆，为护党救国，不忍革命大业失败，不得已而不能不团结奋斗，请校长鉴察核示。三日后，即得到邓文仪盖火漆复函说：“校长看了电报，并安详的听他口头报告后，仅说：他们经验不够，做得好吗？言外之意，似认为现有此需要，惟耽心做不好，颇为默许云云。”邓文仪是时是朝夕不离蒋先生左右的侍从秘书，他这个复函，给予了我们以鼓励，李一民报告的顾虑没有了，乃更积极进行，并告知李一民他反对是不会生效的，他原也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又见他湖南籍的贺衷寒、孙常钧、萧赞育、杜心如、潘佑强、邓文仪等都在此组织内，乃亦加入，并特别努力。这个时候，我们最注重的是首都南京的巩固，其次为上海、杭州，虽然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有三个师的部队，但必须基层的军警宪与党务人员及民众团体结合，才能反击共产党的渗透，阻遏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制止一切不负责任的失意政客与所谓左倾的文人之放言高论，动摇人心。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是我们的师辈，在那里工作的李国俊、李士珍、陈九陔、乐幹等，与谷正伦将军领导下的宪兵司令部，警保处长韩文焕，宪兵团长张镇，凌光亚，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等，都可以在陈铭枢指挥之下，协助党部、商、学、妇女、工人等人民团体，健全组织，巩固治安，

而军政部、训练总监部、中央军校、步、炮兵学校、中央政校等，皆迅速的，能与我们协同一致，上海与杭州方面，亦因我们有了核心组织，影响及于党政军民各阶层，镇压了不安状态，转浮动为坚定。以过去的经验，我们亟知共产党，是要在制造混乱中求发展，他们此时在京沪地区力量尚脆弱，虽然他的地下组织，正以可观的金钱，运用各种方式，针对大众心理，借抗日为名，使一般人跟着其摇旗呐喊，中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配合他在长江中部的军事攻势，但我们在这地区力量大于他们，因此，我们必须以组织对组织，深入摧毁他的组织，逮捕“匪干”，绝不掉以轻心，轻于对付由他所鼓动的天真群众。因为自民国十四年以来，共产党一向是走迂回曲折路线，蛊惑别人与我们发生矛盾对立斗争，他深藏在后面，从混乱中发展组织。我们的工作经约两月的努力，即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情势逐渐转变，由全民抗日，而转为反共抗日，在我们以组织为中心的军警宪与各阶层的人民结合之下，群众逐渐站在我们的一边，共产党的活动趋于销声匿迹，不负责任的舆论也日渐消沉，代之而起的是龚德柏在南京所办的《救国晚报》。他也是留日归来者，我们有很多人，都以这报的编辑或记者名义活动，但龚并未加入我们组织，他那份晚报在我们有力的支持下，发行所设在新街口，临时用砖石砌成一间矮小的克难房子，每日午后五时报纸一到，就被等待的报贩抢购一空，显然比

那些大型日报，如《中央日报》、《新京日报》、《新民报》等较受人欢迎，因为他标题醒目，言论犀利，极力鼓吹“剿匪”抗日，很合大众的口味，龚大炮的雅号，也就响起来了。接着蒋坚忍，又在上海办了一份《人民周刊》，也是强调工、农、商、学、兵、妇女联合起来“剿匪”抗日，他是由刚在江西任“剿匪”第二宣传大队长辞职来沪，周刊的内容，用激烈的词句，叙述日本军阀自我十五年北伐以来，历次资助中国北洋军阀和满清遗孽，妨碍中国改革统一的经过，现在大举入侵，必欲征服中国变为朝鲜第二，更选举出江西共区，“人民遭受清算斗争，十室九空的惨状，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与日本军阀如出一辙，是以赤俄为后台，与日本军阀桴鼓相应，以灭亡中国为目的”。中国人民之求自由平等的生活，断不可因抗日而忽略了“剿匪”。同时又有黔人刘健群，也是才由江西“剿匪”任何应钦将军的主任秘书，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右侧“大石桥”，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内容大致是说：国民党自完成了北伐之后，逐渐懈怠走了样，组织松弛，党部多衙门化，党的干部也不少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已失去了与大多数人民相结合的国民革命性质，他主张党必须再改造，就其现有的数百万党员中，遴选其有革命性者，组织“蓝衣社”，生活与一般人民打成一片，在未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民生建设前，穿用国产棉质蓝布衣服，以

示与民更始，自力更生，不要再蹈民国元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后的覆辙。他这小册子是对党内不对外的，在那国是日非，众论纷纭，国民党尚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时，他这种议论，算得是勇敢忠言。不过蒋、刘也与龚德柏一样，尚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惟他两人，一出身军校，一与军校学生间有密切的往来关系，他们这三种报刊几乎是同时问世，并与我们的主张多有相合，他们是否意识到京沪甚至于华北华中的情况，由九一八事变后，喧嚣混乱，而渐趋稳定平实，是有一股力量发生了镇压持危的作用，因而他们在众说纷纭与暴民横行之时，便奋起无畏的有此护党救国的呼声，不啻为我们响起了安内攘外的号角，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后，蒋、刘二人皆先后正式加入了，并都被选任为中央级的干部。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下旬，日军积极部署在上海发动侵略，汪兆铭、孙科深感事势危急，两人连袂前往杭州，与蒋先生会晤，敦促他即返南京，共同负责应付危局。蒋先生已知日军侵犯京沪，如箭在弦，军事抵抗势不可免，乃即与他俩相偕晋京，一月二十八日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通过准孙科辞职，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盖在此以前日方要求我取缔京沪一带爱国运动，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横蛮条件，其一便是迫我军退出闸北，虽上海市长吴铁城于一月二十八日下午答复日驻沪领事完全承认了，但日海军驻沪司

令盐泽，还是调日舰多艘进入黄浦江，并命陆战队登陆，作攻击准备，于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十分突袭我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我十九路军当奋起抵抗，次日政府决定迁洛阳，蒋先生亲护送林主席及汪院长到洛，以示对日坚决抵抗之意。回京后，即以八十七王敬久和八十八俞济时两个师，配属炮兵一团，工兵一营编为第五军，任张治中为军长，驰往支援十九路军，日军亦两次增援至四个师团，由白川大将任总司令，与我军从闸北至庙行、浏河之线激战三十四日，彼此均有重大伤亡，至三月一日后，相持对峙于太仓、黄渡之线，成胶着状态。国际舆论皆对日本之肆意侵略行为，多加谴责，日方亦已侵占了我东北尚未消化，而中国又有抵抗到底之意志，且我后方安定，人民劳军助战表现热烈，乃酝酿停战，至五月五日达成不附任何政治条件，而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在沪战缓和期间，我们曾由滕杰、贺衷寒、康泽三人，晋见蒋先生，向他报告我们的动机，并工作经过及未来的打算与决心，他听取之后，对我们能在党国存亡绝续之交，而见危致命，使国家不致陷于混乱，颇为嘉慰，但又说：“你们的经验不够，恐怕做不好？”滕杰说：“只要领袖愿领导我们，我们都愿竭其心力而为之。”蒋先生说：“你们还是呼我校长好了。”滕说：“我们深觉得党国现状必须有一个领袖做重心，然后才能统一意志，使万众一心，成为节制

之师，为实行三民主义，达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作最有效能的奋斗。”他也没有再表示，仅说：“改日再谈。”后来他感觉到，沪战期间，京、沪、杭一带工、农、商、学、妇女等群众，组织慰劳队、运输队、战场工作队、看护队、担架队等，热烈支援前线，而后方秩序，从京沪以至华中华北，完全与九一八事变时表现不同，是否是这个组织发生的作用？如滕杰所报告者。并问邓文仪，现有多少人，从何时开始？邓即据实以陈，他极为欣慰，并命邓转告滕杰，通知全体筹备处负责人，自三月四日晚七时起，全体至中山陵园开谈话会。

于是滕杰即分别往访，口头通知各人四日午后六时到二郎庙筹备处集合，届时分乘各型车数辆，往中山陵园进发，戴笠、滕杰先导，出中山门，过护城河里许即到。那是一栋长方形的砖墙瓦盖平房，独立在中山先生寝陵之下的松林中，这松林是民国十八年中山先生奉安时种植的，约两公尺余高，前有草坪，与房屋成丁字型略大。房屋西端靠墙壁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联语，下设小型写字台，藤质圆靠椅，没有一般用的会议长桌，四周沿墙壁置些大小不等的沙发，及木椅。我们都随意而坐，屋外周围及马路，没有设置一个岗哨，这是当时蒋先生莅临任何集会都少见的。一会蒋先生由邓文仪陪同进入，我们一致起立致敬，他一面点头注视我们而进入坐

位，邓文仪即在他右侧坐在小沙发上，前置长型茶几当记录。滕杰报告了人数，并呈上名册，计到有贺衷寒、桂永清、酆悌、孙常钧、潘佑强、杜心如、萧赞育、邓文仪、葛武荣、蔡劲军、周复、康泽、骆德荣、韩文焕、邱开基、黄仲翔、李一民、滕杰、娄绍铠、彭孟缉、干国勋、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陈系第六期，湖南桃源人，前记未记明，现已查明不误），此外胡宗南、曾扩情、叶维三人均应到，因公出请假，共计二十八人，均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生，一期十人，二期两人，三期七人，四、五、六期各三人，计由留日返国者十四人最多，留俄者五人次之，留德桂永清一人，余皆系在国内任职者。

此时万籁俱寂，只有总理寝陵巍然在上，我们都肃穆的静待蒋先生宣布会议程序，他戴着老花眼镜，拿着名册，注视了我们一遍，便说：“党国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艰危，故特约你们来这里谈谈，就用座谈会好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完全说出来，不限时间。”他神情安详，一改他平时对我们严厉督责的态度，好像淞沪、东北、鄂、赣之间日寇与共党向我们枪炮杀伐之声，并不存在一样，自然的导致了我们从容说话的气氛，虽然他没有规定发言的先后次序，但那时军校毕业生任何集会，总是按期别和年龄就坐发言，那时我们二十八人中，除一期的曾扩情、胡宗南未到外，一期以贺衷寒年较长，他便首先站起来说话了，依次是

孙常钧、潘佑强、杜心如、桂永清、酆悌、萧赞育，从七时余到深夜十一时后，每人说话时间，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以桂永清占的时间最长。他是“九一八”后，从柏林经莫斯科，乘西伯利亚火车到满洲里，转热河、察哈尔、北平而抵南京的，报告其沿途所见及一般舆论，并他的意见，蒋先生及我们大家，都很注意听取，因为这正是我们极想知道的“九一八”变后那些地区的情况。本晚谈话会至此为止，已四个小时，蒋先生除了听不明白偶尔问一两句外，始终是全神贯注静听，不时用蓝铅笔记录，好像极力避免打断别人的话头，最后他说：“没有讲话的人明晚同时间再在这里继续。”我们全体起立，他频频点头由邓文仪陪同离去。最忙的两个人，是邓文仪与戴笠，邓整四个小时手不停笔的记录，戴内外走动，又当护卫兼招待，因为经常跟随蒋先生的其他侍从人员，一个都没有参加，这当然是为的保密，并表示他对这些门生完全信任。次晚仍先在二郎庙集齐前往，这晚有两大壶茶，每人的茶杯都贴了姓名，这是戴笠事先办的。邓文仪最先讲话，因他昨晚当记录，故第一期的人他最后。依次是葛武荣、蔡劲军、周复、康泽。康泽话刚说完，桂永清突然举手站起来要求再发言，大家颇为讶异，因为他昨晚讲了很长的话。蒋先生点头同意，他说：他要当领袖及各位同学之面荐贤，随在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说：“这是刘健群写的，对健党救国有具体的办法，是个人才。”又说：

“他自广东时起，即任何敬之将军的书记秘书，参加东征，北伐，讨逆、剿匪诸役，卓著忠勤，现任何将军同少将主任秘书，虽只是毕业贵阳法政专门学校，但他写的这本健党救国意见书，不是一般非忠党爱国者，所能写得出，故我特向领袖及大家推荐。”说完即将小册子送呈蒋先生。刘虽不是军校毕业，因跟何将军很久，我们之中很多人都熟识，故会场没有人表示异议。次日上午蒋先生召见健群，据健群事后说：蒋先生当时要推荐他任江宁实验县长，他婉辞了，表示如蒋先生需要他，他愿做书记秘书之类的文字献替工作。但蒋先生随即发表他为中央军校同中将政治部主任，旋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同中将处长，这两项任务，在灌注军队革命思想精神教育，向为蒋先生所重视，他以此重任付予刘健群，表示其不循俗套立贤无方之一般！桂荐刘后，接续讲话的是韩文焕、邱开基、骆德荣、李一民、黄仲翔等，本晚座谈会至此结束，时已十一时半。蒋先生仍说：“未讲话的明晚同时仍在此继续。”他在日理万机中，仍然在晚上以这样长的时间、耐心听我们每个人的意见，使我们深为感动，每个人都心怀兴奋，平添了对中国革命前途之光明，有无限的信心，和无限的责任感。第三晚从娄绍铠开始，接着是干国勋、彭孟缉、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戴笠三日来是最忙，办事最多的一个，只有临到他讲话之前才安坐了几分钟。他浓眉大眼，方口，穿着一身土布

浅灰色的中山装，说话谦逊扼要有力，他虽属六期，但年近三十，表现得很成熟的样子。最后是滕杰讲话，因为他是发起兼主要筹备人，隐然是概括三晚来大家的意见总结，并申述他的构想，极引会场注意，他一身整洁的服装，肃然而立，慷慨陈词，声调宏亮。他总结三晚来绝大多数人及他本人的意见，主张对日作战，认为“剿匪”易，而抗日难，因日本必欲征服中国的野心，已完全暴露了，我们如不奋起作战，则人心一失，中国势将陷于混乱，不啻予共党及其他反动派以捣乱的机会，日本现在的陆、海、空军，对我而言，固居优势，但中国地大物博人众，超出日本多倍，战争最后的胜负，是决定于人力和物力，只要有坚强的组织，建立巩固的领导中心，选贤任能，淘汰一切投机不肖分子，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坚持到底，则日本武力财力终有穷时，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在广东以三千之众做中心，由于领袖坚强明智的领导，对内能够协同友军消灭二十倍于我们的叛逆，对外能够抵抗近在咫尺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威胁，今我们有三十万之众做中心，还不能够结合广大的全国人民与友军，内灭共党，外御日寇吗？凡事操之于我则存，屈居被动则败，今日我们只有死里求生，勇往向前，才能使党国转危为安，继续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云云。

滕杰讲完话，大家静候蒋先生批评作结论，他仍安详的检视三晚来他对每个人讲话的要点记录，此时夜深人

静，全室寂然，仅听到屋外松涛风声。他略一沉思，便说：

“三晚来听到你们的讲话，很有志气，也有进步，但不幸自总理逝世后，党国的责任，便落在我的肩上（按本晚是二十一年三月六日，是日上午，四届二中全会后，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选任蒋先生为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七人为委员，他已任中政会常委，现又任军委会委员长，实际上负了党政军的重责），我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对总理及各先烈和国家人民负责。须知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军皆已现代化了，打起仗来，我们在前线的官兵，于他气球指示的空军和炮兵炸射之下，几乎是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完全处于挨打牺牲的地位，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须知我们广大华北平原，和漫长的海岸线，及从上海到四川泸州的长江水道，都是中国精华的所在，完全极有利于日本海、陆、空军及机械化了的部队之活动，你们大家说，我们的地大、物博、人众，须知现代化了的陆、海、空军，活动极迅速，杀伤力极大，他们持的是速战速决策略，我们现在在军事和外交上，一点都没有准备，地大、物博、人众，又有什么用？一旦正式战起，势必是完全被挨打牺牲后退，到了最后退无可退之地，战无可战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即是亡国灭种。”

“自满清入关灭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先有扬州

十日，嘉定三屠，杀戮之惨，亘古少见，以后屡兴文字狱，冀消灭我民族精神文化，制定种种苛法，厚遇满族，虐待汉人，我总理以不忍人之心，本我固有正统文化思想，集中外人文学术思想精华之大成，创立三民主义，以其不忧、不惑、不惧之大智、大仁、大勇，倡导国民革命，与诸先烈志士仁人，艰苦奋斗了二十余年，始恢复中华，建立了民国，但距革命完成时间尚远，故他说：军校既成，继起有人，虽死无遗恨。所以我们今天上对总理先烈及历代祖宗，中对全国人民，下对亿万世之后代，皆负有重责大任，断不可失于不知彼己，掉以轻心不负责任，致负寄托！我们试看日本帝国主义，灭了朝鲜快五十年，他们统治朝鲜之苛虐，较满清对中国，尤有过之，对台湾的中国人，也如对朝鲜人，这是最现实的见证。现在一般人高喊抗日，他们都是别有用心，不负责任的，试看共产党，当日本军侵夺我们沈阳和上海，杀害我们军民，血肉横飞时，他不但未派一兵一枪上前线，还要乘机在江西、湖北、闽北、皖南到处攻击国军，到处在后方捣乱，从上海收买数万暴民，涌向南京首都，捣毁我们党政军赖以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又煽动一些失意好乱成性的文人，官僚政客，为其呐喊助阵，但喊抗日口号最响亮的，却是他们，他们从没有为中国革命流过血汗，投机怕苦怕死，但心存忌妒，如真正与日本打起来，他们绝不会上前线为国牺牲，他们说蒋光鼐、蔡廷锴是民族英雄，

我蒋某畏葸妥协，这除了对我内部挑拨离间外，是怂恿这些曾有功于北伐和讨逆剿匪的将士徒然牺牲，并陷我于进退两难，他再乘机篡夺。试想我如不负责任，不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系之。以我所能完全指挥的三十万之众，孤注一掷，不能做民族英雄吗？须知牺牲个人事小，置总理与先烈艰难缔造的民国，并全国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以致亡国灭种事大。因此，我既确知彼己，绝无侥幸取胜之理，就只有忍辱负重，牺牲个人，保全国脉民命。现在除非日本不顾一切，一意横蛮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不可，那我们才宁为玉碎，竭其所能抵抗拼命，否则只要不附亡国的政治条件，能妥协一天，我们便多一天的准备，少一分的牺牲，所以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你们大家如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未忘总理十三年北上殷殷临别对黄埔的寄望，请从现在起，实干、硬干、快干、苦干，如你们所说，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则多一分准备，便少一分危险，多一分力量，便少一分牺牲，本党的存亡，国家的绝续，在我们能否不忧、不惑、不惧、实干、硬干、快干、苦干。”

蒋先生这篇出自肺腑的精诚谋国结论，其庙谟精断，明若观火，使我们深为感动，当即一致起立，表示完全接受，他再问：有否其他意见？大家齐声说：没有。这“没有”二字含蓄了无比的意志力，因为三晚以来，我们全体与他，

皆是在绝无外力干扰的宁静环境中，各本心意畅所欲言其是，他的结论，只是较我们操心更危，虑患更深，打算更切实，强化了我们护党救国之初衷，必胜必成的信念。时已近深夜十二时，蒋先生说：“明日上午八时，再在黄埔路励志社见面。”其地点在城内该路最南端，前临中山大道，极目是明故宫飞机场，一栋宫殿式的新建筑，四周空旷，东望钟山，巍峨的总理寝陵在焉，密林深处是明太祖朱元璋墓，他是削平那时割据的群雄，消灭了统治欧亚之元蒙，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然亦只是止于英雄的人物，难能与以宇宙之范围，为知识之范围，要发扬光大中国正统思想，博爱为怀之治国平天下的大圣哲人孙中山先生比拟。

三月七日上午八时，我们齐到励志社，滕杰、戴笠已先在，仍然没有一个岗哨，他俩引导我们到东端的一间长方形如教室样的房子，东端顶墙仍置藤靠椅，写字台，上悬总理遗像，下放有约三尺长二尺半宽的黑板一块，白粉笔一筒，其他全是两抽屉木桌及木板凳，一条条的横摆着，邓文仪的记录席桌凳也是一样。滕杰先招呼说：“领袖今天要对你们讲话。”戴笠坐在进门处末排末座，仍然不时外走，照顾安全。原在励志社工作的总干事黄君以下人员，似乎都不见了。一会邓文仪随侍蒋先生进入，滕杰像个教室的值日班长样，喊“立正”，并送呈名册报告了人数，再喊“坐下”。蒋先生将所携来的两本书放下，注视了大家一遍，随转身拿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九个字，从总理的知难行易学说，讲到如何致知力行的哲学，中间选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王阳明等之致知力行，自强不息的事功，说明孙文主义及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一往无前之行为，皆是真知力行的表现，又说：“我们今天要治乱持危，安内攘外，实行三民主义，完成总理未竟的革命建国大业，必须知耻、负责、致知、力行。”附带的批判日本军阀之黩武侵略，是由其历久以来之所谓“武士道”养成，也就是霸道，以往他们多是在藩阀相攻互图兼并的战国状态中，自受欧美炮舰威逼后，而有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统一局面，学了一些欧美新的东西，经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的胜利，国势骤强，好像中国春秋与战国时代的秦国一样，还是重首功，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又说：“唯物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不顾天理与人性的，而主张阶级斗争，运用其所谓‘唯物辩证法’，‘否定、量变、质变’的阴谋法，图赤化世界，实现其唯物的共产帝国主义，他实与三民主义之上顺天理下应人心，用济弱扶倾，厚往薄来，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致中和的方法，以实现世界大同的王道政治思想相背谬，故总理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又严正的与俄共派来的代表越飞声明说：‘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皆不适宜于中国。’在我们清党前后，发现了以俄共为首的第三国际，

完全违背了他当时一再表明了诺言，有很多阴谋证据，比资本帝国主义更狠毒，大力培植变相的汉奸——中国共产党，要消灭本党，消灭中国固有文化，赤化灭亡中华民国，利用我们深厚的物力，广大的人力，作为其赤化世界剥夺全人类自由资本。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任务是：复兴中华民族固有的致知力行精神，实行三民主义的各项建设，以抵抗并消灭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资本帝国主义，和主张阶级斗争不顾天理人性危害社会安宁的唯物共产主义。”他讲解了一小时余之后，便出了两道题目，命我们任择其一，各作国文一篇，文言白话字数不拘，要在明日上午八时再到励志社交卷。他仍由邓文仪陪出。

八日我们遵时往励志社原处，蒋先生随亦由邓文仪陪至，他穿蓝色绸质夹袍，黑皮鞋、便裤、便帽，滕杰报告人数，呈上了我们的作文，他叫我们坐下，戴上老花眼镜，执红铅笔批阅每篇作文，加点改错，打分写评语。桂永清是用蓝铅笔写了八九页十行纸，字大多数出行格，但打了八十五分，评语也好。易德明的改得最多，曾几次问他，其中多句的意义。湖南籍者除邓文仪外，毛笔字都写得很工整，戴笠也用毛笔恭楷的写了三张十行纸，评语分数都不坏。六十分者仅一人，余皆在七十五分至九十分之间。蒋先生谦虚说：“你们看看评语，对不对？”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皆在民国初年，进过私塾，读四书五经，旧梦重温，有趣极了，惟

这次作文考试，既不是私塾时的练习，更非科举时代之府试、乡试、会试、殿试等，争取秀才、举人、进士、状元这些仕进的头衔，而是蒋先生对我们护党救国之意志能力的测验，也可以说是有关中国命运的考试。

二十多篇的作文，他不到两小时便看完了，接着是指定滕杰发由他盖了名章的票选举，说明用无记名投票法，在全体二十八人名单之上，每人圈选三人，多者无效，由滕杰收票，桂永清唱票，贺衷寒监票，邓文仪记票，最高组织名称定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下设书记、常务干事、干事会，另设二级组织：一“革命军人同志会”，二“革命青年同志会”，亦设书记与常干和干事会，其各该会的干部及分处办事的人选，概系根据谈话会时发言内容及态度，作文内容及得分、得票多少等三项汇合的总成绩，由领袖参阅指定之，也是按照国民党章之民主集权制办理的，惟各该组织在领袖之下，以书记负责总其成。计力行社书记为滕杰，常务干事为滕杰、贺衷寒、桂永清、康泽、潘佑强，其余所有参加与应参加者，皆为干事与候补干事，书记处长滕杰兼，总务处长李一民，组织处长萧赞育，宣训处长邓文仪，特务处长桂永清，桂辞职后，由候补干事戴笠兼。革命军人同志会书记潘佑强，总务处长易德明，组织处长杜心如，宣训处长娄绍铠，潘、杜、娄皆兼常务干事。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葛武荣，组织处长干国勋，宣训处长康泽，总务处长刘诚之，

葛、干、康皆兼常务干事。

以上是概记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经过，及其组织内容，并借以说明在那东西两个强邻的赤白帝国主义者，各继续其历史性的对我夹攻之中，蒋介石先生是如何的处变不惊，竭其心力以领导我们，从思想以至行动之庄敬自强的奋斗。不容否认，在那个存亡绝续之交，国民党内亦只有蒋先生凭其智慧，以其所训练并历经过会场和疆场之战斗的生徒为中心，才有这种治乱持危，拨乱反正，创造时代，继续生命的力量。因为有这批无名英雄，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才能恢复国民党的威信，并全党的团结。惟这是成立时，中央方面主要的组织及其干部，至其他附属的卫星组织，并地方组织之各级工作干部，和各机关之组织与工作人员，概从省略，至这记忆也仅是止于是二十一年的第一届。以后至二十七年冬结束，每年春中央干部都须改选，且年有增加扩大，地方亦然。

（原载干国勋著《孙文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

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

千国勋

一九七四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易劳逸（Eastman）氏，得到“亚洲学会”，“现代中国协议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等四个现代问题研究机构之赞助，据其本人说，是由其亲自前往香港、台北、东京三地，各住了一个月上下的时间，亲搜集资料而写成的《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他自己说是“权威之作”。笔者阅悉之后，痛心数十年后蒋介石先生领导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即是接棒孙文主义之发扬光大中国正统思想的革命运动，仍被侮蔑为“法西斯”组织，故愿再一次指出那些莫须有的误谬。

从民国二十一年春到二十七年冬，蒋先生所领导的这个运动，引致了中国革命运动，自孙中山先生倡始以来而进入第三度高潮，使中华民国除东北四省为日本与其傀儡伪满洲国占据了之外，其他各省市并特别行政区，都得到了名

实真确的统一。并经数年的努力，完全根据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由国民政府正式明令公布了“五五宪法草案”，同时也在前一年，成立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举行全国普遍的初选国民大会代表，以遵循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建国大纲第二十四条，将中央统治大权归于国民大会，成立全民政治的民主宪政政府，但因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从芦沟桥向宛平县我军发动攻击，引起全面的抗日战争而停止了。然因为有了那个运动六年的实干、硬干、快干、苦干之成就，使我能坚持八年对日作战，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虽然抗日胜利的因素很多，出力出钱的人遍及全中国，力行社自不宜概人之功以为己功，但若无力社为之前驱，扎下基础，则全国贤能又何资依据以竭其智力，而从事各项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呢？这是事实，不容否认。

以上那段中国革命史上第三度高潮时期，国人皆谓为“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但外人则多依据其时，日本驻华特务机关，与中国共产党两者对这个运动之诬蔑破坏，道听途说的捏造了一些谰言，用中、日、英等文字编成若干书册，说是“法西斯运动”，“蓝衣社运动”，“某人主持的特务运动”，因为其时我国在“两大强敌挟其汉奸”的内外夹攻之下，力社的安内攘外决策适与之针锋相对，而使其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故诬以恶名而极力丑化之。实则

其本质为力行三民主义，故蒋先生特定其名曰“三民主义力行社”，法西斯主义，当时固盛行于意大利和德国希特勒的“国社党”，若就中国而言，则是秦始皇用以建立其君权至上政体的申、韩极权专制之思想，根本与基于中国正统思想的孙文主义绝不相容，我还清楚的记得革命军人同志会员，贵州籍的军校五期杨周熙，写了一本《孙文主义法西斯》的书，送呈力社本部核阅，经干事会决议：禁止其印发，并予警告，送他往星子特训班受训。至“蓝衣社”根本就没有这种组织，只是刘健群在未加入组织之前，所写的其个人对于如何健全国民党之意见，且其旨在如前所说，矫正党部的衙门化和党员的官僚化，绝无法西斯的意义。关于“复兴社”这个名称，是民国二十二年夏，革命青年同志会，假南京三益里任觉五宅开过会后，在其顶层凉台闲谈时，大家以革命军人同志会，奉命撤销，另在力社本部增设了“军事处”，因组织发展得太快，影响各界人民要求加入者多，为了不使他们失望并仍能保密计，康泽提议，增设第三级组织，放宽吸收尺度，才再提出力社干事会通过报请领袖核准的。其实由中央以至各地区之组织，仍然是以革命青年同志会为主体，而兼办复社工作，复社本身并无组织机构，后来加入者人数较多，自然亦难于同力社和青会那两层组织之得以保密了，外间遂以“复兴社”而驰名，实则自始至终，力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推动机构，青会是执

行活动机构，复社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而已。同时复社社员表现良好者，才得升为青会会员，青会会员表现良好者，方得升为力行社社员，但力行社社员须得领袖个别批准，青会会员，则分批呈报领袖批准，复社社员，只青会干事会核准呈报力行社备案即可。至说是某人主持的“特务运动”，那完全是以奇为正，以偏掩全的故意蔑视这个伟大的运动之本质。因为力行的特务处，只是在领袖和书记并干事会等指挥之下的五个工作处之一，根本就没有决策权，只是奉命执行搜集情报处理特殊事务，为帮助力行三民主义各项决策而服务。换言之，他是为力行社推行新生活、国民军训、国民经建、安内攘外之四大运动的一支奇兵，而四大运动，才是国民革命在那个阶段，实行三民主义之正兵——且用兵字以形容其奋斗性。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力行社特务处工作之性质，谨将特务处成立之经过，及蒋先生在全体干部会会报时，说明该处为何设立及其工作性质一段谈话如下：

在力行社正式成立数日后，蒋先生虽于以前为我们讲解了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并命题考试了我们的思想和智能，但仍恐我们经验不够，不知彼此，行动错误，特请了一名德籍顾问——因德人是时已战败，在中国无特权，与我同处于被共产党渗透，及列强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地位，能以平等待我，故请他为我们全体二十余人，讲了一个月时间的情报知识，地点是黄埔路军校左前方的炮标一处特设的教

室，由桂永清任班长。结业后，蒋先生于某晚会报完毕时说：“中国长久以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大致说来，惟贵族及士大夫阶层人物的子弟，有充分的受教育机会，其余绝大多数的农、工、商人、妇女，能受教育者，十不得一，故文盲占百分之八九十，亦即这些绝大多数人，只知耕田、做工、行商治家以维持生活，而视纳税服役服劳役为其应尽的义务，形成一种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往往因无知识，不能辨是非，而被一些官僚政客、军阀邪教等野心家的利用，以逞其自私自利的企图。我总理建立了民国，要全民做主人，讲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其他如何选贤与能，做个民国主人的道理，做个民国公民应具备的知识，何止千万言语，但均未能发生理想的效用，故自民国建立以来，各省县市的人民，往往多是被军阀、官僚、市侩、豪劣等利用，以争权夺利，阻碍国家的改革，不能走上民主富强现代化之途，他深感痛心，故他在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特订建国大纲，分建国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是训政时期，即我们党要负起训练全国人民行使民权做主人的一切知识，誓行革命主义，能辨别是非善恶，从县为自治单位做起，以及于中央，能行使选举和罢免官吏之权，及创制和复决法律之权，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准则的革命民权，根本上革除数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视其他一般农、工、商、妇女和奴仆的农业社会状态，使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工商人妇女，

皆有受教育的机会，获致能自治作国家主人的知识能力，不再被一切封建遗毒军阀官僚政客等旧的恶势力所操纵利用，然后才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全民民主政治。但中国有句谚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训练全民行使民权，必须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着手，但现值共产党与日本军阀，都勾结我们内部一切反三民主义的腐恶反动分子，积极的捣乱破坏，不能容许我们有时间，从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方面，使人人成为能知书识理，辨别是非的公民，从容办好训政工作。故在这多数人民知识仍然低落，我们鉴于已往覆辙，必须一方面训练些忠党爱国人员，深入社会各阶层及敌人内部，做好调查工作（特务工作），使党和政府一切措施能明是非而善善恶恶，不容许那些反动分子再利用无知的善良人民作工具捣乱，破坏革命。同时更要积极注重教育普及扫除文盲，提高全民知识，双管齐下，以安内而攘外，做好训政工作。”说完之后，他即指定桂永清为力社的特务处长，戴笠副之。桂永清任职一周之后，因他兼任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主任，那个班系调自各部队的尉级军官一千六百余员，聘有德籍顾问数人，以巴德上校为团长，目的在用德式的现代军事教育，训练这批干部，改造我们军队的战技，为抗日战斗作准备，时笔者亦奉领袖命任该班训育主任，班附王公亮，大队长张坤生、岳琴、王振毅、周振强等皆军校一期，亦力社社员，可说是力社设立的

第一个改造部队的训练机构，流行到现在的“大哉中华，代出贤能……”之领袖歌，就是该班所作的，桂永清以该班责任重大，难能兼顾特务处工作，特向干事会陈明任其一职，干事会拟准桂辞特务处处长，乃由书记滕杰向领袖陈明其情由，蒋先生说：“我看戴笠有调查天才，你们试用看看。”滕说：“那就由戴笠接任处长好了。”蒋先生说：“由你们试用看看吧。”查戴笠自民国十九年起，就以总司令部侍从副官名义，月支经费壹千元，任华北调查工作，忠勤节俭，工作深入切实，力社即正式通过他任特务处长后，他便日夜辛勤负责，其所得情报，皆确实客观深入可靠，对力社各项工作推行帮助很大，故他的经费由千元扩充三千元、五千元，并核准其办特训班，再拨给三万元经费，统一全国特工指挥，在全国暨东北择要地设立工作站。

以上皆力社特务处成立之经过及其原因。然亦在此同时前后，蒋先生除促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杭州增设英士大学，上海增设交通大学，南京改中央政治学校为政治大学，在安徽增设安徽大学，以及南昌的中正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并西安的西北大学等外，又在各省县市，视人口多寡，大量的增设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国民小学等。又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设置专款，令各部队政训处人员，就其驻地协同地方党部政府，办理民众夜校，利用祠堂庙宇道观作校舍，课本及一切用具，皆由公家供给，遍及全国各市镇及穷

乡僻壤，就学者皆各行业成年之男女，旨在大力消灭文盲，并灌输三民主义思想之公民常识。此外更在各地办理各种短期训练班，如庐山党政训练团，豫、鄂、皖、赣四省团干班，军委会政训研究班，干部训练班，童军训练班，内政部县政人员讲习所，以及增设其他各军警宪学校训练班等，其在教育训练方面所用之人力物力，实千万倍于在特务调查方面所用之人力和物力，何能说三民主义力行社所推行之民族复兴运动，就是特务运动乎！这真是反奇为正、反客为主的一种抹煞事实之谰言，予蒋先生其时忍辱负重，治乱持危，在训政时期，致力安内攘外继续革命建国大业的厚诬。且蒋先生之大力倡行中国正统思想的普及国民教育，不仅在训政的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为然，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时止，莫不皆然，其事证俱在，无待赘述了。

昔孟子有言：“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因为是时日帝与共党诬蔑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四大运动，为“法西斯运动”、“蓝衣社运动”、“特务运动”，故笔者以一个亲历其事之终始者，尝愿在其未就木之前，本真实客观毋我之态度，一述其实情，庶不致此一为蒋先生领导之伟大运动之真情实况，任其混淆不清，讹传不息。

（原载于国勋著《孙文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

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

魏大铭

一、前言

世人对戴先生的批评，有誉亦有毁。但其勋名之盛，声势之威，妇孺皆知，实非易事。究其实，生逢其时，先有革命领袖之蒋委员长，然后才有雨农先生之作为和勋业，惟此项历史有关之人物，不尽为稗官之传奇，宜纪其事功予以评述，庶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而免于偏颇也。

况且事关历史成败，观察不易，尤难下论断，如资证渐多，自可更为明白准确，虽各家立论不同，当必各有所据而各有所见。犹如站在地上，见为平面；站在太空，见为弧形；站在星际，见为球形，亦各有所据而各有所见也。

还有一种为心理感受的见知，最为普遍，按我于民国十一年任职于崇明长波无线电台，有甚为高大之天线竖立东门郊外，某日傍晚，农家三四人过路闲谈，一人指着天线

说无线电真是奇怪，有线电还是一根电线通过去，这个无线，怎能通呢？我们同仁耳闻此高论，就讥笑他们说，其实有线电，他亦何曾懂得？而我们准专家自以为才懂得。但几年之后，新理论一出，连传播媒介之以太，亦只是物理学上的假定物而已。故农夫之习久以为知，我们准专家以假定以为知，各知其所知，并存可也。不过思想越自由，越有价值，是为人类之瑰宝。

戴雨农先生者，当世之英雄也，殉职后卅年，同志中感怀伤时，始渐多披露其事迹者，其中以唐良雄、乔家才两先生之私人著作及官方之《戴雨农先生全集》三者为佳，唐立论持平公允，乔写真人实事，《全集》则以官方之资料为尚，各有千秋，都足以激励浇末，有裨世道而振人心。我则从各种成败得失角度中去察看，从现代世界立国之道去衡估，尚另有所见。

二、戴先生究为如何人物

吾友袁豁度（雍）先生尝询问我：“戴雨农先生究竟成功耶失败耶？”我则答称：“蒋委员长成功，他亦成功，蒋委员长失败，他亦失败，他只是听命执行。”他是忠贞为领袖，侠义为朋友，能识人，能用人。其灵巧机警，奋勇毅力，又超越常人，所以治事必奏功效，能人之所不能。益以革命

救国为号召，更能吸引热血志士去冒险犯难为国家做无名英雄，领导得轰轰烈烈。妙是妙在他直截了当的说：“想要做官的不要来。来革命只有牺牲。”杭州特务训练，基本上即是说服人去为特务牺牲奋斗，服从组织领导。

当时赵龙文先生（代戴先生主持训练）能说善道，凡与接谈者使人觉得道理充足，有条不紊，合情合理，不由得点头称是，不过娓娓道来，总觉得其胸中尚有丘壑，似未尽相告，其实他并未故藏。但凡与戴先生接谈，就使人觉得其肝胆相照，热血豪爽，肺腑之言，倾心相告，似乎他胸中坦诚，无所保留，当然感人动人，心悦诚服，其实他胸中秘密一点都没有漏出来，这可见戴先生有更大的笼罩吸引力。而凡为领袖群伦之人物，都有此种吸引力。故即使没有政府做背景后盾，他亦能凭一己之能，可以组织帮会力量来为蒋委员长所驱策，盖他非为猎官而为心中敬仰的领袖效忠，其主辱臣死之义，在赴难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最明白。因为他有过人的胆识精神，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于是能纵横天下，万人侧目。

在抗战前，则维护领袖，保卫政权，有过人突出之作为；抗战时，则从事陷区情报及行动制裁与后方安定工作，又为他人之所弗及，于是风云际会，扶摇直上，不但妇孺皆知且亦有声于世了。

三、中国式特种工作的创立

当民国廿一年力行社之成立，黄埔同学拥戴蒋委员长为革命团体的领袖，戴先生以原来总司令部密查组之基础，于四月一日受命为力行社之特务处长，乃是大家对蒋委员长的个人服从。戴先生受命之初，委员长嘱其可看看《水浒传》。这确是一个绝妙指点，盖梁山泊好汉在忠义堂聚义，一切活动即是情报与行动，按史书记载明代东厂、西厂，小说描写清初血滴子活动，均已无实录可查。惟春秋时的《孙子》第十三篇《用间篇》，和民初北洋政府暗杀宋教仁、陈英士及孙总理自广州派遣某君携款赴沪运动北方军阀等案，则信而有征。故蒋委员长之指示，确切于事实，资料亦丰富，实在没有其他书籍与陈规可循。凭戴先生的机智，自出心裁，摸索进行，他拟定若干条款的特务处规程呈准了蒋委员长。其中有一条是规定凡贪污五百元以上者枪毙，确曾枪毙过一个人，他亦时常用来作为警戒部下的。

此外他从训练着手来塑造中国特种工作的型态。同时他着眼于警察的配合，故四月成立特务处，六月即办南京特务训练班（在洪公祠），两期后，于十月派充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来办甲、乙、丙及无线电等四个训练班，有留俄之特工技术专家如余乐醒、叶道信、谢力公诸先生教爆破、伪造、化装、照相、素描人像、密码、交通方法多种

破坏术及毒剂、昏迷剂、造谣、挑拨等等科目，盖苏俄特工为世界先进也。我则于廿二年三月去办无线电班，于是主要的特务技术均有一流人才为助，进展迅速，已甚具现代化的规模了。

又于廿一年夏某晚，戴先生约集了赵龙文等重要干部三五人（赵负责杭州特务训练，另可能是郑介民、梁干乔等留俄干部，我已记不起了），我亦适逢其会，与共党特务头子顾顺章会谈讨论问题，顾为中央调查科所捕获而投诚者，奉蒋委员长交下运用，他们是讨论苏俄特工的组织与运用之道。顾能言善道，结论为一手持刀、一手持钱之两钳运用方法，其时戴先生正用心研究特务处之组织原则及运用方针。

廿三年七月，戴先生兼南昌行营调查课时，参加纪念周，蒋委员长讲推行新生活运动，并阐释“情理法”为处事运用之方针。戴先生深为悦服，不久来杭，即举行扩大纪念周（各特训班、警官学校及省会警察局等），转述蒋委员长之讲辞，再加发挥，持为准绳。以我看来，其主持军统局是终始依此方针，遵行勿替，两柄之道，虽与苏俄无异，但必先衡之于情于理，最后乃衡之于法，所谓仁至义尽，不违人性也。故同志们对戴先生无所怨怼，这是很重要很突出的，总比苏俄之残酷无情，美国的金钱万能要高明得多了。尤其在特务处成立初期，志同道合的道义结纳，是很明显

的，多少有些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游侠精神，这亦是为外国人所不明和不及的。照理论，这应是法家行径，但基本上不脱儒家观念。

四、在不同阶段中适应时宜不断前进

戴先生早期用人，不脱结纳江湖好汉方式，不论三教九流，凡有一技之长，一艺可取，能资为用者，均可罗致效命，如上海市面上响叮当之嵯县帮绑匪，就是去物色不怕死的枪手所在。我于民国廿十二年办无线电训练班及无线电制造所，常常因公到上海，戴先生嘱咐我在上海可用亿太汽车行（在浙江路的四马路口附近）老板郭炳奎的车子，他这个车行有几辆黑牌车子（自备车），开车稳，小有派头，谅与戴先生有私交关系，我亦从不询问，当为江湖中人，此乃可靠而保密的交通工具，工作上的必需品。我曾用他的车子，在法租界用小收报机去找寻（XH7A）桂系驻沪秘密电台，停在附近侦听时，有安南巡捕从车后面来，郭炳奎即通知我，开走了回避他。

又武汉军狱中有一死囚，有盗窃特长（世俗过誉，称为飞檐走壁之能者），亦设法保释收用。凡此种种人物，往往送交乙训班受几个月训，加以部勒，将为害社会之人物，可变为为国效命之好汉，这亦是戴先生独特之处。我尝称特

务工作者，以毒攻毒之法也，亦为安定地方治安所必需，似乎蒋委员长的需要上，要超过中央调查科的偏重知识阶级的特务工作了。不过以我所知，陈立夫、徐恩曾两先生所领导的中统，对共产党之斗争，实超过军统。迨民国廿五年戴先生赴难西安之特出表现，乃奠定了他的声誉，以后即扶摇直上了。

抗战后的事业局面更广，接触外界人才更多，谅他自知读书不够，故甚能虚心求进，于民国卅一、二年间在重庆，似曾聘请过饱学之士（似为江山同乡毛子水先生）当老师，教《论语》、《孟子》等四书，同时与上流社会有名人士如章士钊、贝祖诒、顾翊群等来往亦密，已非交鸡鸣狗盗的时期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册年谱中称，民国卅二年二月十八日在重庆一篇讲辞中，引《大学》及《孟子》书中语句，实比以前进步，可为明证，亦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必要修炼，可见在其不同阶段中能适应时宜而不断进步，亦所以一个特工首脑做了十四年之久，实属难能可贵，绝非偶然！

五、特务处与军统局

戴先生主持特务处时代，纪律严保密强，最有力量，其组织有似西德加伦将军组织之有威势。其后主持军统时代，人多事杂，已半公开，功力已逊，其组织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之有权势。不过，特务工作者越秘密，力量越大，一个国家看不见的力量越大，则越强盛，今日之苏俄特工是也。

特务处开始在徐府巷，我没有到过，甲室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乃是兼对外联络处，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民国廿四年成立通讯科，我就在鸡鹅巷办公的。其时是一户住家，戴老太太及戴太太都住在此。大铁门进来靠边是一排偏屋为警卫人员、总务兼出纳张袞甫先生及交通股胡子萍先生，正屋是戴先生会客办公，另一无门户的敞间为汽车间兼饭厅，平常吃饭总有二圆桌人，戴老太太亦一淘吃饭，一个大家庭样子，一无官气。对面的民房亦租用来安置警卫，可以监视过往人等及附近的动态。这些人并非了不起的人才，只是忠实勤奋忙碌不停，一个人可抵二三个人的用处，一天廿四小时，时时都在警备状态，用人用到如此有效，亦就不寻常了。

后来特务处搬到曹都巷，不知原来是什么大院宅或公家机构，老房子好几进，地方甚大，四周围墙甚高，门禁森严，一切出入都有警卫登记查验，所有工作人员都经戴先生考核慎选，当然非亲即故，来历清楚。又有监察制度，确是纪律好，工作认真，年轻人大都无家室之累，住在办公处所，工作不分昼夜，总在十小时以上，一切讲秘密讲实效，无官腔，无虚文。廿余年后我有机会访西德加伦将军于其慕尼黑郊区总部内，深感其神秘、严密、认真、有效之情

景，恍如曹都巷一般。

其次是杭州特训班，计甲种训练班为各外勤组织各区站长及主要人员训练，乙训班为警卫、交通、行政等人员训练，丙训班为女性工作人员训练及无线电班等四班，每班一二十人至四五十人不等，以浙省警官学校作对外掩护，其训练以精神与技术并重，政治指导员每班一人，都是复兴社分子，深具权威，要求学员思想纯正，严守纪律，与秘密言行，都很认真，其他术课都有实物即教即用，整个训练生气蓬勃，保密周到，为充实与发展各地外勤力量，以此为基地，以遂行戴先生之特务作为。大概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礼教观念，丙训班的女性工作成效不彰，其他的都很成功。

此南京与杭州二环健全后，于是全国军政重心之通都大邑乃满布区站组之组织活动，掌握全国重大事件之动态，为领袖作耳目。

我于民国廿二年三月到杭州办无线电训练班及九月办无线电制造所，在整个训练环境里，很觉到实事求是，说做就做，生气蓬勃，精神旺盛，是很革命的。我们一期训练，作了一个总报告，竟被评为各班之冠，足见只凭事功成绩，不讲关系亲疏，一有公道，人心自会悦服，人才亦就会多起来，功效亦显著了。

一个团体首重纪律，乃部勒英雄好汉之规范，作有效之任使，特务处的纪律是很严明的。按奉蒋委员长批准的特

务处规章若干条内，有一条为凡贪污五百元以上者枪毙，特务处成立的第一年（民国廿一年），曾有一位同志犯了，即予枪毙，戴先生称之为“殉法”，对遗族同样抚恤照顾，大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情景。因为初创时的同志，大家都是好朋友，道义相结纳，罪不及妻孥，同样保护照顾，这是高尚的情操。我还记得其时司法股长余铎先生，乃一恂恂文雅儒者模样，宅心仁厚的长者，为戴先生之幕僚。他亦能收服一般桀骜不驯的各色人等而使其惟命是从，真是一种本领。我研究起来，戴先生除了江湖侠义之外，他还深通世故，熟悉人情，故摸透各种人的心理，其智巧才能，又高人一筹，所谓孙猴王逃不出如来手掌是也。所以他兼具机关首长、帮会首领、家族家长各种统御性质，因之大家都习称为“戴老板”了。

如此精简的机构与精选的人员，形成一种不畏难、不怕死、不要钱（注：后来重庆时期的军统局掌握了交通检查、缉私货运等事，其操守就大不如前了。又毛人凤先生当主秘，暗中还摸上八圈，革命精神亦差次了）的无形大力量，显见特别有声有色而有效，亦即是宋岳武穆所称的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的治国中兴精神，我认为这是军统力量最高时代，真是英华内敛蓄力蕴藏，一遇艰难，拼命突破，其力量实难测其极致。因为“不要钱”是一种无形大力量，实为革命精神之基础，这是德性的发扬，要比“不怕死”更为不易，亦更具无比的力量，是无法测知的。

迨民国廿六年“七七”抗战后，正式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已成为半公开状态，各地招生训练，一个训练班几百人之多，已渐失秘密工作之精神与原旨，以多为胜，以大为雄，扩张势力，派头要大，其质已远不如抗战前之秘密时代，虚名超过实质，精神则已走下坡。一个特务机构的力量都已表面化，则就已衰竭，成强弩之末了。一个特务机构，机关化，官僚气，则就不免先求交卷交差，次而讲求事功了。尤其扩充各式各种游击武力，全无经费，都是就地筹饷，保民不足，扰民有余，而戴先生常常夸称十万之众，但军政部、军令部均终始无视于此项武力，对军统局而言，实为负数。至于掌握若干有利之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运输监察处、交通检查站等，只有诱引同志，导向权势利益之特权观念，岂能与特务处时代之精神相提并论。凡是已出了名的力量，已为大家所看到的，那是已经有限度，亦不过如此了，哪能比看不到的力量，才显得其力不可测。老子曰：“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岂非即是不知善之为善，斯为善已么！

迄至民国卅二年中美合作所签约成立，戴先生设重庆训练班，用的都是美国装备，在当时我们政府处在美援欠缺之时，确是十分神气，刮目相看，请委员长检阅时，戴先生亦穿上戎装，挂中将领章，英姿勃勃，气概万千，平时他甚少照相，此次却照了，且悬挂室内，谅必甚为得意。但我直觉到革命精神为的是陆军中将，则正是他的国家情报事

业(伟大的事业)没落之征。况且这个中将领章是戴先生自封自挂的(殉职后,政府才追赠中将),他竟扬弃无名英雄的崇高精神,未免近于自渎、自贬、自穷矣。

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世界里,美国战略局邓诺万将军,中央情报局杜勒斯局长,和西德情报局加伦将军,均有很高成就与盛名,我均见过面,谈过话,确实不凡。以我国戴雨农将军的才智及权威来比,均有很高成就与盛名,我均见过面,谈过话,确实不凡。以我国戴雨农将军的才智及权威来比,均不亚于他们,似乎只有杜勒斯局长文质彬彬,格局大些,邓、加、戴三人则均属军人型,精神饱满,眼神充足,都善于行动工作(operation)。特务处之精神及保密,有似西德加伦将军组织之严肃与神秘,军统局之格调有些像美国杜勒斯之中央情报局之半公开而有权威(中央情报局于尼克森水门事件后,一落千丈,竟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邓诺万于战争胜利后功成身退,杜勒斯因猪罗湾古巴事件失败而引退,加伦以俄谍渗透西德总理府而去职,戴先生则始终在位,直到殉难,各有遭遇之不同,但都非集权独裁政制下之产物,则相同(美国人认为我们是集权独裁政制,是错的)。

我的经验,秘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机关化只是空架子,所以我认为军统局不如特务处。这个论点,许多人不一定会理解,我现在举美、苏两国的实例可作证明。回溯

一九五九年苏首赫鲁雪夫访美总统艾森豪时，大胆地、盛气凌人地表示苏俄特务的优越性和轻蔑美国的情报工作。还说要埋葬你。当然先有打下美国U2间谍飞机之记录，不久之后，又有二名国家安全局的破密人员竟投奔苏俄去了。故赫酋的声势好凶，不过当时的中央情报局（CIA）在杜勒斯局长的治绩下，对于美国声威未损分毫。直到十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总统倡导和解（Detente），先懈其敌气之志，复于一九七四年造成水门事件丑闻，牵涉及中央情报局之违法，被国会责难与调查，弄得继任总统福特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亦下令组织以副总统为首的八人调查团，结果CIA大受限制，大受打击，大损秘密（详《无形战争》第十三篇第一章第六节G目IV项），这简直就是帮助敌人的力量，来超越过自己，来称霸世界，到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军方已发出呼声，诉称苏俄武力已超过美国，事实亦证明苏俄已插手非洲Angola及Ethiopia的军事干预，美国竟无力作有效的对抗。到今一九八〇年中，苏俄海军已进入地中海、印度洋，并使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美国当然大起恐慌，而更无力对抗伊朗之劫持美大使馆的大批人质，和苏俄进军阿富汗的侵略。所以国势之盛衰，就在这个看不见的力量为枢纽。美、苏即是一个现成的实例。

六、“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

当特务处成立，遵循力行社的拥护领袖之旨十分彻底，是无条件的服从。其时在民国廿年“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尚未通行领袖之尊称，力行社的团体活动时始秘密制定领袖之名号及其尊严于小组会议中，凡提及领袖必立正致敬。倡行一二年后，社会各阶层亦接受推行，始通行全国，盖所以团结全国人民，听命于领袖，为救亡图存革命救国之一捷径。民国廿五年西安事变时，戴先生赴难一事，最足以证明维护领袖赤胆之忠忱。民国卅年“四一”纪念大会上，挂上一副他自撰的得意对联：“秉承领袖意志 体念领袖苦心”，并详加解释。其上联秉承领袖意志去做，还容易懂；其下联，要怎么体念领袖苦心呢？大有文章，那是说要再进一步，凡革命事业，领袖如有苦衷的地方，你须得体会出来，但是事情还得要去做，做得技巧漂亮，不使领袖为难。譬如说韩复榘案子，那是秉承领袖意旨；林世良案子（编者案：请参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一期《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那是体念领袖苦心；看管张学良一事，那更复杂，两者兼用了。此中政治的利害，道义的伸张，个人的恩怨，大众的舆论，革命的精神，国家的纲纪，蒋委员长是不便说的，亦不会说的，甚至亦不会暗示的，你得须面面俱到，扣准分寸，处理妥贴，实非易事。戴先生则潜心于

此，深得个中三昧，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者，确有其独特精到之见。不但其忠贞有过于一般黄埔学生，且殊得维护领袖于政治运用上的妙处。按中国历史所载，往往朝中大臣之能掌权显赫者，莫不有察言承色，望风希旨之能。余于廿年后读史时，才悟得戴先生体会之妙，价值之高。如美国尼克森总统有一如戴先生其人者，则水门丑事就不会闹到总统非狼狈辞职不可的地步了！不论民主国家或不民主国家，其政府中丑事，所在多有，当然在政治运用中，固亦需要有人“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来分忧，牺牲自己，一肩挑了去。此种维护领袖的手法，有其存在的道理的，所以史不绝书了。

戴先生对蒋委员长的这样君臣观念，在现代民主眼光中自是不合时宜，但以中国几千年来深植人心的君臣观念残剩几许，亦不足为病。以德性来讲，这是可贵可敬的。况当我国自君主变革为民主，自三等国奋斗为头等国，形势所迫，我看亦不得不然，非欧美人士未经此种国难危局所能体会了解的。

七、暗杀史量才、杨杏佛两案对国家得不偿失

这两桩政治暗杀案件，因为两人都甚负时望，史为上海《申报》的大老板，有“报业大王”之称，上海闻人，国内贤

达。杨为学术界知名人物，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以聪慧干才著称。案发后，人心当然不满，虽未明言，当知为特务所干，因大家讳莫如深，亦无佐证可得，故三十多年来一直无人提及。只有二三年前，我看到有人著文，说是因他们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反抗政府，为弭患而遭到制裁云云，事实上都是特务处戴先生之所为。

当时我在杭州负责建立秘密无线电通讯，对于情报行动诸业务是隔离的。况此种机密要案，更要保密，大家忌讳不谈的。不过大案子动员人多，人多不免口杂，近水楼台，亦可得知其梗概。暗杀史量才是于沪杭公路上，事先查明其来杭及返沪之行程与路线，方得适切布置。早一天戴先生的自用篷车，由南京开来杭州，换上假牌照，由原司机张秉午驾驶，在史车到达之前，先驶往出事地点，离杭州不远之处，但非杭州省会警察局之管辖范围之公路上停下，假装汽车抛锚在修理车子，故当史车驶来时，不得不停车，招呼让车道，乃有机会予以射杀，而未伤及他人。得手后张秉午立即驶离现场，换上真牌照，循京杭国道驶返南京去矣。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督察长胡国振，当然以治安重大案件，大家认真缉捕紧张一阵，不过出事地点不在辖区，在官方责任上要轻松些。当时公路上行车甚少，出事地点两头地段谅亦有布置，不使其他车辆接近，故案子做得干净利落，一点痕迹都没有，事实上他们都预闻的。

暗杀杨杏佛是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大门口，他是研究院的总干事，负实际责任者，当他乘自备汽车，出大门口转上马路时，须停顿下来，自行人道上滑落到马路上，被预伏在附近之枪手赵理君所射杀，他是神枪手，百发百中，得手后，即跑去斜角对面搭上预备好的撤退车子，离开现场，此车子亦是支援和掩护枪手者。以中央研究院亦有门警，惟此项门警，见多识广，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不会以死相拼的，而忙于去照顾受伤者了。法租界捕房探目，有被买通有交情者，当然亦不了了之啦。行动人员则分别得到奖金，亦开码头离开上海，择地休息去玩乐一阵子了。

这两件案子我一直觉得不对，似乎过分了！盖叛迹未著，无论如何总得大家说可杀，才可去制裁（《传记文学》二一九期《蔡元培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文内称“杨铨之死，对同盟的影响很大，令同盟寿终正寝。杨铨被刺身死，据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指称，此事由军统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云云）。况且他们都负时望，亦国家之人才。且暗杀行为，为政治污点，一向不利于众口，不直于人心，所以蒙上蓝衣社为暗杀党之丑闻，而愈增反对者之借口，促成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来向中央提出取消特务之口号。又人才决不可以摧残，有伤国家民族的元气，我尝读历史至南北朝时，深怪宋、齐、梁、陈各朝何以短命之由，其同一个毛病，在嗜杀滥杀，人才摧毁，国势即

削弱，岂可不加警惕！

据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另一种战争》(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一书内称，美国政府档案中记载戴笠为杀人魔王云云，谅亦非无据。而美国政府对蒋委员长之观感，总认为是独裁，谅亦并非无根。按民国二十一年创办力行社，时人都比之义大利之法西斯党及德国之纳粹党，益以特务处之暗杀行为，故蒋委员长之领袖地位，亦类比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之领导德、义二国了。当时我们中国人亦都有此种认识，何况美国之政治警觉，当然确认无疑。但平心而论，史、杨二案之后，未再发生同类事件（抗战时暗杀汉奸，另当别论），而力行社之活动于民国廿四年后亦趋平淡，小组会议停止，社员之月捐亦未继续。我以为这是蒋委员长已不走希、墨二魔之路线，而一以儒家治平之道为准绳，惜美国的“中国通”，只知一个表面，不能察微知著，精深研通其底细，而我们亦一直懵懂，不知宣传，亦不明白作正确声明，去把美国政府原先的纪录改正过来，以致此项偏见，一直深存在美国政府里，贻祸到发表白皮书，驯至竟“比共产党更坏”，岂不冤哉枉也。我还是相信蒋委员长的儒学与品德，尚不致于示意戴先生去暗算史、杨，谅为力行社干部所主张发动者，而蒋委员长之为人，一向是有勇于替部下负责的风度的。所以我说这种暗杀案对于国家是得不偿失。

八、戴先生对通讯之运用与保密有其独到之处

先是戴先生深受通讯限制的痛苦，乔家才、唐良雄两先生的著作，首言及此。我则以为这种实际困境经验，就是促使他有过人的体认，导致他在事业上有卓越的见地和运用，因为事情很微妙，不易观察到，我将分段一一叙述之：

(1) 军政部交通司确曾怀疑戴先生是乱党分子，拟议不准他拍发无线电报

我于民国廿一年秋天作客南京，住在交通司的无线电台里，台长卢荻秋同学，拿一份军事委员会发电纸的电报来给我看，说这个拍发电报的戴笠“形迹可疑，可能是乱党分子，他奉交通司的密命须注意检查，并拟停止其发电”云云。我一看具名是“少校副官戴笠”（凭印象记忆，是副官或参谋之类的衔头）几个字的图章盖在发电纸上，其时蒋委员长侍从人员都称他为戴副官，不过特务处已于同年四月一日成立，交通司长王景录（保定军校出身）似竟未知。不过与唐良雄先生所说者其事亦正相符。

(2) 承领袖批准由中央调查科电台（似只有五处电台）拍发戴先生的电报

承领袖批准由中央调查科电台代拍电报，虽是一项大喜事，但是乔家才先生的书上说，他在太原要拍电报，须派专人送往石家庄中央电台去拍发，十分不方便。戴先生自己

亦说电报迟慢而错字多，多得需要去猜。电台上当然先把自己调查科电报先发，人家电报后发，情报须要快，可是被人控制，反而落后，痛苦自不待言。

(3) 交通部电报，保密堪虞，不得已用之，亦是迟缓异常

民国廿二年秋，我们在牯岭未设电台前，蒋委员长的警卫组长黎铁汉先生，与南京戴先生通电，不得已而用军电纸，由交通部电讯局拍发，十分迟缓，且保密欠周，总要二三天时间，因军电拥挤，超过电讯局容量，且时遭有线路障碍，以致不通，待修理则电讯局用快邮传递，更加迟慢了，实不可靠，都无信心使用。

(4) 戴先生创办了秘密有效之特工通讯网，允称奇迹

做特务做情报，而没有秘密迅速之通讯能力，那还有前途，岂非笑话！当知新任特务处长的戴先生的心情如何了。记得民国廿一年“一二八”沪战时，第一师驻常州，胡宗南师长某次在京沪车上，碰到安徽建设厅长李范一先生，他原在黄埔军校教过无线电，后来在民十六、七年任总司令部后方交通处长，开办无线电机制造及训练班，建立新式的短波无线电通讯，及军事技术学校（后改称军校第六期交通科），均甚著成绩，故胡向他要无线电通讯人才，因之乃介绍我去投效，任无线电教官并建立第一师和三个旅及一个独立团的通讯制度，以适应作战之需求。次年三月某日，由第一师转介去杭州，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

当晚到时，即列席他们开会，盖胡、戴关系密切，胡已露头角，戴仰仗殊多，谅事先已考核筹算成熟。我一到后，即嘱主持无线电训练班，于三月十八日开课成立。戴先生原有无线电人才苏民（军校四期，受过李范一之短期无线电课者）、萧坚白（军校六期交通科）二位先生亦交下来，一任队长一任教官，可见早有筹划，而在特务处成立一年后，此班才得开成。

我请了康宝煌先生来协助，试制小型干电池、无线电收发报机，为秘密电台之用，技术上有突破成就，即以之作为电讯班野外通讯实习，学生都有信心，后来竟可通达千里以上之远，甚为成功，建立了划时代的秘密通讯网，我们就称之为二瓦特半的特工机。康先生精通无线电学，且有天分，并非幸致。各地秘密台用此小电机，配以总台之大电机和通讯技术优良的人才，截长补短，组织成不怕一切事变、不受外界任何动乱阻碍、即使沦陷在敌区内，亦能屹立存在与照常通讯的电台，戴先生的愿望达成，理想实现，独步当代了。

戴先生处理的很好，我三月到杭州，同年夏季，即带我携同自制小型特工机上牯岭建立通讯，来往电报迅速，当天都批办了，亦少错字，是从来没有的事，他十分满意。遂同我带小电机去晋见领袖，蒋委员长看了以后，对我说：“好！好！将来会给你更重要的事做的。”故在抗战开始

后，廿七年初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军令部时，戴先生即依据这句话，向蒋委员长荐举我充第二厅第四处处长，但仍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其用人之妙，都在其中了。

事实上我同中央调查科徐恩曾先生（亦即是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处长，戴先生为第二处处长，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早于民国十七、八年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静江先生）开办商用无线电讯时，他主持经营，我充他的助手，凡上海、汉口这一条生意最好的主要路线上，电报拥挤，如有延搁，就叫我去设法畅通，以维持信誉，把交通部的电报生意，抢去大半，这项竞争，促使交通部非改进不可，亦即是后来国府有名的建设成绩最先成功的一项。

戴先生命我廿二年春办训练班，秋办制造所，冬季闽变，即派台进驻浦城，以配合戴先生在前方之活动，不数年间更深感任重而道远。迨至抗战时，进入更重要一环的密电情报，竟有声于世，亦非戴先生始料所及。不去比较研究，不知其难能可贵，更不足以显见戴先生之深具慧眼。

（5）更妙的，戴先生不懂技术，可是他知道正确的运用方法，所以军统局的密码保密，全国第一，此项特殊成就，关系尤为重大。十年后，络续发现各项事证

当民国廿三年戴先生兼任南昌行营调查课后，即与行营电务股负责人黄季弼先生洽妥，允派四个学生前往该股学习密码破密技术，我乃抽派电训班学生刘宝岩（现任台

湾警备总部电监处少将处长)、王怀仁、杨仕伦及由戴先生指定警校学生且受过秘密训练之竺烈民领队前往,竺按时有报告给戴先生,直到抗战时,才送回来,大概分派在各地译电方面工作。竺则与特务处处本部译电股暗中有联络,戴先生用他们在密电保密方面,很正确的!抗战期中,天津抗日志士祝宗梁来渝见戴先生,回去时以不同意携带不易掩饰之密电本表,戴先生乃特嘱我替他们解决,按译电科(特务处时称译电股、军统局时称科)一向列为机要,不与通讯部门来往。其时科长姚敦文携来该组密码本表给我看,当然不合秘密条件,我乃约祝、姚二人来教以用书本子为加码表之法,均觉满意合用而告解决。但我发现译电科的密码指标,可以放在电文内任何位置,相当复杂,确实甚难破译,需要些技巧。但译电科内无人才,我推断只有竺烈民有此技术水准,才能由他指导。不意在抗战胜利后,南京日本派遣军冈村宁次总部的暗号班,对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金戈科长(现在台湾,陆军中将退役)说,国军的密电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能破译,唯有军统局金华站有一种破译外,其余均未破译过云云,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啦!妙是妙在戴先生对于机要业务、人员亲疏、技术能力之间,运用得恰如其分,扣得很准,译电人员只用江山同乡青少年,取其忠实勤奋,与外隔绝之防御线甚坚强,指导密码编制技术,不用留俄专家谢力公先生(在甲训练班教密码课)来指导,而

用学过破密技术之警校学生受过特训的浙江同乡竺烈民，遇到了密码难题，则找我去解决，都是不容易的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按军统局在沦陷区内电台经常通讯者，每天将近百座，七八年来，从未因敌人侦测或破密而遭破坏。又据冈村总部暗号班称，密电破译情报，比什么情报都好，故他们没有必要冒险派间谍往重庆后方。

因为军统的密码好，共产党的破密技术水准要比日本军部差，所以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虽然勾通军统局重庆总台（在两路口遗爱祠）领班冯传庆，窃取某一机的通讯时间表，意在侦抄军统局电报，但亦绝不能破译的。这虽是周恩来的厉害的一着棋，可是军统局坚强，终于攻不进来。按冯原在交通部工作为总台长，只到过曾家岩周家，晤周恩来二次即破获。

我现在简括的列举事实来看看军委会的处理军用通讯与机要室的事，就更显得戴先生的高明。

第一、民国十六年总司令部后方交通处处长李范一，在上海网罗了全国无线电精英，在交通大学校址内，开办无线电制造厂、训练班，开创革命军的军用短波无线电通讯，人才毕集，成绩优异。不意当局将军用通讯，交保定军校出身之邱炜将军接收办理，自然地把有学术基础、进步思想的人才抗拒了，造成了十多年来的不进步，变成落伍的

中国军用通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剿共”时期，以美援的“无线电报话用两机SCR 284”规定为国军制式装备，拿起话筒可同对方通话，虽然方便，可是造成了重大的无线电泄密事故，不知替共军送了多少情报过去，以致我方军师长被俘，吃了多次败仗（蒋公于一九五一年左右在阳明山周会上讲得甚为精辟，他说：“山东地区几次战役，军师长动辄被俘，就是因为无线电报话机通话，拿起话筒来叫救兵，派飞机，不叫还好，共军还不知道，一叫，共军知道了，就来打你，你叫得越凶越急，就招他来打的越凶越急，知道你空虚，直把你司令部包围起来，军师长亦被俘去了。”）。李范一其时又创办了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即后来编为军校第六期交通科，而邱炜则办交通兵团的学兵队与教练所，其间高下距离自有不同（教练所是训练实际操作士官出来，交通技术学校可类似美国Fort Monmouth 的Signal Corps，其程度大不相同）。如照这一个意识形态来用人，则戴先生似应以苏民、萧坚白之军校系统的人，来主办他的特务通讯！但是他能冲破这层障碍，用我这个外人，这是不容易的。

第二、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

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不久改组为电务股，而归机要室毛主任庆祥指导。^①故当民国廿一、二年江西赣共时，共产党之无线电通信和密码，已与国际共产发生联系，其保密技术已超过中国之水准（惟破密技术没有传给中共，这是我的感觉所断定），故已非毛主任等所能突破，后蒋委员长悬奖，凡抄到一份中共电报者，奖银元十圆之特殊规定，亦见其急要之情形。民国廿三年赣共西去，据李天民先生所著《周恩来评传》（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九章第三节第三目称“在西窜途中，周恩来彻夜不眠，等待军委二局把侦察控制或截获国军的电讯情报送达并研判后，再下达次日之行军序列或作战命令，每日清晨及上午，周恩来总是睡在担架上行军，以恢复疲劳”云云。两者相比，我们才懂得何以数十万大军竟不能捕捉消灭数千之微的残敌，任令其“长征”去到陕北，贻下无穷祸害，其关键正在于此。可惜温毓庆博士的科技成就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任他做交通部的电政司长，而没有叫他去做对敌的电讯情报。他原本是哈佛大学博

^① 凡是机要室译电员等，大家都知道但求忠实保密的条件就够了，这是保守性的。但戴先生能重视技术，得其巧诀，竟能有高明而适时的处理，亦似有神助。

士，无线电专家（无线电界内只有二位博士温毓庆与颜任光），又是破密专家，实是全才，国内无出其右！至少限度，他懂得用无线电测向机，哪会让共军逃掉呢？又民国三十四年雅尔达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史大林说，有关中国东北诸事项，总得通知一声中国当局吧，而史大林不赞成，罗乃继称，那也好，若是今日一通知中国当局，明日全世界将都会知道的了（按罗斯福乃指我们无线电密电不保密）。

当时我在重庆亦知道美国人说我们不保密（很笼统的泛泛之辞），军委会各部门都奉命检讨一番，只当是例行公事应付应付，我们亦并不确知是雅尔达会议罗斯福以此为借口，致国家蒙受巨大损害。不过我了解美、英、德、日都能解读我们外交密电的（俄国照理亦会破译解读的）。^①此外外交密码亦归毛主任指导的。他如民国三十四年冬，日本派遣军冈村宁次总部暗号班，称破了国军密电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如民国三十六年，我在西安绥靖公署，俘到一名共军李先念部队中当无线电通讯兼译电员者，只有小学程度，他说国军的简易密电，他经常可以抄获解读，我才了解共军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俄率先创立破译密电技术而世人不知，直到民国廿年美国《黑室》一书出版（*Black Chamber* by Herbert O. Yardley, copyright 1931），才暴露此大秘密于天下而震惊世人。我国于民国十八年破译中文密电，为蒋总司令所用，亦极度保密，可见我国实并未太落伍，但是机要译电之事，其性质已非保守性的认识，若仍未改进则落后于先进国家。

以微小军力能在四周有强大国军力量中，能觅得夹缝而得存在，乃靠此电讯情报之赐。二十六年春蒋委员长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内，检讨寄给西安的密码，在邮政局内被共产党偷抄去了，并令我改革。我乃改成一次一密、^①一密到底及派员专送等三项革新，才足以保密。

以上所举的事例虽寥寥几件，但这正是此一大时代的真实趋势，并非偶然事件，只以事涉国家机密，各国均列为禁例，迄今英、美虽有若干解禁文件的披露出来，惟苏俄仍全部禁制，使秘密不泄，人亦不知其深浅，进而使世人不知有此等事，乃为取胜之道。简括言之，自一九〇〇年无线电讯问世以来，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发生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利用无线电情报大破俄军之有名的坦能堡会战。直到一九六七年以、埃（以色列与埃及）六日战争，以国以电子作战赢得胜利，当时世人均不知所以，而瞠目称奇，认为历史奇迹。此数十年间，世界上都是以不为人所知的电讯电子的保密与破密之斗争，为一切大事之成败主要关键。

^① 一次一密为普天下不可破的密码，乃英国专家于民国廿八年所创设应用（温毓庆博士亦曾对我表示过，将来密码不可破，亦看到此点）。当你不知此中秘密时，确难得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认识，乃铸成大错了！我于民国卅七年所知美国使领馆所用之一次一密拍子簿（One-Time-Pad O.T.P），我真是叹为观止！我复于一九六〇年看到德国研究密码机之如何保密技术，充分显示其非保守性，乃随科技进步而是攻击性的。今日世界上尚不知有多少国家仍茫然无知于此。

九、泛论中美合作所

在抗战时期和胜利后的中国人，大都熟悉军统局的名声，对于中美合作所，尤其声威赫赫。其实以我的眼光看，中美合作所实质上并没有多大作为与贡献，只因为美国有登陆东南沿海之说，为接应登陆，则中美合作所的分量被看重而加以高估。按美国克莱恩(Dr. Ray S. Cline)回忆录亦称“中美合作所并没有极大的成就”。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一书(中译本名称《另一种战争》，一九六八年出版)中，并没有具体叙述过它的实绩事功，即为明证。究其实，美国太平洋作战战略直指日本本土，故除了海空军需要大陆气象及若干日本运输船只情报，可予美机及潜艇去攻击外，是没有其他更重要事可做了。至于有关对日本海军之侦测破密情报为作战所需者，都是由美国人自己做，只利用重庆、昆明两个侦测地点，为美海军整个侦测网之一角而已(当然是重要的一角)。其中美合作所之重庆测向台亦只准美员进入工作，即可知其重点所在(这亦不能怪，因为军事上作战与情报都极度保密，绝不让外人插手的，其时英、美联合参谋作业，而我中国并未参预)。其他的都是应付戴先生之需，不是美方之重点。不过对军统局而言，那是顶重要的，增强好大的声势，尤其在物质缺乏，官民大家都困顿时，有美国装备如卡宾枪等(比

我国中正式步枪要进步)，还有专用的飞机，岂非天之骄子。直到一九四九年底重庆失陷时，军统局仓库还存贮许多轻武器、爆破器材及各种物资不少，亦只有毁掉了事。

戴先生能争取到中美合作所，萧勃武官贡献最大。萧勃先生字信如，湖南人，湘雅毕业，以非军人身份经杭州甲训班后，保充驻美使馆副武官，确是戴先生的慧眼识拔。他能突破规章限制，进入美国陆军参大，故与美军方人士接触面甚广，亦能深入，曾于民国廿八年秘密策动前美国国务院“黑室”主持人密码专家雅德賚秘密来渝，指导我们对日密电研究工作两年，再于民国卅年就同梅乐斯中校密商促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建立，这都是开创性的大事。梅乐斯中校与萧十分知好互信，几至言听计从，其中中美立场之争执与美国内部倾轧（主要者为战略局），戴先生未娴外事，大都由萧之策划与协调。戴去世后萧任职总统府中将参军，迄一九八〇年退休，则未能一展所长。

戴先生能扩大中美合作之合作范围，以配合我国之需要，且处在主动地位，表现得有声有色，可显见得其不平凡的才具。美海军且计划于战后助我国建立新海军，传闻有戴先生主持之议（抗战胜利后，戴先生曾招待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重庆钟家山中美合作所参观过）。以今日之眼光来看，那是隐然以日本战败后所遗西太平洋的真空，必须填补的战略部署的一种有意义的大事（当民国卅五年

初，中美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准将已返美治病，第七舰队舰只协助护航国军北上东北，戴先生与柯克上将则过从甚密，且有助建我国海军之说，其时我只以为戴先生为军统局人员安排将来出路，而美国海军则认识军统之组织力强、纪律好而办事有效率，故期望能建立合作有效之中国海军，因尚不明此乃太平洋西岸之战略意义)。又于我方迁台后，美国中美所同仁且组织年会，时来台开会，以睦“邦交”，可见戴先生领导之中美所其影响甚为深远。

梅乐斯中校于民国卅年到重庆来，要达成他的三个任务，第一建立气象情报网，第二建立无线电侦测情报，第三东南部沿海一带布雷，以阻击日本船舰等。当然最先须建者为无线电通讯。无通讯能力什么事都无从做起。所以我和他最先接触，他考查得我们军统局的通讯人才技术成就，足以协助他完成第一、二项任务。气象方面，我亦物色得中大教授黄匡千博士（前中央气象局长）及王崇岳教授（现在台湾）来中美所工作，其学历且在气象组长贝乐礼上校之上，更借得气象局五十年来的气象纪录资料给美方，这是研究气象学者的可贵珍宝，为远期预报必须者，真是喜出望外。又自军令部第二厅技术实验室看到我们所获得的日本空军所施放的高空气象探测器，梅乐斯两者都要去，其时美国尚未有，更是意外收获。关于无线电侦译工作，我们已有破译，中美两方均有相当技术，自亦便于合

作，所以大体上均得解决。故美方兴趣高信心亦足，催着要去觅定通讯台地址。戴先生亦兴致很好，和我陪同梅乐斯去看定重庆郊区磁器口缫丝厂（缫丝厂房子改设军统局办事处，因改称为造时场）附近之钟家山、杨家山一带丘陵地带，虽歌乐山高出甚多，但山在西面，不影响对东方之通讯及接收东方之电波，以后之通讯台、侦收台及测向台均建立于此。

梅乐斯中校本人是电机出身，所以他懂得我们的作业。他在所著《另一种战争》（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一书第三章中译本第七十三页，即称“……他曾带我去参观了他在离重庆约十哩处的一座秘密实验室……他们给我看到了数量惊人的、了不起的机件和配备。我看到一些电动密码机和一种非常有效的从事伪装的装备，那儿有一有趣的间谍计划，配有一些小型摄影机……密写文字……无线电收音机一变成发报机……使我对于中国人的聪明天赋，益发增添了敬慕”云云，这就是军令部第二厅技术实验室也。它是由我国著名无线电专家朱其清先生（留英）主持，另尚有王启贤电机硕士（留美，创制电动密码机者，极有天分）、王震寰化学博士（留德）、陶士珍物理博士（留美）等多人襄助，梅乐斯当然敬慕了。当他同戴先生搭卡车出发东南沿海，发现我们在卡车上用小电池小型无线电机直通重庆时，又大为惊讶。盖美国人的通讯标准是机器好，声音响，

这种小电机电讯微弱，是认为不能工作与不合格的（梅不久回美时，即仿制了五百架特工机送给军统局，可见其衷心热忱）。我们的特工通讯就是凭人的技术去达成的。当我告诉他在马尼刺尚有二个电台，新加坡、西贡均尚有一个电台通讯时，他尤其钦佩。盖当时麦帅撤出菲律宾，正在运用游击队，我相信美国无此谍台留存在马尼刺（其时梅乐斯非常兴奋，我以为他必然要该方面情报，按照合约，军统局的情报都可以供给美方的，但以后我并没有听到该方面有何事功，谅未得用）。至于东南沿海布雷一事，按英伦海峡布磁性水雷是一项举世瞩目的事，可是梅乐斯虽“深入福建沿海地区”而后来并未布放，谅美国海军的战略不须如此做了！

中美合作所的中美合约内，有一条是写明双方破密合作的，可是梅乐斯无法履行，因为美海军不同意，请不到破密专家，只邀请得其友好海吉上尉（Heagy），在第六组（无线电侦译）作密电分类业务而已（sorting，在密电研究分析之前的第一步工作）。正如《另一种战争》一书第十三章所说“我们的第六组，也是由美国人主管的，他们的工作包括拦截敌人往来通信，并加以分析——这是戴将军所极希望要有的东西，但有一时期，我便因此给夹住了。在美国海军和中国人的拉锯战中间，我们海军方面某些单位对于此项资料，也很感兴趣，因为凭着我们的那些收听哨，我们便有

了一个钥孔，可以打开日本人一路通到东京的无线电讯往来。但中美合作所的协议草成，并得到双方同意之后，我们海军里面若干部门，对于其中的第十八条很不高兴，结果有时他们纵然也给我们一点帮忙，但总是显得出非常勉强。一年多来，为了实现我们这个诺言，双方就一直都在不断争执，但接着，约克霍尔威克海军中校（Jack S.Holtwick）带来了一个所罗门样的解决办法^①——把六组一分为二，以纯粹属于海军的部分分派到昆明去，让他们与华盛顿发生直接联络，同时，为了满足戴将军的要求，另外建造了一座更好的电台，附有更多的配备，专攻大陆上的往来电讯，这个办法终于收效，双方都感到满意”云云。大体说来，确是如此，其实中方始终不满意的，不过戴先生谅解梅乐斯确已尽力而无法办到，亦即利用此梅乐斯亏欠处，梅对于戴先生之其他要求（如请美国FBI专家来重庆开办刑警训练班，许多弹药枪支、交通器材等），乃尽量设法满足，戴先生的算盘是会打的。其时梅乐斯亲口对我解说，破密的电子计算机（Computer）架设在加尔各答（Calcutta），体积十分庞大，占二大间，实在无法空运来重庆的，而霍尔威克中校与我谈了二次，一次是礼貌拜访，一次是长谈破密技术问题，到关键处，他巧妙地避开不说了，我证知他们的破密技术

^① 所罗门样的解决办法，谅指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与尼米兹海军上将二个总司令作战指挥，都在所罗门群岛地区，结果，只有把它一分为二，勉为妥协。

比我们高明（其实他们是以计算机来算Chi. tests及Kappa. Phi的百分比数字来判断重合率，为入手解破其加码，所以他们可以解破日本密码机Purple machine的密电而我们不能。按驻美武官朱世明送来此项美国的破密文件，我相信如温毓庆博士在，亦可以用此理论方法去解破的）。又梅乐斯于日军自京沪溯江而上攻九江时，中美所侦得日海军运输舰的几个呼号，他告诉我说这几艘运输舰应当有若干只航舰组成一只舰队来行动（行进序列，前后距离都有规格，这支舰队大小船只至少须有十几廿艘组成），他一方面要求侦收更完整更多资料，一方面通知陈纳德空军飞虎队去轰炸，他表示判断正确，轰炸亦收效果。这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作用，这就是我于民国卅六年建立准确的侦测情报的原理。又一次美国飞机经过老河口时，其飞机雷达受到干扰，梅乐斯特地很郑重的跑来看我，要我检查该老河口一带日本空军方面的装备有何异状，我答称一切均正常，无特殊状态。其实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大事——电子作战。可见我们落后美国不少了。按日本电子技术，制造不出如美国的波长特短的雷达，故无能干扰，当为其他因素。又按美国海军早于一九二四年即在上海外滩的美国领事馆四楼上，建立侦收台，专截收日本海军无线电波，以完成其无线电情报的作业，十五年之后的中美合作所对日本海军的情报，当然以从事大规模的无线电情报为其主要任务，此

不可不认清也。

事实上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与日本作战所必须的气象与情报，由中美所供给者，都由美国人经手，戴先生一无干预，他所需要的多项物资，多种训练，梅乐斯亦尽量供应，只有互助，才两得其利，所以合作密切。不过难得的是梅乐斯对我们中国人之友好，实超过任何外国人，他是海军电机出身，照一般常例，应有其美国人的优越感和科技的直觉脑筋，岂知他很懂得政治和自制，许多地方他迁就中国的习俗和尊重中方的意见，我猜测对我们必然有衷心感佩之处，如组织严密办事有效，渗透敌方地区，深入穷乡僻野，纪律严明忠于领袖等，实非美国人所及，而萧勃武官之居间协调掖导，亦预有力。而戴先生之有气魄，可以笼罩全局，操主动之权非如其他合作机构之听命于外国人。这种地方就可以表现出“人杰”的模式，也非常人之所能，斯乃可贵。

十、事后的先见之明

我以为只要我国当局看清国际局势，存心拉拢纠正美国左倾的政治情报人士，通过中美合作所与美国战略局（OSS）邓诺万将军合作，下工夫把美国情报档案里的中国情况纪录，不被此辈少数人所歪曲，那末我们的政府总不

至于被美国白皮书诬说得如此之坏，使我们退出大陆。

当然我很清楚，其时戴、邓虽曾晤会商谈，但基本上政治观念不同，利害大有冲突，性格更为相斥（同性相斥），尤以邓挟罗斯福总统之信任，及英国政府之支援，与美国人原有之优越感，非戴先生所能忍受，远不如梅乐斯之易于共同工作。不过我人从后来的许多资料，才了解要使美国政府相信我们政府是抗日的，且要祛除对蒋委员长的误解，和对蓝衣社的不良纪录的辩正，不去专听共产党的话，不为它所蒙蔽，不使美国情报档案里尽是替共产党说好话的情报，说国民党及政府坏话歪曲的情报报告，那只有通过军统局与战略局的——亦即是戴、邓合作才能收效。

按美国国务院于民国卅八年八月发表白皮书，纯以美国的眼光见解来看我们来苛责我们，我真是奇怪其成见这样深，究为何故？我于一九七七年看到美国克莱恩回忆录（原书名称为*Secret Spies and Scholars*，中译本名称《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书，我才了解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之功能与运用，美国政策的策定是根据各方情报及其研究结论，在此会议中大家讨论后，凭利害得失，由主席亦即总统加以裁决的。他叙述国家情报研判，达成战略情报作业，以为战略和政策方面之用，广泛而深入，那纯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其问题研究和政策的思路，犹天马行空，实非谬见与执着。原来从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如谢伟思（John Service）等到

驻华文武官员如范宣德 (John C. Vincent)、戴维斯 (John Davies)、巴大维 (David D. Barret) 武官等，照我们中国人称为左倾分子者，大概亦不过十个人左右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不够周详的)，是在做歪曲事实与诬蔑政府的情报报告，来充实美国的情报档案，为美国国家情报研究的基本资料，来策定美国国策。这些美国官员，都是“中国通”，确曾读过若干中国书，把中国的坏事情，都弄得很清楚，自以为专家，实在是一知半解者流。我曾在重庆郊区野外，由友人介绍见过巴大维武官，他自称在北平曾住若干年，一口京片子 (标准北京官话)，与电影明星陈燕燕、王人美很要好云云。一副油腔滑调，所以我想共产党乃有办法了，当然经过共党特务的运用，把这些人拉拢过去，替他们吹嘘起来，竟造成当时的时尚，影响到美国及国际。而我们政府及情报圈子对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更进而对立、抗拒，事实上是不啻我们用力把他们推向共党方面去了！

又据梅乐斯所著《另一种战争》一书第二章内，很坦白说出他在华盛顿看到档案内戴笠的资料纪录卡十分坏，“根据这些资料，细节大体没有什么出入，结论更是如出一辙，其中都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又说他是一个与盖世太保 (Gestapo，德国纳粹政府的秘密警察) 类似的神秘组织的头目，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见到他面。这些资料几

乎都形容他是一个罪恶的人，任意对人施以鞭挞。其中有一个资料竟说他曾杀害他自己的母亲两次之多。当然，这最后的一段是绝对无法置信的。不过当我看到有一件报告，上面有我在海军官校同班同学麦克胡的签名，他当时在重庆，他的报告内容等于说，戴将军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由于以上情报，所以后来当我向某些人当面请教时，他们劝我，最好离戴笠远远的……”可见这种情报资料是大大地发生了作用。

又魏道明（伯聪）大使的使美回忆录第八章内（《传记文学》一九八〇年五月号）称：“……我知道烦恼的根源不在华府，因为华府的决策大部分根据驻在中国的军事与外交使节团的报告和建议，困难与冲突的主因，深植于中国战区……”这与我的体认恰恰相同，而这种军事与外交使节团不是都要靠参事、秘书、武官及其他官员去中国官方和民间去找资料来报出去的么？

按英、美等国是反共的，但他们的观念是抗敌第一，即使是共产党，如共同抗敌，就引为同一阵线，以增抗敌力量。又美国国内其时乃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盛行，即所谓自由分子（Liberals），很像左倾人士（汪公纪先生所译的《西方之没落》一书内，对此有详尽的解释，香港新闻天地社出版），我人不察，亦欠研究，根本就弄不清楚，一律畏如蛇蝎，固拒而推向共产党方面去，实在是失算之至。即罗

斯福总统介绍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亦是自由分子，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知识与智慧来运用，而让这班极少数的人，有接触到我们政府重心的通道，使明了国军抗战与共产党不抗战的事实，不使颠倒黑白，并显示出所谓独裁政体，实是共产党的捣乱实质，让美国有正确的资料与正确的观念，不是比什么都重要么？^①

现在看来，只有让邓诺万组织参加中美合作所（亦只有此机构），才可能影响这般左倾的自由分子，将正确的情报送进美国的情报档案里去（战略情报局与他们接近），纠正原来歪曲的档案了（参考以下三项事实，当知理论上有此可能：（1）梅乐斯之著作替戴先生纠正美国档案之不实记录；（2）抗战胜利后柯克海军上将与戴先生交往甚密，且特到重庆郊区中美合作所巡视一番；（3）我方迁台后中美所美方同仁还常来聚会）。

再看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纠纷一事，事实上，不调处还好，愈调处弄得愈坏，共军愈得势，国人对马帅偏见十分不谅解。但是马帅调处不成，回美不久，就任国务卿，订出马歇尔计划，去救回希腊不关入铁幕，而稳定西

^① 当一九七五年蒋公逝世，美国终于派副总统洛克斐勒充吊丧特使来到台北，亲眼目睹全民对蒋公哀悼之自发的景仰真情，他回国一下飞机就声称十分感动，非比寻常（大意如此）云云。按洛氏为美国有钱有势的名人，亦为自由分子，向来与我国有些距离隔阂，经此次接近我国事务，其观念上必定有若干转变分量，此乃我所见之罕有事例，亦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欧自由世界阵线，以抗苏俄，迄今卅多年，则事实又显示马歇尔在西欧反共，而竟在中国助共么？太不可理解啦！一九七六年十月，名教授梁敬鐔所著《马歇尔使华政策之检核》大作里，说得很清楚：“……凡此皆是反映马氏开始调处之前傲大与成见……”这当然亦是来自美国档案里的情报资料与研究报告，岂有凭空冒出来之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说共产党是“土地改革者”、我们的政府是“独裁者”的这一套，谅马歇尔必中了这个毒，才演变出“助共”的结果来。这一切我以为只怪我们没有能力供给正确的事实情报，给这极少数的美方人员所致。

这一个历数十年有关中华民国国运的大事，是十分错综复杂，不易捉摸，难下定论，不过我从情报的眼子来看（围棋有眼子，就会活，国运一局棋的眼子是情报），点明如上述，亦就简明了。惟中外史家，虽亦有述及大局中情报之重要，但都未如我所认的绝对重要的地位，可见现代世界仍然是情报学并未昌明，谅此世界上难得有多少人士能得有其实经验与素养，或只限于列强各国极少数优秀分子用以操纵世界乎！非一般人士所得预闻乎！

我承认我这个事后先见之明，亦是于一九七七年阅过克莱恩博士回忆录之后产生的，行固不易，知亦甚难者也。

十一、戴先生善于运用通讯，益增信任

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特工首脑，第一必须获得领袖之信任，而蒋委员长的情报体制一向采用双轨制、多轨制，以免偏听而利制衡，深有意义，故工作竞争自所不免。从民国廿八年，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成立，还是由戴先生出面呈请蒋委员长一事看来，他是运用得很成功的，兹将我所见到者略述三事如下：

(1) 民国廿三年六月，日本副领事藏本失踪一案，此事唐著《戴笠传》与费编《戴雨农先生全集》均有详记。我尚能记忆，于事后戴先生评述检讨时，尚责备首都警察厅侦缉处长赵世瑞，问他为什么不迅即直接报来（《全集》称干员方超所寻获，方与赵均为军统局同志，方在该处工作，乃赵之部下也），赵辩称公家手续繁杂，一面尚须报警察厅，警察厅还须转报上面，实在忙得来不及云云。戴并透漏他呈报牯岭蒋委员长的电报最快，还是第一个到达呈给委座看的。言外之意，他的功绩，完满达成了。这亦是他的惯性，凡是成功了，他还是给部下几句反面的话语的。又从他的话中，可推断委座的侍从人员中有将消息报告他的。事实上，当有其他方面同时向委座报告者，那么同一个消息，就不再呈给委员长核阅了，这是戴先生得力于通讯敏捷的功效。

(2) 民国卅年秋季，委座要知道厦门港内有无日本兵舰，电话问戴先生，厦门电台通不通，戴先生当随口答道“通的”，乃嘱戴先生查报。岂知该厦门分台与重庆总台已数日未通，译电科送去的电报发不出去，乃回报戴先生，戴先生大惊，这岂非是欺骗领袖吗！更无以回报领袖，事情很严重，乃急找我这个第四处处长去，很严重的告知此情。我说我到总台去试，时乃中午十二时左右。我想厦门台两位同志尚可靠，并非拆烂污之辈，技术亦尚优，如下午一次通不到，谅晚上一次必能通到（短波通讯，夜晚有利）。我其时亲自上机，于下午一次就通到。原来讯号是太微弱，数天来值班人员粗心大意，故听不见，通不到了，我同时以“台密”（电台双方用之密本，称台密）嘱其去海边看一看，有无日本兵舰，我在电报机上等候回音，对方知道是我魏某人亲自上机，他们都谨慎从事，半点都不马虎，不到一小时回音就来了，说有一艘日本兵舰，昨天才进港的。我乃急携此回电向戴先生复命，他在漱庐（重庆枣子岚垭的对外招待之所的名称，亦直通军统局局本部）正在坐立不安时，不禁喜出望外，想不到我一去就解决，真是一天云雾，顷刻开朗了，即转到他的房间去打电话向蒋委员长报告，总算圆满结束。但是戴先生不就此为止，另有妙算，还领我去见委座于曾家岩官邸，委座从楼上下来，他即报明前因后果，他有欺骗领袖之嫌，有亏职责，所以带同魏处长一同来，请委座处

分。结果蒋委员长并未生气，和颜悦色，还当面慰勉数语。这是对上的忠贞不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露无遗。继而戴先生在纪念周会上将此事经过报告出来，惟另加上妙语，谓如魏处长亦通不到，他早已准备好手枪，一枪把我打死后，他自己亦自杀向委座谢罪，借此昭告同志以申纪律。这不仅对下的教导军统同志的绝好精神，又在无言的另一方面，并且让军统局同志都知道了魏处长的技术好，是由他自己所宣扬出来，不言而喻他是有知人善用之明的。上节我说他惯用的手法，凡结果好了，他还要加这些反面话，此又是一例。他亦把一个单纯的电台通不通的事，到发挥出许多大道理出来，这不是善于运用吗！我直到胜利之后，才明白查询厦门有无日舰，那是委员长正要研证当时日本南进不南进的战略大问题。

(3) 当民国卅年底香港沦陷后，因香港与重庆关系多，要人住在香港亦不少，又是我们国民政府对外唯一咽喉，大家都出乎意外地，英军不经打就快快投降，弄得都措手不及，于是香港通讯十二万分需要吃香了。其时只有军统局香港通讯始终未断，不论公私，大家都要拜托戴先生传递和打听些香港的消息，托打电报。有一次戴先生找我去曾家岩公馆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上海闻人杜月笙先生在座，他说（他称杜先生叫“月笙哥”），这位就是魏处长，主管我们电讯的，介绍时，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杜随即向我

道谢，盖他亦正在要同香港方面他的人联络在等消息。戴先生随即取出一张便条纸，乃是蒋委员长亲笔所写的一份电报，要打给香港宋庆龄夫人者，是邀请她进入内地，由戴派人协助照料盼复等意，具名“中美”二字，嘱我注意迅速拍发（事实上后来孙夫人没有进入内地）。戴先生是很要面子，很好胜，这种时机，大家越是艰难，正是他有特殊表现的时候，他亦尽量发挥其作用了。

十二、情报事业现代化的重要

戴先生是在此时代的中国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情报特务首脑，事实上其赫赫之威，是建立在行动制裁工作上，至于情报事业，并未指引到现代化的阶梯，不及英、美。

我国历史上宫廷间明争暗斗，权臣之揽权弄法，互相侦伺倾轧，史不绝书，明末之东厂、西厂，清初太子之争夺，文字之兴狱，以及清末民初，盛行暗杀，汪精卫、徐锡麟之刺清吏，陈英士、宋教仁之被刺，应均属特务行为。民国十六年，革命军北伐至淞沪时，军队未到，先来探子，与吾乡金山县吕巷镇教师侯纯甫先生联络，借知地方虚实，并准备饌浆，向导路径，此一实例也。盖乡先辈钮永建元老为该地区军事特派员所布置者。克复京沪后，胡靖安（军校一期）先生在上海邀戴先生参与总司令部密查组工作，是均

为军事调查工作。俟民国廿一年，戴先生奉令成立特务处，则负责维护领袖安全，军事调查与制裁叛逆等，至于情报则以温毓庆博士之密电情报较优。直到民国廿六年抗战开始，戴先生受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负实际责任，但避免使戴先生对外折冲协调，亦是委座翼护之意。直到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以事实形势所需，对日敌、对伪府作情报搜集与制裁突击，对内则保密防谍安定社会等诸多大事，忙于应付。只在抗战后期戴先生才见到情报研判之重要，而着意任用鲍志鸿将军，做军事情报研究工作，但仍不及军令部第二厅。胜利之后，目标顿失，精神一松，形同解除武装，“肃奸”之事，有损无益，以迄殉难，其情报无何进展。

我们来看看号称国旗无日落的大英帝国，当然它的未开禁的资料还很多，我凭若干专书和知识经验，尚可理出一个头绪来，明白它的强盛的窍门所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果然是凭他的船坚炮利，若是事先没有偷偷的绘制我国沿海岛屿的风水险路的海道详图，如英国海军舆图局所辑藏之《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此书为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陈寿彭译为中文，其时我国尚无海道测量机构），则无论如何，总不能纵横无忌，入寇江海来侵略的。这需要累积多少年的商人商船传教士等明察暗访搜研编成的。这就是列强侵略所以成功的先锋，军事明查暗探的

实例。试想以此来面临一个闭关自守、懵懂无知的大清帝国，当然非赢不可，清廷不仅无此认识，且根本不懂也。一八五八年印度亡于英国，那是东印度公司，自经济侵略进而为政治侵略的实例（只用少量武力为后盾），这并不是纵横捭阖，操纵颠覆特务的成就吗！民国以来，直到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们还记得各地租界林立，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公司的船舶航线，遍及内河沿海及全世界，大东（英）、大北（丹麦）、太平洋（美）及日本的水线电报公司，控制了我国对全世界通讯，表面都是商业利益，暗底下全是情报网的伸展，而我茫然不明此中奥妙！英国称霸将近百年，其情报亦超越美、俄而为独霸的局面（美国且于一九二九年撤销国务院的黑室破密机构）。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前进，一切事更复杂了，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势调查研究（静态基本资料大体都从书报杂志而来）已有规模，加上大量的十分有用的电讯情报，和世界上各地交通通讯十分发达所形成的丰富情报来源，在武力未接触前，先是情报角力，其胜负之数已有眉目了。英国人发明雷达，科技占先，战胜了与德国的电子战，才得保卫英伦三岛不被侵入。美国出了绝大部分的兵力物资去参战，可是情报仍靠英国，所以美国一直追随英国战略的。例如开罗会议中，蒋委员长力主登陆仰光，恢复缅甸，打通滇缅线，其议已成，而后来仍为邱吉尔所推翻，即其证明。回顾我们

相同时间的情报观念仍相当原始，对于情报现代化的许多功能，一无体认，仍滞留于内幕最机密的一鳞半爪消息为最佳最好的情报观念。至于国力调查，战略研究无此情报作业的规模。故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政略战略之事，不免瞠乎其后者矣（抗战时我军令部第二厅对于日本陆军兵力之研究，在日本投降后，美占领军得日本军部资料证明，甚为正确，亦止于此而已。第二厅是用日本书报及广播资料，由许多留日文武人员对日本兵役制度有精确研究而计算的结果）。

至于美国呢，很妙！民国十八年国务卿史汀生上任，竟以君子不窥人之秘密为理由，而撤销其黑室（Black Chamber），亦可见当时君子国家的美国政治家的高尚观念。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教训，不得不有所更改了。不过美国陆海军的情报，一直在前进并未怠忽，不过只是平时状态的（美国空军成为独立军种为后来的事），因为情报为作战之用的观念，是全世界相同的，亦是最早最原始的。所以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战，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动时，美国的情报实质，配合不上实地需要，没有形成有效组织，万万不及我们中国已有两个调查统计局和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的对日工作及研究）的组织和活动了。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才由总统发布军事命令，设国防情报局协调长一名，在

总统之指挥监督下作业，任命邓诺万将军出任战略情报协调长，其任务为“搜集分析所有涉及国家安全之相关情报资料”及“授命执行辅助活动”，但是其“国家安全”和“战略情报”的两个观念是很进步，是我们所不及的。后来不久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改组为战略局，受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管辖，因在大战中创建许多功绩，邓名大著，事实上邓是受教于英国情报组织和支持的，因为英国是情报先进。英国所以极力培育和支持邓诺万，固然是合作密切，但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和利益，即是影响美国的战略观念，即使美国追随英国的战略观点（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当大战结束前，美国战略局的一批学者专家所作的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对国力调查和战略研究，都已粗具基础，已经进步到现代化，此乃受到英国先进经验所指引（这是我从克莱恩博士所著《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书中所得的概念）。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苏宣布日本投降，九月廿日新总统杜鲁门任职不久，自难体认到平时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一般认识情报是为作战用的），将战略局撤销后，于次年一月才成立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其下组织一个中央情报组，终于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一个中央情报局（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正式成立），置于国家安全会议监督之下，安全会议由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其所属必要人员组成，由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报告军事

政策，由中央情报局长报告外国情势、动向、威胁及可资利用之机会，完成全球性的政略战略的研究策定，可见情报业务真正现代化和自立自主，是一个强国的必要条件。

在杜勒斯当中央情报局长时，大展雄才，复因其兄大杜勒斯当国务卿，更配合的密切恰当，创出许多建树，尤以围堵政策，战争边缘的运用，困住苏俄，大展美国国威。按战争边缘之政策施行，其背景非靠精确之情报研究评估不可。更于一九五二年韩战爆发之后成立国家安全局（其实是电讯电子情报作战机构），创出电子作战中的新名词ECM及ECCM，成就非凡，已超过英国（ECM为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电子反制〕，ECCM为Electronic Counter-Countermeasure〔电子反反制〕）。再进而为太空侦察，美苏对抗而苏不及美，盖纯为科技产物。故大战后卅年来美国之称霸世界，其情报亦独霸世界，取代英国了。可惜尼克森水门事件（一九七四年八月辞总统职）牵涉到中央情报局而遭到参众两院的多方指责和干预限制，直吵到一九七五年底，以致其功能削弱，绩业大衰，尤损害该局之威信和保密。我当时读到这些事实报导时，就认为这是美国自毁长城，相对地乃是苏俄力量无形伸张的大好时机（详我所著《无形战争》第十三篇），到今日一九八〇年，我们已实际见到苏俄势力很明显地有形扩张甚盛，当非巧合也（无形扩张之后，才能得有形扩张）。美国当深感切痛之余，卡特

总统才于一九七九年又赋予中央情报局长Turner（是卡特总统的同班同学）以情报大权，所有美国各情报机关之预算，先要经过中央情报局长审核，这是前所未有的，并宣称“情报为和平事业之用”的一句有深度的名词（事实上美国已如此做了，不过事后宣布这个名词而已），但是不是挽救得过来中情局的绩业、信用和声望，那要看中情局长的才具了（要有特殊表现，必靠特殊人才）。所以情报乃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绝非单纯之“特务”，此实为我们中国人所应有之认识。

事实上英国百年霸局与情报并进，美国霸局卅余年与情报并进，兹苏俄如取得情报优势（已有部分取得），其霸局能否形成，且看今后美国之能否扳回情报优势为断了。惟世界和平已维持卅余年，大家为核子武器所吓阻，然亦未始非情报事业所恩赐，惟我国家之科学落后，早先戴先生之工作，亦只能止于如此。

十三、破密专家温毓庆的不辞而别

温毓庆博士，广东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精于无线电，曾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财政部北京税务学校校长，于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任内，创立中文破密工作。桂系李、白、唐生智、石友三及阎、冯之中原会战等各役，

靠此情报解救危机以致获胜，再于民国二十四年交通部电政司长任内，破译日本外交密电，实在是一个人才。他有绝大的保密素养，细密的分析头脑，好学深思，锲而不舍。他大概先读了美国《黑室》一书，内有日本字码字母拼列的密码基本组织，想去试破，因有电政司长的地位，去搜集日本外交密电，并侦得东京专台三座，与中国各地日本使领馆及东亚各地如香港、马尼拉等日本使领馆电台通讯，因而破译其初级密码一种，乃事务性的电报，他因所收电报有缺漏不完整，妨碍他的破译，乃打电话到杭州，把我找到南京去，要我替他建立侦收台于南京羊皮巷，电报须抄得不错不漏，后来温博士就很快破了第二种深一层的密电，情报价值亦较高。其时，还有一种更深密的未破，他对我说，这种工作顶好要同特务联系，一为保防警卫，一为窃取密本资料，确实这两点，十分切要。我就提议请他同戴先生见面，乃居间约定，即于鸡鹅巷五三号戴公馆内，二个人晤会密谈，自此过从甚密。抗战军兴，无线电侦译工作，随之发达，计温毓庆之密电检译所，毛庆祥之电务股，军统局之侦陆（军）工作队及侦空（军）工作队，则分隶于军令部第二厅与航空委员会工作，以及军政部交通司之侦译组，政出多门，力量分散。乃由戴、温协商，戴出面向蒋委员长于民国廿八年六月，呈准统一各侦译单位，归并成立技术研究室，直属委员长，以温为主任，以毛、魏二人为副主任。其时商

量名称问题时，温极力主张用“研究”二字，以为此一工作离开了研究，是一无前途的。温的见解很对。合并之初，对日本的第三种密码亦破译了，它是一个星期换一张密码表，^①这正是一个极有希望的情报机构。岂知民国廿八年初我国聘来美国破译专家、前美国国务院“黑室”主持人雅德赉（Herbert O. Yardley）顾问来重庆，在军统局工作。当技术研究室成立后，温主任在戴先生允许下，曾与雅德赉单独会谈一次，内容不详，惟不久温即去香港不辞而别，连电政司长亦不干了。戴先生因之曾召我去商谈，有何办法去劝他回来，当时我实莫明所以。如我劝戴先生，将雅德赉归温监督，似可挽回。惜我年轻识浅，见不及此。我于三十六年奉派负责技术研究室后，对温博士更有进一步的了解，兹将我的浅见分析如下：

第一：我须说明温博士的三个见解：A保防警卫；B特务偷窃；C无研究即无前途，真是深得要诀，认识得透彻。在当时，我听了亦只当是老生常谈，应有之义而已，后来我经验多了，又知道美英两国的侦译工作经历，加深我的体认，才识得温博士的“识得真切，做得真切”的真工夫，国内无出其右者，他实在不是做官的，而是研究科学的，求真知的人！

^① 这种密电情报价值更好些，如情报内发现三个代号PF AM LM的间谍报告重庆内情，一个月总有四五个情报，虽非最高极机密资料，但亦非民间传闻之消息。

第二：戴先生当知密电情报，一向高居情报第一位，故成立技术研究室，将其纳入军统之势力圈内，形优势盛，独占鳌头。殆温与雅顾问一谈，温有受诒之感，一去不回，过去数年工夫，尽付东流矣。事实上，雅德赉只工作两年，并无重大贡献，何不划归技术研究室，由温指挥，岂不两位专家合作，力量更大吗？

第三：破译密电工作，美国在民国六年（美国参加欧战这一年），日本在民国十三年，我国由温创始在民国十八年，这是一项国家进步与否的标帜！是一门有关国运的新技术，是科学的。可惜其时未能运用温的科技才能来对付共产党，否则江西“剿共”，岂能容他们逃脱到陕北去，实在是异常遗憾的。当时时尚潮流，革命第一，温又似不合这个规格的。无如当时政府的革命意识型态，包容不下此种科技人才，真是慨叹万分。

十四、戴先生深得蒋委员长之维护

原来戴先生干特务，除奸杀敌，检查交通关卡，早已闻名遐迩，不过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怕，类似红眉绿眼的魔鬼模样，社会上并未见得有好评。不意自林世良一案公开后，我有一位朋友浙大束教授就来跟我说，此案不但大快人心，且大家对戴先生的观感亦因之大大改变，证为是硬

汉，不怕得罪巨室，一力去整肃贪官污吏，一致有好评云云。束教授是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有代表一部分清议的性质。

我以为戴先生的得罪巨室，是职务上注定了的，亦并不是只此一件事而已，不过他已经是很技巧的减至最低程度。他于民国卅年提示的“服从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二句名言，是深得此中奥妙，革命精神是要发扬的，但他绝不会替领袖找麻烦。故于胜利后，更付以全国肃奸重任。

陈立夫先生成立中央党部组织部的调查科，由徐恩曾主持其事时，戴先生的密查组还是小弟弟。“九一八”后成立军事委员会，又创立复兴社与特务处，戴先生自己没有电台，还是经领袖批准由调查科电台代为拍发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是立夫先生，这个名称取得很进步，第一处为徐恩曾，第二处是戴笠，第三处是丁默邨，但戴一向独立组织，我行我素，不受节制的。迨民国廿六年庐山训练团开办警政系，此乃为戴先生有计划的掌握警政之实际行动。

民国卅二年六月蒋委员长派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兼军统局帮办。以我个人的了解，大概因为蒋委员长听到若干闲言闲语之后，才加派一个帮办，亦是调和维护之意，兼有警惕之用，按费编戴先生年谱之附录三：“卅五年三月十日上午八时戴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在北平怀仁堂举行总理纪念

周席上的公开讲词内说：‘……我今日明白告诉各同志，我们不怕外间一时的不谅解言论，取消与否也无所谓。在重庆未出发前（按系二中全会前）有人告诉我，说有人要取消调查统计局，叫我设法转圜，我便一笑置之。每次全会都有人反对我们。’又说：‘民国廿一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要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直到西安事变发生，有一位同志来问我，你负特务责任，委座为何受此危险，必须向你清算。’”等语，这些事我亦是早有耳闻的。

大概民国卅三年秋天，有一天戴先生特地找我去研究问题，说据确报重庆郊外山洞新村居正院长公馆内有电台，他已计划妥当，想要派人去搜查。为稳当起见，叫我去先查，迅即回报云云。我即于当天下午坐一辆轿车前去。按此新村只有几家别墅式住宅，为林森主席、于右任院长等最高级住宅区，树木茂盛，环境幽静，警卫不严，亦未有闲杂人等来往。我车于四时许进入该村，作访客模样，车子停在附近，认清居宅，未见室外有任何天线，傍晚后在车内打开收报机守听，直到深夜，一无所获。又伪装电力公司工友，进入住宅察看电表电线，亦无任何装架电台之迹象，

侦察几天，实无异状，更无戒备可言，乃向戴先生明白回报“没有”，这样打消其搜查行动。戴先生做特务工作，连党国元老亦要去碰碰看，他的政治环境，当然不会好，亦可想而知。

凡事功愈大，必树敌愈多，誉盛毁随，殆难避免，世岂有办特务而求圣人哉！以蒋委员长之明达，故戴先生能始终全终，明主能识英雄，此为一证。

十五、工作与朋友之间

我似乎发现许多有才学之社会贤达多愿与戴先生论交，但不愿进入军统局当其部下，而与戴先生发生工作关系，永远保持于工作与朋友之间，这是很微妙的局面，致令局本部有人才难得后继无人之叹。连大家眼光里的与戴先生关系最亲密的如郑介民、唐乃建、赵龙文等都置身局外，戴先生当有所觉，而亦无可如何。

最先是赵龙文先生，他原在广东高等师范攻历史，后去日本留学，好学深思，读书甚多，曾阅读《资治通鉴》六七遍，故辩才无碍，见解生动，很能说得动人，为浙东才俊。民国廿一年“一二八”之役，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军聘入幕府。廿三年夏任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后兼省会公安局长，并主持戴先生之特务训练。盖胡、戴、赵均属知交，互

相结纳，有志于革命事业。赵善计谋，析理深入，尤富研究精神，故戴甚器重。当民国廿六年冬，政府重心在武汉时，中央军事组织，全盘调整改组，调查统计局亦在其列，戴先生当时主张赵去充主任秘书而戴仍长第二处，则力行社方面尚可匹配党方，不致受制而难以作为，报请委座谅无问题，而赵不愿，宁可在金华故乡当行政专员，做游击司令。我以赵非军人出身，游击司令，终非得计，应来中央以展其才，故曾面劝赵先生说，即使以诸葛孔明之才，亦要有刘备，才能得以发挥，赵即接着说“谁是刘备”一语，我亦哑然无辞以对了。后来赵去西北胡宗南处，终未能为戴所用。至于调统局，其改组计划亦变，即后来分别成立二个局于中央党部与军事委员会，即所谓中统、军统是也。

其次讲到唐乃建先生，特务处初期，任过书记（后来称书记长），转任驻德副武官。民国廿六年抗战后，唐返国，于廿七年抵达武汉，戴先生年谱内称“为处理情报迅速，在武昌成立随节办事处，由唐纵主其事”，我其时亦在武昌，并不知有此组织，谅唐并未去成立办公。后来他进侍从室（主任为林蔚）第六组（组长为于达，后为唐纵）当参谋去了。唐先生军校六期，但文质彬彬，温和沉默，思虑清晰，在侍从室环境中需要有真实学问，高明见解，林、于诸公都道德拘谨之士，况在蒋委员长身旁，不得不勤读慎行，累积成另一种风格工夫。民国卅二年唐兼领军统局帮办职

务，亦只限于名义，不去过问任何事的。迨卅五年三月戴先生殉难，奉命暂代时，顺理成章，应当是他代下去，但他似志不在此，于复员声中，他着力另组警察总署，即可知之（唐先生的事我没有请教他，凭我旁观者观察，大体不会错。况且有些话，不能直说，只能体会其意在言外的）。

再说郑介民先生，广东文昌人，军校二期，足智多谋，聪明不露，大家目为军统第二号人物。特务处初期即任侦察科长。民国廿五年六月两广事变时，策反粤方之陆海空，尤以飞机归降，影响最大，故救平其乱，乃郑之杰作，而特务处之声望亦以日隆，戴先生亦倚之为左右手。抗战开始，郑任军令部第二厅第二处长，不久升副厅长兼军统局之主任秘书，但他并没有来局正式办过公，有时戴先生远行，委托代理，其批公事，一概“如拟”，大而化之。他有自己的宽阔路线，即军事情报研判分析、军方外事与盟国联络，并协助戴先生与各军事首长间做协调工作，排解纷难，直到抗战胜利后以国防部第二厅长兼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政府方面委员（其对手为美方委员及中共委员叶剑英），以后又兼保密局长（即军统局），不久辞去，由毛人凤先生继任。既然贤达与高明的人，都不肯进军统局工作，当然令人有后继无人之感！至少限度戴先生死后原来的革命精神、侠义气质已渐式微。长江天堑，中共无海空军，竟可渗透江阴、荻港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进军江南，任令共谍横行，我想戴先

生地下有知，必怒发冲冠，目眦尽裂矣。

十六、胜利后肃奸任务

大势所趋，胜利解除了精神武装；尤其军统局忙于肃奸，有权有势，又有地位之后，一定产生副作用。即戴先生本身亦一方面忙于肃奸，一方面为军统作基本打算（如掌握全国警政，组织全国护路的武装力量，及筹划美国协建中国新海军等）。郑介民先生曾对我说过肃奸的事，戴先生实在不必去担任，这种事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军统局做了反受累不浅云云。盖其意戴先生应做别人所做不了的事。此项高论，意义深远！

十七、戴先生不死，也许不会失掉大陆

“戴雨农如不死，局势何至于此”，唐良雄先生于《戴笠传》中有中肯的判析，其他方面亦多有此说者。我认为至少限度，于最后两关必有作为。一为汤恩伯将军的京沪一役，必定还有些作法，江阴、荻港两个要塞，决不致于被共军渗透收买，可以用帆船来进军江南。按戴先生性烈而狠，有一掷乾坤之气概，亡命死拼之劲道，更有死节尽忠之情操，正是在这种板荡乱世中，最足以发挥奇特之功效。况军统局不怕死的人尚不少，汤、戴知交，汤必受其影响而轰轰

烈烈的干一场，局势一定不同，可以断言。盖“国军”尚有海空军及长江之险，东南半壁富庶之区，如在有作为之保密防谍系统下，实尚勉可划江而守。南宋虞允文以文人只凭个人才智而破金兵于采石矶时，宋兵已疲惫不堪，卒赖此战而保南宋之偏安，历史可以覆按，我以为汤、戴联手，可抵虞允文而有余。北平中共“革命历史陈列馆”中还将这一只帆船陈列起来，说是第一只试探渡江登陆成功的，真是气死人！一为西南局面当一九四九年冬蒋委员长莅渝时，尚能有渝市民众燃鞭炮欢迎，称有十万之众，其时军统局在康、蓉、渝一带尚有群众帮会基础，且仓库中有中美所之美式轻武器弹药物资甚为丰裕，更有完美未投入战阵之胡宗南部数十万（估计至少二三十万）为重心，如戴未死，早已先去与胡筹商大陆更后之布置，胡、戴乃刎颈之交，军事必须与保防情报相结合，才有真力量，何俟蒋公去渝、蓉时，临时调胡部入川卫护，零星分割使用，只当救火队使用而已。我于共军进占重庆之同一日清晨，即上一天的半夜里由渝浮图关率领两辆卡军，赴白市驿机场之沿途，警戒部队屹立于寒风中，甚为威武镇定，我私下认为这种兵可以打的，很少看见如是威武样子，但奇怪这是哪里的部队呢？询问之下，始知是今天刚刚新调到的胡宗南部队，岂知已太迟了，共军的斥候已到了南温泉，蒋公亦于同日午时飞蓉，起飞时南岸共军已可射击飞机了，后来守成都、守西昌，都是苟延

残喘的局面，谁都难于挽救了。如胡、戴联手，对于川、滇将领，先有个办法，则形势要比上海还好！是戴之死，对于该二地局势有绝对不利影响也。

十八、结论

1. 综上所述，我觉得无论如何，戴先生乃不世出之英雄，凡是英雄，即不能以成败论。

2. 我是替戴先生办秘密通讯的，所以我对此了解深，叙述亦多，不过整个特务工作，是难在组织控制与秘密通讯两者，因而这两方面，叙述已尽其要，而难得其全。

3. 特务工作，乃人主之利器，此中有许多应有之顾忌，是很微妙的，戴先生深得其奥妙，故能全始全终，实为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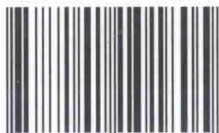
4.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之情报，实以电讯电子情报为主流，故我所叙述戴、温事实经过，是极具关键性的事件，而知解者极少，盖国人对于情报之观念认识，尚未如先进国家之进步故也。

（原载一九八一年二、三、四月《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二、三、四期）



推行民族复兴运动之组织，到现在止，一般都称为“复兴社”，实则推行这项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次级组织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都是在民国二十一年四月间，经过不同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复兴社”的名称，是二十三年七月以后才有的，那是为了扩大组织影响，广泛的吸收一般人做社员，实则从中央以至各地区，皆以“力行社”及“革命青年同志会”之组织机构与干部人员，办理复兴社员之征收和训练事宜，换言之：复兴社从中央至地方，并无独立的机构及办事人员，且在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以前，民族复兴运动，正蓬勃展开其工作时，根本无复兴社名义。

ISBN 978-7-101-10180-5



9 787101 101805 >

定价：36.00元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